

國際廣生

GLOBAL REVIEW

(双月刊)2021年1/2月 第1期 总第70期

2021年1月15日出版

目 次

中国外交

- 1 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创新 杨洁勉

国际秩序、世界体系、全球价值链

- 16 中国与国际秩序笔谈：观念与战略 周桂银 宋德星 刘 丰
祁玲玲 毛维准 张晓通
何樱灏
- 48 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 叶 江
——兼谈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的新作用
- 67 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 余南平 戢仕铭
——以全球半导体产业为例

区域问题

- 88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刘阿明
- 110 澜湄合作的动力机制 卢光盛 聂 姣
——基于“利益—责任—规范”的分析
- 130 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 彭 泉
——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 153 英文摘要

國際展望

GLOBAL REVIEW

Vol. 13 No. 1 January/February 2021

Published on January 15, 2021

Contents

China's Diplomacy

- 1 China's Diplomac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YANG Jiemian

International Order, World System,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 16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Visions and Strategies
ZHOU Guiyin, SONG Dexing, LIU Feng, QI Lingling, MAO Weizhun, ZHANG Xiaotong, and HE Yinghao
- 48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Modern World System
YE Jiang
- 67 Techno-Nationalism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Value Chains—A Case Study of the Global Chip Industry
YU Nanping and JI Shiming

Regional Affairs

- 88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LIU Aming
- 110 A Nexus of Interests, Responsibilities, and Norm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U Guangsheng and NIE Jiao
- 130 Resurgence of 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mplications for China-CEE Relations
PENG Xiao
- 153 Abstracts

Inside Back Cover: Call for Papers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建设的 百年探索和创新

杨洁勉

【内容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中国外交理论 外交总体思想 外交战略思维 外交政策原则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1-0001-15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1001

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和实践本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并以此指导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不断取得胜利，进而将向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继续前进。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推翻旧世界和创建新中国，其关于外交的思想主要是以革命求生存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外交以毛泽东外交思想为指导，在外交理论中强调以斗争求承认，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以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重点，使中国外交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的时代变革中把握住了正确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进入了理念创新和体系建设的活跃期，并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外交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一、总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外交的百年理论建设进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其中，不仅建立了总体外交思想，而且形成了利益观、时代观和体系观等核心理念。在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完成了历史使命并将继续前进。

（一）内外一体的利益观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环境中诞生的，并在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处理内外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与成熟，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利益观。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利益日益丧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举反帝、反殖、反封建大旗，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新中国在站起来、

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有力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广大被压迫民族求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后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增进国际社会福祉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不惜牺牲巨大国家利益，全力进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朝斗争，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的联系，两者的利益紧密相连。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经验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①

党的十八大以后，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正确义利观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它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也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国家利益观的超越，更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的反对和鞭挞。”^②

（二）与时俱进的时代观

“时代观是指人们对时代总的观点和看法，是反映时代发展总趋势和逻辑演进规律的根本观点。”^③ 中国共产党把“时代观”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以此认识世界总体形势和指导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在建党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认同列宁提出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将马克思关于时代的相关论述和具体时代背景相结合，首创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斗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战争与革命成为这

① 《习近平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新华网，2018 年 4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1/c_1122666235.htm。

② 尚伟：《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求是》2018 年第 10 期，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05/14/c_1122826868.htm。

③ 徐涛：《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观》，《学习时报》2018 年 6 月 20 日，第 2 版。

一阶段的时代主题。^①

毛泽东长期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革命运动，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指导中国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实践，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是，毛泽东后期在时代观上也发生过重大偏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建设和实践进程。

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里程碑式的新发展。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在邓小平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时代判断经受住了此后的历史考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基本判断之一。2018年9月3日，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强调：“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③

（三）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

如果说，利益观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立足点、时代观是其使命方向，那么国际体系观则是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体系观经历了革命反抗、参与建设、改革引领等历史性转变和创新。

一般认为，近代国际体系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对该

①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43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③ 《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新华网，2018年9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03/c_1123373881.htm。

体系先是游离于外，后又深受其害，处于被支配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时期就强烈批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揭露英、法、美等列强通过国联和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等扩大自身利益、损害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虽然受制于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国于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经过 30 年的努力，以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基本完成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正常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①

随着世情和国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承认现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也从思想理论上对改革国际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胡锦涛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主张“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从国际金融危机应急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转型”^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化方面又有了重要的发展。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③这不仅对于中国参与和改革国际体系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为今后国际体系的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战略思维的系统建设方向和任务

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

① 习近平：《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央广网，2015 年 9 月 25 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925/t20150925_519980548.shtml。

②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71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9 页。

望。”^① 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以战略家的眼光前瞻性地判断世界发展和中国国内政外交的趋势。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特别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加强外交思想理论的战略性和建设。

（一）外交战略定位的演变和发展

在中国的外交战略思维中，国家定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1949年以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难以自主地进行国家和国际定位。新中国建立后，在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指引下，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确立和发展了以下国家和国际定位。

第一，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始终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和世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形成了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首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针对苏东剧变，邓小平指出：“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也不行。”^②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成功挫败了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种种图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③

第二，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并加以实践。^④ 1949年以后，中国和一些受到殖民压迫的国家共同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重要一员。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根据形势变化逐步以“发展中国家”这一名词替代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表述，并沿用至今。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⑤。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0页。

第三，坚持“结伴不结盟”的战略方向。1949年以来，中国逐步实现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思想转变。中国在1950年正式与苏联结盟，但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破裂。在70年代，中国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确立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不结盟”思想逐步明确和完整。邓小平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① 1986年3月2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②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③ 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④ 迄今为止，中国已同1/3的建交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还同东南亚、欧洲、非洲、中东等主要地区组织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决定外交的主攻战略方向

在中国的外交思想理论体系中，总体思想通过战略部署和运筹而得以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国际战略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大革命时期（1923—1927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推翻军阀统治而打击其背后的西方列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同时，还把矛头直指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并坚决主张与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发展关系。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世界法西斯力量。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

② 《198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2006年2月16日，http://www.gov.cn/premier/2006-02/16/content_200850.htm。

③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44页。

略主攻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主要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华政策，从而逐步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①为此，中国在国际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指导下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但同时与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93年4月，江泽民对中美关系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②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不断打造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③中国在百年巨变的机遇和挑战中，有效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坚持国际合作共赢的正道，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全球治理为主要平台，有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三）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坚持历史进步、发展的世界观，坚持全面、综合的分析方法，坚持积极转化条件的主观能动性。在百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

① 《毛泽东作八大开幕词》（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0/65452/4442004.html>。

② 钟之成：《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26页。

努力用好建党初期的被压迫民族反压迫和求解放的战略机遇、抗战时期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战略机遇、建国初期的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运动大发展的战略机遇以及在世纪更替时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战略机遇等。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①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又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②

三、区别对待的政策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历来强调外交政策不能一刀切，需要因时、因事、因地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保障总体外交思想和战略思想贯穿于中国外交的始终。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敌友思想

《毛泽东选集》的首篇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③可见区分敌我友和团结大多数在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政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在对外关系上十分重视区别对待的政策思想，根据国情、世情的变化来确定依靠、团结和斗争的对象，这一思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就注意区分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主导国家和从属国家，争取与一批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或半外交关系，努力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和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一方面努力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罗马尼亚、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和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2页。

②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0日，第1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发展了关系。此后，毛泽东又根据“三个世界”思想和“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巩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取与第二世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并在美苏两大霸权中集中打击苏联。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中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邓小平始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又对经济所有制、市场经济、竞争精神等进行了重新阐述和分析。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

（二）中国外交政策的务实思想

中国在与世界各国互动的过程中既有坚定的原则性，也有应变的灵活性，通过务实合作实现外交的总体目标。

第一，坚持基本原则与弹性、灵活处理。在同外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上，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在具体处理方式上也尽可能弹性处理。例如，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全文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①但事实上却达到了法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目的。又如，中国国家奥委会1979年在恢复与国际奥委会联系时，采取了“奥运模式”，即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使用不同于当时的旗、歌、徽（指所谓的“中华民国”旗、歌、徽）。^②

第二，维护核心利益与实现互谅互让。中国是当今世界邻国最多、陆海边界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面临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复杂历史和现实问题。但是，中国在坚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绝大多数陆地接壤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做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尊重历史”和“照顾现实”、“尊重国际惯例”和“兼顾当事国国情”相结合，通过互谅

① 《中法建交公报》（1964年1月27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34/1207_679146/t7274.shtml。

② 《中国同国际奥委会关系》（2020年10月更新），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gjawh_695725/zghgzz_695729/。

互让实现公正合理与互利共赢。

第三，强调通盘考虑与主张分步实施。当前，中国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时，把重大使命分解为阶段性任务加以逐步解决，这样就把解决当前问题同实现国家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体现了大国外交的气派和风格。例如，邓小平在中美建交遇到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干扰时，作出了先建交、再谈判的战略决断，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又如，习近平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印度尼西亚的“海上强国战略”等战略对接，使“一带一路”的前进道路越走越宽广。

（三）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

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需要立足国内，但也需要对接国际，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达到预期目标。中国在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全球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不断向纵深发展。

第一，外交政策的原则对接。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不仅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需要并能够走向世界，与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原则进行对接，并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产生影响。例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主张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原则，其既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体现在中缅、中印关系中，并在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中得到延伸。

第二，外交政策的讨论对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参与了重大外交政策方面的国际性讨论和辩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在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数时间内，中国始终重视外交的国际交流、交汇和交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交流的经常化和机制化步伐加快。当前，中国积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以及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地区对话机制等重要平台上宣示和讨论中国外交政策，增加了外交决策的透明度，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外交政策的内涵对接。百年来，国际关系的内涵不断深化、拓展，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深度和广度也发生相应变化。中国外交政策目前包括政

治、安全、经济、文化、教育、环境、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并通过双边、多边、地区和全球机制与世界各国互动对接。例如，中国的经济外交、金融外交、环境外交等政策通过国际对接而产生聚合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

四、外交思想守正创新的新任务

在当代世界各国中，中国外交以其伸张正义、重视辩证法和战略思维而著称。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思想建设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一）坚持实事求是与反对急于求成

在世界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在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内政外交中坚持实践本原论，始终把实践作为思想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第一，客观分析内外环境和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与内政不同的是，外交受到更多的国际制约，因而需要多维思考和综合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脱离实际的失败实践，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全面出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中国当前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仍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谦虚谨慎，冷静观察世界，沉着应对各种严峻挑战。

第二，建构总体战略思维和分步实现阶段性目标。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最终目标，但是中国的外交思想、方法又是现实和客观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构建”（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还要根据未来 30 年两步走的国内战略目标提出相应的外交战略目标。为此，中国外交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通过量变实现质变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坚持战略定力和反对急于求成。当前，中国在外交上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和困难，急躁情绪和极端思想抬头。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的告诫，

坚持战略定力和沉着应对各种挑战，摒弃“十全十美”的理想主义，克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情绪，积小胜和多胜为大胜和全胜，通过“多步”而实现“到位”。

（二）坚持唯物史观与反对唯心史观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外交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强调从历史发展中认识国家兴亡的规律，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和进行外交上的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

第一，坚持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习近平在十八届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① 中国外交都要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加强相关的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建设。历史反复证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代人需要重点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当代的使命又必须与未来的使命相结合，这样才能在某些可能和需要的条件下提前介入并承担起未来的历史使命。

第二，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体现了中国外交“人民至上”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② 邓小平指出，在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要努力作出我们的贡献。^③ 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④。在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更是把“人民至上”的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中国外交思想的世界意义。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习近平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新华网，2013年12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04/c_118421164.htm。

② 钱其琛：《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的伟大贡献》，新浪网，2003年12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c/2003-12-12/15252357696.shtml>。

③ 刘华秋：《邓小平外交思想：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的典范》，《求是》2014年第16期，<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815/c85037-25471947.html>。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33页。

外交思想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①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也将随之而扩大、上升，逐步取代日益落后、反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崇尚实力、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等。

（三）抓住主要矛盾与提倡兼容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内政外交中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科学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

第一，面对复杂形势，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既要全面了解和认识各种矛盾，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中国在应对中美关系这一外交主要矛盾时，就需要抓住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②

第二，应对严峻挑战，要做好矛盾的转化工作。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中强调祸福相倚，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更是强调矛盾的转化工作。在未来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中国需要在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和安全关系时，认识危机中育新机和变局中开新局的辩证关系，提高转化矛盾的理论自觉，丰富辩证法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实现机遇和挑战的建设性互动等。

第三，坚持全球的包容发展和对立统一。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中国在外交上必然需要有兼济天下的胸怀、合作共赢的思想、和平共处的理念，从对立统一的全局观和世界观出发，真正达到习近平提出的要求，“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

^① 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0年7月2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798986.shtml>。

^② 《习近平致电视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6日，第1版。

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①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坚持真理和宽容待人的关系等。

结 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思想理论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发展于中国内政外交的伟大斗争，得益于国际社会对时代进步的探索和推动。在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以及国际思想理论交流中，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理论不断发展，当前已经进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新时代。在新时代，国情、世情加速变化和发展，中国对外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探索新命题和应对新问题，从而有效指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 30 年及以远，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全球大国和全球强国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需要更高的实践和理论自觉，需要进一步推动物质和文明进步，也需要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此，我们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加强全球性的思想理论交流、交汇和交锋，在推陈出新中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主流理论，并以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服务于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中国与国际秩序笔谈： 观念与战略

周桂银 宋德星 刘丰 祁玲玲 毛维准 张晓通 何樱灏

【编者按】 国际秩序是世界政治中最具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国际秩序的走向本质上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对此时代之问，追求民族复兴并已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理应做出自己的回答。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秩序“分”“合”未定之际，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会同《国际问题研究》《外交评论》和《国际展望》三本杂志，以“中国与国际秩序”为主题，邀请近二十位学者分别从历史与理论、观念与战略、议题与实践等不同路径和维度尝试进行跨学科、全方位讨论，旨在聚焦中国在国际秩序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思考中国与世界之关系，鉴往知今、展望未来。

【关键词】 国际秩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多边主义 霸权护持 外交战略

【笔谈人】 周桂银，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厦门 邮编：361005）；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 邮编：210039）；刘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084）；祁玲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 邮编：210023）；毛维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 邮编：210023）；张晓通，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433）；何樱灏，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邮编：430072）。排名不分先后。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1-0016-3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1002

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与特征

周桂银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开启了国家发展的新征程。为领导新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发挥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应有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始终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潮流，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现实出发，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高屋建瓴，运筹帷幄，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国际秩序构想，为不同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和总体外交布局指明了正确方向，体现了当代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方面的远大理想和责任感。

（一）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演进的阶段性

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以建设国家、努力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一极为目标。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中间地带”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冷战为背景，争取构建一个中国应该和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新秩序。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构想，指出在美苏两大力量之间，还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而中国属于中间地带，中国可以利用这个地带的有利因素，实现中国革命的目标，成为一支独立的世界力量。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并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概念，认为美苏之间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以西欧为主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三个世界”理论的雏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朗，中国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中国领导人相应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美苏两国是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属于中间派，是第二世

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宣布，“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当代中国由此形成了第一个全球战略，即建立“联美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中间地带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均从国际力量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出发，致力于维护和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力量之一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明确了当时和此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布局，即团结第三世界（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世界（第二中间地带）。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多年是中国国际秩序观演进的第二个历史时期。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不断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愈益坚定地从国际政治现实以及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完善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中国主张的国际新秩序进行了一系列阐述，指出国际新秩序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对应于和平问题或东西方问题，其核心是世界多极化，以及中国作为世界一极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对应于发展问题或南北问题，强调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此外，邓小平还多次指出，建立国际新秩序必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内容上仍包括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原则上仍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主张要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提出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提倡文明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思想。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年，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和谐世界”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指明了方向。“和谐世界”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原则和宗旨、内容和方法上一脉相承。一方面，在推动国际新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上，中国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定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主张通过和平手段

解决国际争端。另一方面，在内容和方法上，两大构想均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各领域的建设路径则日益明确而务实，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规划了可行的路线图。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历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前三十年建立和维护中国作为世界一极的地位，逐步发展到后四十多年主要聚焦中国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作用或中国与世界的相处之道，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美好的世界。这种阶段性变化主要是由于三个重要因素，即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看待中国与世界的信念和立场的变化。这也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看待世界、走向世界、建设世界方面，已经从最初的革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世界观，逐步转向了国际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秩序观。

（二）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演进的继承性

第一，中国几代领导人都从全球性的战略视野分析国际格局和世界的主要矛盾，对国际形势的特征和趋势做出正确判断，提出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两大阵营内外不同力量的分化组合出发，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正确方向并采取了合理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领导人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认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性是国际政治经济大趋势，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及其作用和影响不断增强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点，在此基础上相继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中国成为世界重要一极、负责任大国、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和路径。

第二，始终从中国自身力量和身份定位出发，围绕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这个核心，积极谋划未来国际秩序的建设路径，并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在“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中，中国是美、苏两极之外第三

世界的重要一员，中国大力支持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与正当诉求。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中，中国进一步明确了自身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的大国的身份定位，更加坚定地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更加有力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愈益自信地积极塑造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

第三，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根本遵循。在“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思想中，中国与一些重要邻国共同提倡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了新的国际关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倡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和平手段、政治协商和外交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

（三）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在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条主线时而平行向前，时而相互交错。理想主义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远大理想，继承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和平遗产。一方面，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始终从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全局和长远出发，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站在人类正义事业一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领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因此，在七十多年中，中国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旗，始终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身份定位，呼应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在国际事务上明辨大是大非，坚持伸张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继承了古代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从“天下一家”出发，坚持“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和谐”的原则，在维护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上，主张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理想主义部分，也可称之为“高目标”。

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路径上，中国领导人不断转向现实主义方向，越来越明确地坚持全面、均衡、渐进的路线图。在“中间地带”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中，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基本从区分敌、我、友的标准出发，为中国规划了方向明确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被动应对的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从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出发，为中国自身定位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规划了清晰而务实的路线图。继国际新秩序主张之后，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思想，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去推动建立国际秩序。这五大领域的路线图，不仅坚持分类推进、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且照顾和适应了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及国家的关切，本质上有利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有利于维护和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种现实主义思维，也体现在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上，即从改革开放以前消极被动、有选择地加入，发展到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加入和全面融入，其根本目标在于迅速而紧密地与世界融为一体，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而重要的一极。与此同时，中国又从当代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与总体趋势出发，以务实态度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剧变面前坚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一切从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从中国自身实力与地位出发，既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和责任，又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扛旗、不当头。这些现实主义思维构成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低目标”。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维度，“高”“低”两类目标，贯穿在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过程中。对内而言，这有助于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夯实政治的合法性。当代中国领导人在相应的关键历史时刻提出的国际秩序主张，都推动塑造和凝聚了必要的战略共识，形成了新的外交思想指南。对外而言，当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呼应了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正义诉求，体现了中国的远大抱负和宏伟理想，彰显了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国际秩序观及其基本战略选择^①

宋德星

在新时代，世界政治最重要的问题是国际权势转移导致的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广泛争议，因此，主要国际力量进行战略博弈时无不强调自己对于国际秩序的一系列主张，极端的事例则是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美两国之间围绕国际秩序的争论设想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并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反复予以强化，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中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挑战者的负面形象，并遭到中国政府的强有力驳斥和斗争。正因为如此，明辨美西方曲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实质意涵、中国有关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立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主要战略选择，对于消弭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误读，优化中国国际战略环境，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不仅意义重大，而且相当紧迫。

（一）西方国家曲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战略意图

作为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直接关乎其对外战略决策和政策行为，关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力量运用的方式和强度，关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模式和关系走势。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力量发展、累积与运用的关切，其有关中国国际秩序观颇为流行的政策解读，不仅负面、消极，而且有着特定的政策意图。其具有以下几类典型政策解析。

第一，视中国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无论是借助长周期理论解析还是基于世界历史类比，西方国家普遍将崛起的中国定性为不满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其作为陆上强国，最终必将与海洋强国美国争夺领导权，并设想中国的终极目标是颠覆西方国家所构建、维护并体现西方（主要是美国）主导地位的现有国际秩序，至少是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秩序。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地缘安全及其风险管控研究”（18ZD130）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称中国是东亚霸权的追逐者。与前面从国际体系视角出发来审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略有不同，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思维，从东亚地区权力政治出发，强调崛起的中国首先将致力于获取东亚地区的“霸权”，其表现有：一是挑战东亚地区现有的国家边界领土现状（特别是南海地区）、制度安排、规则规范，从而导致地区关系紧张；二是致力于挤压美国的地区影响力空间乃至力量存在，导致亚太地区中、美两强对峙态势日益明显；三是与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进行战略竞争，以争夺地区影响力。

第三，认为中国是非西方理念模式的示范者。西方国家从历史文化和政权性质出发定义所谓的中国国际秩序观，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文明古国，一贯强调自己与西方在发展理念、道路选择、制度设计、行为模式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并以当今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证明中国理念模式的优越性。由于西方国家无视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结果使得制度与模式之争成为中西方国际秩序观念之争的重要方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

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多维政策解读，一方面是基于对崛起中国的力量担忧乃至战略恐惧，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妄想症”作用的结果，即通过塑造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来达到战略聚焦的目的，用以牵引自身的战略规划、力量建设和对外关系，同时通过夸大威胁，推动构建一个以西方大国为核心的对华联合阵线，最大程度孤立和遏制中国，从而维护西方的世界领导地位。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国际秩序观的话语逻辑，实质上是国际权势斗争的反映，因而中西方国际秩序观之争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全方位的博弈过程。与上述西方有关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政策曲解明显不同，中国对国际秩序问题的看法和政策立场一贯而清晰。

（二）中国国际秩序观及其政策意涵

第一，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获益者、维护者、贡献者。中国认为，现行国际秩序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又是当今国际政治得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培育并催生了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些引领国际潮流的大趋势，从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发展机

遇、合作机会、成长条件；尽管这种机遇并非均等，且主要依赖于治国方略的不断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机体健康、政治敏锐、战略适切、政策灵活这类核心问题。在这方面，中国通过自身的思想理论创新、政策方略调整、创造性发挥，成功地抓住了战略机遇，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正因为如此，中国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体系，致力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共同协商解决国际问题。

第二，中国认为现有国际秩序需与时俱进，并进行必要的优化调整，以充分体现当今国际政治现实。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态势的变化，取决于重大国际议题催生的思想观念的演进，取决于国际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在新时代，尽管国际战略形势有其传承的一面，但变革趋势同样明显。就后一方面而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对发展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有关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主张，以及管理大国关系的新路径新安排，诸如此类的重大议题，无一不映射和影响国际秩序。正是这类新议题新关切，推动了现有国际秩序的适度调整，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好地关照现实、面向未来，以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

第三，中国始终秉持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发展自己影响世界的治国理念，强调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当今世界一方面联系如此紧密、休戚与共，以至堪称为“地球村”；另一方面差异如此明显、如此复杂多元，足以称得上“破碎化”。对中国来说，要在如此纷繁复杂又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谋求安全、发展、秩序与正义，根本在于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因此，中国特别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并通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使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以自己的发展进步推动国际社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的基本战略思考与战略选择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仅基于国际政治现实及其发展大势，而且基于思想理论传统并始终与时俱进。对中国而言，21世纪前期是一个需要努力适应

并认真应对的新时代。原因恰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先前从未有过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不得不基于如此众多的不同观念，或者如此普遍的全球规模。^①

第一，只有战略上的清醒才能保证战略选择的合理适度，面对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中国和世界其他大国一样，需要战略上的清醒和审慎，明辨和把握下述重大问题。

首先，最重要的是清醒认识和把握体系层面的发展大势特有的意义。就国际秩序而言，无论是在国际权势等级结构、国际体系基本价值取向方面，还是在世界秩序、国家关系方面，均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在这样的大变局中，迅速崛起的中国发挥何种性质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关注国际体系层面的这些发展大势和普遍关切，特别是多种趋势并行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对于当今中国尤为重要和迫切。换言之，新时代的中国迫切需要战略大眼界，其中尤为重要和迫切的是体现宏大战略构想的一种全新的体系视野以及相应的战略谋划和战略设计。

其次，清醒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战略运筹特有的困难。不同于以往，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化的不仅是力量对比态势，还包括思想观念认知。作为这个大变局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崛起自然被视为关键变量之一，其所催生的“中国课题”不仅重要性和复杂性不同于过往，而且作为国际秩序之争的头等重大问题，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大国权力政治的核心议题。结果，当今中国的大战略缔造，将不得不在一个具有极大战略压力、同时兼有战略机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反复强调，中国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的，同时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重要原因。^②

再次，清醒认识和把握政策层面处理四对关系特有的挑战。对中国这样

^①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 27.

^② 21 世纪初，中国政府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而中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4 页。在新时代，中国政府特别强调了影响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的问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20 年 10 月 30 日，https://politics.gmw.cn/2020-10/30/content_34322553.htm。

的当代巨型国家而言，大战略缔造是一个既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压力、又涉及国家治理和关系运筹的过程。在这方面，政策上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大国和周边两类国家、陆地与海洋两大方向至关重要。应当看到，这四对关系之所以特别紧要，很大程度上在于处理和优化上述关系面临的挑战巨大，它们与国际权势转移导致的中美战略竞争、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催生的价值多元对立、民粹主义思潮下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社会理念间的冲突、国家安全追求过程中传统战略领域与新兴战略领域的战略能力建设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将上述四对关系的处理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反复予以强调。

第二，作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中国高度重视国际秩序问题，强调自己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继续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与义务。^① 据此，中国在下述四个方面重点施策。

首先，遵循当今世界权力政治的内在逻辑，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时代，随着中国由大向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战略影响越来越大，相应地受到的战略反弹也越来越大，其中特别是来自主要大国的影响甚至冲击越来越大。因此，就大国外交而言，我们需要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战略运筹：一条战线是发展和处理与美国、日本、欧盟等所谓“西方民主安全共同体”核心成员的关系，另一条战线是发展和处理与俄罗斯、印度等非西方新兴大国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战略规划、创新思维和分类施策，稳定继而推进乃至优化大国关系及其关系网络，防止出现针对中国的联合阵线。

其次，突出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定位，弘扬和践行正确义利观。在对外关系领域，中国政府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不断寻求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外交，将其视为总体外交布局的基础，并发展提炼出一套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方针。据此，在发展与包括

^① 戴秉国：《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三个范畴》，外交部网站，2010年12月08日，<http://politics.rmlt.com.cn/2010/1208/12276.shtml>。

周边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在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时，尽管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益突出，但中国强调“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强调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维护安全、发展、秩序、正义这些基本价值，义利兼顾、弘义融利。

再次，顺应国家大战略缔造的内在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时代，随着中国被推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自然也就成为西方战略博弈的重点对象。与这样强大的对手进行战略博弈，关键是凭实力说话，首先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提升战略能力，如此才能行稳致远。在夯实大战略国内基础的同时，同等重要的还包括优化大战略实施的外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②

最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出并始终奉行的基本国策。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③ 本着这样的理念，中国提出并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仅更加休戚与共，而且需要更高的理念引领，该理念有助于破除零和思维和强权逻辑，有助于凸显和平发展和义利兼顾，有助于推进战略协作和互利共赢。

进入 21 世纪，中国不仅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且也一定能够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调整、优化，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 年 3 月 30 日，第 2 版。

中美战略互动与东亚地区秩序

刘丰

由于地区权力结构变化以及主要大国战略关系的调整，冷战结束以来相对稳定的东亚地区秩序正面临冲击。对于地区秩序的走向，学术界近年来多有争论，不同理论立场的学者作出了大相径庭的判断。由于大国力量对比是塑造地区秩序形态的首要因素，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实力消长和互动模式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显然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美两国与地区中小国家基于稳定安全和经济收益预期的目标，展开了正向耦合（positive coupling）的良性互动，从而维系了东亚地区秩序的稳定。随着中美竞争态势凸显，双方关系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导致原有地区秩序的稳定性的承受了较大压力。探讨中美战略互动与地区秩序变迁之间的关系，可以为理解东亚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动力提供重要视角。

（一）理解东亚地区秩序

当前，东亚、亚太和“印太”等概念在学术文献、政策文本和媒体报道中被经常使用。这些概念所指涉的地理范围以及囊括的国家数量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参与地区合作的偏好与选择。但是，在描述地区体系时，东亚相较于其他两个概念更为合适。这是因为，一个地区或次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体系，需要行为体在相对明确的地理空间内展开紧密的战略互动。在国际体系中，秩序是主要行为体在互动领域达成的一套明确或默许的安排，目的是对彼此获益的内容、范围以及实现方式加以约束。秩序的核心功能是分配利益、调解冲突以及规范行为。秩序与制度通常被混为一谈，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秩序的形成和维持并不依赖于制度。秩序可能是高度制度化的，也可能以较低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在当今的东亚地区，尽管存在各种制度安排，但其正式性和约束力都相对有限。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区分秩序与秩序观。秩序是相对客观和稳定的，它可以被视为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果；

秩序观则是不同行为者对秩序的一种期许或愿景，它反映了每个行为者对自身在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预期。

地区结构和地区秩序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秩序建立在相对清晰和稳定的权力结构之上，但是在同一结构下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秩序安排。在多极和两极结构下，根据主要大国之间互动的方式，秩序可能出现均势秩序、协调秩序和共同体秩序等不同形态。在单极结构下，也会形成霸权秩序和共同体秩序的差异。秩序的具体类型取决于特定权力结构下大国战略互动的方式。一般而言，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国能够在秩序构建和维持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也获得较大的利益份额。权力结构的变化会对业已形成的秩序造成冲击，为新的秩序安排提供动力。为了争取在新秩序中占据优势，主要大国倾向于使用暴力或协调手段来推动彼此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在此基础上塑造新的行为规则和制度安排。

学术界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形态存在霸权秩序、均势秩序、共同体秩序、大国协调秩序、二元秩序等典型观点。^①这五种观点有一些抓住了地区结构中的某些特征，能够找到一些局部的事实支持；有一些则停留在理念层面，比如共同体秩序。从权力结构上看，东亚并不是完全的单极体系，也不是经典的多极体系，因此纯粹的均势和霸权秩序都不符合地区秩序的现实。相反，东亚秩序具有较强的多层性和复合性，这是由地区行为体的多样性、实力的动态调整以及发挥地位和功能的复杂性所决定的。2008年之前，东亚地区不存在典型的经济和军事多极，美国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其盟友和安全伙伴的支持，身处美国体系之外的国家也未明确挑战其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认为这个地区存在一个局部霸权秩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局部霸权秩序出现松动，目前仍处在转型和重塑的过程之中。

（二）中美互动与东亚秩序的稳定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地区之所以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

^① 关于地区秩序类型的讨论，可参见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6—34页；Amitav Acharya,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ise and Asia’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1, 2014, pp. 158-173.

主要在于地区主要行为体在经济和安全两个重要领域中的良性互动。在中国持续崛起这一影响地区权力结构的关键因素作用下，中国、美国和地区中小国家都采取了以经济接触和安全容纳为主要特征的战略。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以维护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为主要目标，安全上保持自我克制，经济上积极融入。中国意识到，只有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开放和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实现国家安全、政权稳定和民族富强等重要目标。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客观上强化了东亚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推动了地区内的经济合作。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主动融入，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生产分工网络，提高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利益融合程度。当然，经济融入并不能保证中国成为维持地区秩序的稳定器。中国面对的是相对复杂的地区安全环境，特别是与不少周边国家存在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争端。在处理争端时，中国选择在维权和维稳两个目标之间平衡，保持审慎克制的姿态，主动化解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冲突，以期创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

2010年以前，美国的地区战略和对华政策都有利于维持东亚地区秩序的稳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希望通过接触战略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并且希望促成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改变。^① 接触战略与中国融入国际和地区经济分工体系的需求相契合，使中美经贸关系在较长时期成为双方重要的利益契合点。从更大的背景看，在2001—2010年间，东亚并非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方向，其对反恐战争的投入限制了在亚太地区的力量部署和战略关注。由此，在20多年的良性互动中，两国虽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中时有摩擦，但基本保持了包容性竞争态势，合作而非对抗是中美双边关系以及在地区层次互动的基本面。

中美两国的包容性竞争使得地区国家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由于不存在明显的阵营对立，东亚中小国家自然不必考虑选边站队，还可充分利用中美

^① 无论是接触战略的支持者还是批判者，对于这一战略能够达到的目的显然都有错误预期。关于美国围绕对华接触政策的辩论，参见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真的形成共识了吗？——基于当前对华政策辩论的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1页；刁大明、蔡泓宇：《竞争性对华战略调整的美方争论》，《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115—149页。

两国在东亚地区提供的安全和经济公共产品。在这一时期，东亚中小国家维持着较大的对冲空间和政策灵活性，意味着地区秩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三）中美竞争态势与东亚地区秩序的松动

在 2010 年之后，为了应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展，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两个维度都改变了相对良性的对华政策。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明确将中国作为重要的防范对象。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更是明确被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无论是在奥巴马还是特朗普任内，美国推行的地区战略都具有高度排他性。当然两者所倚重的手段也有差异。奥巴马政府地区战略的经济支柱是多边的，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安排削弱中国在地区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而地区战略的安全支柱更多是双边而非多边。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上则主要依靠挑起贸易争端的单边手段，在安全领域则以加强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作为支柱。不过受美国整体实力衰退、在不同地区的力量投入受限以及国内政治掣肘，美国的整体战略处于收缩而非扩张期，两个战略都存在目标与手段不匹配的问题。^①

美国地区战略的转向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得双方关系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都出现了反向耦合（negative coupling）的态势。中美竞争对地区秩序的稳定产生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冲击。首先，竞争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恶化，出现更多安全摩擦和风险。其次，地区合作无法正常进行，既有的制度平台功能失调。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等多边场合，中美之间的立场分歧甚至严重对立的情形频繁出现，大大削弱了这些制度安排的效能。再次，由于中美双方提出一系列竞争性的地区议程，加之美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新技术等众多领域向地区国家施压，试图阻止它们与中国合作，地区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艰难选择。

（四）东亚地区秩序的前景

过去十年间，中美在安全和经济两个重要领域的战略关系从正向耦合转变为反向耦合，反映了双方在力量对比变化态势下彼此利益兼容性的下降。

^① 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当代亚太》2014 年第 4 期，第 4—28 页；Peter Trubowitz and Peter Harris,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Slow Erosion of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Usable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3, 2019, pp. 619-639.

当双方实力差距较大时，美国维持地区主导地位与中国追求国家发展之间能够找到兼容空间。随着实力差距缩小，美国意欲维持其地区主导地位，特别是以压制中国持续崛起来实现这一目标，则与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之间产生了较大矛盾。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对地区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引发了关于在东亚地区出现新的“两极对立”和“新冷战”的担忧。然而，冷战时期在亚洲出现两大阵营对立是在极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从地区层次看，这一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战后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寻求独立和国家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寻找强有力的外部支持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联系在一起。时至今日，地区国家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无论是政权稳定、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发展，都并不与某个大国完全捆绑在一起。

随着美国国内政权更替，拜登新政府的地区战略是将延续前任政府对华竞争的基本面，还是朝着更具建设性和合作性的方向发展，仍有待观察。过去十年间，美国的地区战略经历了由“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转变，这两个战略都试图在经济和安全上将中国排除在外，在政策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和延续性。对于拜登新政府而言，美国地区战略的核心目标和基本架构也将在整体上得到延续。不过，在特朗普当政的四年里，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和安全政策削弱了美国调动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地区经济格局中的权重持续上升，积极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安排，也倾向于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时至今日，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甚至是孤立和围堵中国的地区性安排已难以获得地区内中小国家的明确支持。

东亚地区权力转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地区秩序转型亦如此。在此过程中，中美双方需根据地区力量对比的动态发展调整各自预期，在共处中寻求各自利益的调整 and 适应，形成与地区格局相适应的利益安排。未来秩序不是以某个大国单独主导的形式出现，而是需要容纳地区主要大国以及中小国家并兼顾各方利益需求。

西方社会对中国国际秩序观及政策的认知

祁玲玲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崛起的中国是否会挑战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而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一直是西方媒体与知识精英讨论的焦点问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将该问题带入新一轮激烈论战。过去数年，西方各界通过解析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的重要报告、媒体信息、分析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新概念来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溯，又有对当前中国实力的解读。从目前对西方学术界、主流媒体以及重要智库报告的分析来看，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解读存在一些稳定观点和典型特征。

（一）西方认知中国与世界的立场

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各界主导性的认知是中国试图或正在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尽管从世纪之交西方各界就开始讨论中国究竟是守成国还是挑战国，但发展至今，西方的主流舆论已倾向于认为中国正在挑战国际秩序。从他者对中国的意图认知和实力认知两个维度来看，对中国与国际秩序的看法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兼具雄心和实力，已明确释放出改变国际秩序的信号，试图重塑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且有着诸如“一带一路”建设的保障。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体系，但尚不具备替代美国领导全球的实力。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长是事实，但其并不试图打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逻辑上的第四种类型，即认为中国既无雄心又无实力的论断在最近的三四年已鲜见。前三种观点尽管在认知上存在一定差别，但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会冲击国际秩序的基本假设上却存在共识，都高度关注中国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忧，是当前的主流观点。但西方社会各界得出中国试图或正在挑战国际秩序结论的原因却多元和碎片化，总体上展示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理解中的隔膜感、盲人摸象般的片面认知以及意识形

态视角下的冲突情绪。

（二）西方认知中国与国际秩序背后的多样逻辑

第一，有相当一部分分析基于对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观察，认为中国外交正进入改变国际秩序的阶段。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西方认为这表明中国外交也进入了新时代，并认为与之前中国外交中的“韬光养晦”有了明显区别，进入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新阶段。新阶段有着新气象，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论、“一带一路”、亚投行这样的新战略和新举措。西方社会通过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认为中国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正积极致力于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并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袖。与此同时，西方舆论认为目前中国相信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日渐下降，而这恰恰是中国的机遇。在少数的反对声中，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外交目标实际上存有模糊和不确定性，并呼吁西方各国要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分析中国的诉求，这些见解往往来自西方国家老一辈的知华派或对东亚文化有深入分析的人士，但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成为主流舆论。

第二，西方学者理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的另一条路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天下观”被理解为历史上中国在东亚所建立的一种国际体系模式，该模式不同于以无政府状态下相互竞争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是以朝贡体系为依托，建立了以“中华帝国”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文明的庞大体系。一些学者能够认识到“天下”体系中的中心国与霸权国的区别，也认为目前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严格遵循主权平等原则，并无打破现有国际体系重建“天下”的计划，看到了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的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交流。但他们同样也会讨论“天下观”的各种原则与现有国际秩序原则存在的潜在冲突，质疑“天下观”下实现和谐秩序的可行性，例如，他们认为中国的实力增长与周边国家间可能形成不平等的权势并向全球扩张。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天下观”最新的解读，是将“天下观”与“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相联系，他们似乎在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雄心中找到了“天下观”中儒家文明向外传播的影子。不过，这其中更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将“天下观”中国家间的不平等

原则以及儒家文明的对外影响，落脚在当前中国国内政治发展所形成的“中国模式”与现行西方民主意识形态可能产生的碰撞上，并将“天下观”的文明视角与冷战以来的意识形态冲突混杂在一起，体现出他们在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色彩。

受冷战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以选举为基本特点的西式民主价值在西方世界乃至一些转型的新兴国家中得到了广泛传播。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西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模式对西方民主造成的冲击。他们在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外交、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讨论中，都严重关切中国全球影响的扩大、中国的政治价值可能的溢出、对西方产生的威胁。这一强烈的意识形态底色几乎体现在他们对中国议题讨论的各方面，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技术进步、与各国的深入交流、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等均视为所谓的“威权主义的扩张”。而 2020 年中国成功抗疫的经历与西方各国疫情扩散形成强烈对比，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担忧与不安。历史完全没有像福山在 30 多年前宣称的那样终结，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后仍然面临着外部巨大的意识形态压力。

第三，西方舆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中国具体的外交政策。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成为西方舆论分析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议题。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实践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经验性把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其已经建构了欧亚大陆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和对话框架，但同时也认为“一带一路”可能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给沿线各国带来复杂影响。西方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批判性评价大体有两种思路，一种将其视为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另一种则强调其在实施过程遭遇的各种困境进而唱衰“一带一路”，但这两种取向反映了同样的意识形态冲突逻辑。这种思路同样反映在西方学者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讨论中，包括南海问题、中印边境冲突等。我们观察到，中国各层面的外交实践，尤其是在存有一定的国家间冲突的情境下，在进入西方舆论时或多或少都遭到了西方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质疑与批判，这些无疑将是中国扩大开放的潜在挑战。

第四，理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还必须了解西方各国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和政治大气候。当前，中国议题已随全球化进程逐渐进入西方国家国内大选的竞选议题，随着国内选举中政治化趋势的出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出与国内政治分裂相糅杂的复杂情况。例如，在美国大选中，中国议题已经在竞选广告、现场演讲、选民互动、候选人辩论中被频繁提及。一般来说，偏向保守主义的西方右派对中国的批判往往更为激烈，出现在保守取向的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更具攻击性，保守主义者对中美之间冲突的前景预判更为悲观。尽管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极化趋势使左右两个阵营持有对立的看法，但在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及捍卫本国利益上却有着普遍共识，这在中美贸易谈判以及西方各国在疫情冲击下民众普遍的对华舆论中都有所体现。

以上分析西方社会解读中国的复杂性反映在一些西方学者的辩论中，2020年10月23日，《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傅高义（Ezra F. Vogel）等八位美国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联合署名的文章《对华鹰派走过了头：进攻是对中国的错误应对》，该文是对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新近发表的文章《应对进攻的一条出路：如何击退北京》^①的全面批判与回应。文章认为弗里德伯格对于中国政策的鹰派立场基于一些关键性的错误预设，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反对声音归咎于政治体制的不同，实际上完全忽视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所带来的一些民族主义情结，而且错误地将意识形态对抗延伸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文章还批判了弗里德伯格试图将中国隔离在世界贸易与技术体系之外的激进主张，认为美中关系应该建立在现实和互惠而非最差预设的基础上。弗里德伯格对此批判文章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八位学者的文章充斥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诸多曲解。这是中国议题在当下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引发的一场典型论战，其围绕中国与国际秩序的核心议题展开，不仅展示了欧美精英对中国议题的分裂立场，而且也让我们看到西方社会观念对立背后所蕴含的对崛起的中国的深层认知共识。

（三）可能的应对以及未来趋势

^① Michael D. Swaine et al., "The Overreach of the China Hawks: Aggression Is the Wrong Response to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3,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0-23/overreach-china-hawks>; and Aaron L. Friedberg, "An Answer to Aggression: How to Push Back Against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5, 2020, pp. 150-164.

当前西方社会各界对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解读呈现出整体认知方向较为一致，但认知逻辑多元、复杂的特征。虽然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西方的解读却是碎片化、片面的，绝大部分西方人仍然不甚了解中国，意识形态对抗的思维惯性几乎成为西方认知中国的某种“便利”途径。在当前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社会分裂、政治极化、民主价值遭遇冲击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对崛起的中国会愈发敏感与关切，老一辈知华派的理性声音存在被重拾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遗产的保守舆论边缘化的风险。西方学者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解读与西方各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相互呼应，一系列民调数据已经表明了西方民众对中国日渐警惕的情绪以及对对中国大国领导地位的质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们需要在“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中，进一步把握“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方向。崛起的中国势必会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体系，这需要西方社会更加准确地认知和解读中国。

作为高水平开放战略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西方展示自我，加强双方在民间、精英、行政部门等各层面交流。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和平发展的信息准确而全面地传播到西方社会是一项巨大任务。其中，弱化对外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对抗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尽管西方价值的偏见一时很难改变，但在中国外交、中西交往中也需要避免加剧这一问题，要淡化意识形态用语，以更加精确而中性的语言表达中国意图，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歧义，并在建立互信的交流中弱化西方的意识形态诉求。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对西方社会的普遍疑虑及其背后的逻辑要有深刻而精准的把握。西方社会自身正经历着的剧烈震荡以及内部撕裂，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理解西方社会对华认知的复杂性。在各国不同选举周期的影响下，如何充分理解各国国内政治运行的逻辑以及与此相联的对华认知与战略，对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往进行准确的解读，是当前中国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国际关系学界面临的重大挑战。复杂的国际环境呼唤中国与世界更加冷静而客观地互相解读与认知，我们也将继续观察各方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世界大变局中的频繁博弈。

霸权护持：大变局时代美国国际秩序观的坚持与调适

毛维准

作为当今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国，美国正处于系统性的“大变局”时刻。首先，它必须直面新兴国家崛起等结构性挑战，应对国际竞争者对其地位与霸权秩序的冲击。其次，美国也需要应对国内政治的巨变，无论是政治极化还是民粹崛起、抑或种族主义兴起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在当前国际社会中的行动力和权威性。再次，美国政治体系运行的周期性动荡前所未有地将其外交政策置于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是通过拜登“拨乱反正”还是维持“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政策辩论正在加剧。最后，疫情与经济、金融震荡等加剧了美国在国家利益、国家实力根基与外交政策工具运用效率方面的不确定性。当然，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会延续其在二战后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逻辑，还会因“大变局”要素冲击而调整其霸权护持的主观判断。

（一）美国国际秩序观一以贯之的逻辑

基辛格曾经指出，“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①但是，在政策多变的同时，美国“大战略”实际上保持着稳定^②，这种稳定的国际秩序观反映出美国始终坚持的五种逻辑。

第一，二战之后，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总目标是护持全球霸权。二战后美国国家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因霸权而立、依霸权而治、为霸权而设。当前国际秩序始终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最依赖霸权体系运行的国家，卡根（Robert Kagan）认为，美国“无法忍受其全球领导角色的终结”^③。因此，当霸权地位受到威胁时，美国便会以维持霸权“体系的健

① [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5 页。

② 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 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2018, p. 9.

③ Ivo Daalder and Robert Kagan, “The U.S. Can’t Afford to End Its Global Leadership

康发展”之名并借助“美国外交政策智慧、力量和远见”而为所欲为。^①

第二，在霸权护持的前提之下，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斗争逻辑一直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二战后，美国坚持遏制政策，并推动其政治文化从共识建构走向极端对抗。^② 遏制也意味着强化伙伴并打造同盟，其斗争性衍生出美国以排他性为特点的“例外主义”和“以友制敌”的全球制衡战略。冷战结束后的“离岸平衡手”“四方安全对话”与“印太战略”等都体现出以上逻辑。

第三，帝国扩张是美国国际秩序观的基本特征。扩张既是权力也是资本的本性。帝国理念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与美国霸权或领导权相辅相成。在霸权目标和自身利益的双重驱动下，美国的帝国冲动始终存在。2000 年左右，美国正处于“后冷战”的实力巅峰，其保守主义兴起，“新帝国主义”等倡议甚至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选项。^③ 美国国际秩序观中的扩张性促使其以“先发制人”的态势来遏制竞争对手，这种“先发制人的诱惑”会冲击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④

第四，美国的延伸性国家利益观影响着其注意力边界。美国对影响其霸权的国家利益议题异常敏感，追求所谓“持久永恒”的国家利益。例如，1993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基本国家利益和目标与美国领导权的要求是一致的”。美国多次强调，它只会支持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从里根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美国国家利益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持续扩展的过程，它刺激着相关议题的“政治化”与“安全化”，影响着其国际秩序观。

第五，美国国际秩序观也存在着内在冲突。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美国外交从来不是“单一且统一的世界观”^⑤。一方面，美国国际秩

Role,”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2016,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2016/04/23/us_can039t_afford_to_end_its_global_leadership_role_381013.html.

①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0 页。

② 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美国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45 页。

③ 焦世新：《冷战后的时代变迁与美国战略》，时事出版社 2015 版，第 64 页。

④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2002, pp. 44-45.

⑤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第 58 页。

序观是包含不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且存在二元冲突^①的“拼盘”。美国国际秩序观的建构依赖“相互区别、相互竞争的声音和价值观之间的平衡”^②。价值观冲突也反映到美国党派冲突甚至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争中，它们在20多个外交政策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③另一方面，不同代际的国际秩序观也存在差异。不少调查显示，“婴儿潮”一代及“沉默”一代受访者与X一代和“千禧”一代的受访者在内政与外交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④

（二）美国国际秩序观的调适逻辑

美国国际秩序观依赖于国际背景、国内政治和领导人意向等因素而发生显著变化。在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国际秩序观强化了其霸权护持力度、斗争强度、扩张程度、利益驱动逻辑和内在冲突张力。

第一，美国正在建构竞争性日趋显著的国际局势认知。美国自认为是实力强大的超级霸权，同时，它也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挑战其权力、影响力与国家利益，损害其安全与繁荣。例如，美国对自身的强大军事力量保持自信，但是，其对中国等大国正在进行的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现代化更警觉，担心这会威胁其霸权地位。

第二，美国的国际角色认知表现出偏执色彩。面对国力相对衰落的现状，美国更强调本国的国际领导权和霸权地位，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将美国置于第一位置是本届政府的义务，更是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基础”。在该理念指导之下，美国在规划自身国际角色时走向极端，极度担忧“边缘行为体会填补美国造成的真空”，甚至一改“慈善霸权”面目，不惜以破坏国际秩序为代价与竞争者进行消耗战。^⑤

① 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1页。

②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第xxi、58页。

③ Dina Smeltz, Ivo Daalder, Karl Friedhoff, and Craig Kafura, *America Divided: Political Partisanship and US Foreign Policy (Results of the 2015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 Chicago Council, 2015, pp. 17-37.

④ Patrick Fisher, “Generational Cycles in American Politics, 1952–2016,” *Society*, Vol. 57, No. 1, 2020, pp. 22-29.

⑤ 相关讨论参见丑则静：《从转型到危机：“美国优先”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第46—65页。

第三，美国在面对潜在安全风险与竞争对手时警惕性更高。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被美国视为“改变现状的国家”和“最关切的竞争对手”，它认为中、俄两国正在发展威胁美国的军事能力。例如，美国将中、俄政治军事发展、先进技术研发、军备竞争、重大事件冲击和人口变化视为未来的重大威胁，将中国崛起、俄罗斯扩张、伊朗与朝鲜核问题、失败国家与恐怖主义等视为长期威胁。高度警惕的美国必然会延续其战略对抗逻辑，并将这一逻辑与秩序之争结合，强化自身的既有认知。

第四，美国正在形成一种以选择性排斥和集群为特征的强势国家利益观。一方面，美国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损害其国家利益，鼓吹捍卫国家利益的合法性，试图动员资源、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反击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面对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状况，美国强调与盟友、伙伴的共同利益，注重通过建构国家间网络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并适当兼顾盟友利益。

第五，自利的改革主义是美国对国际制度的基本态度。美国认识到当前的国际制度总体上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面对自身制度影响力下降，美国指责一些国家正在“压榨”国际制度。实际上，美国大多以功利的态度看待国际制度，并因此极端化为根据美国利益决定国际制度的兴亡。美国宣称其“负担过于沉重”^①，一些美国政客甚至扬言，如果国际机构与其利益不符，那么“就必须改造或取消”甚至“合法地退出或重新谈判过时或有害的条约、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利益或盟国利益的国际协议。”^②

第六，美国护持霸权的路径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征。美国试图通过利益共享与责任划分的方式来推动盟友和伙伴参与秩序的建构，推出各种地区战略，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影响各类问题（能源、贸易、网络、政治、人权、军事、人文等）的应对，并采取盟友“再平衡”、“对等”贸易、经济威慑、先进技术管制、能源控制和军事恫吓等政策围堵中国等国家。

第七，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价值。美国立足自身利益塑造国际秩序，

^① Doug Stokes, “Trump,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133-150.

^② Michael R. Pompeo, “Restoring the Role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German Marshall Fund, Brussels, December 4,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12/287770.htm>.

包括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本国民众、延续美式生活、促进经济繁荣和提升影响力等。在延续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美国也致力于向其他国家推广法治、自由、开放、规则等价值，并以此塑造其国际秩序观。当然，这只是美国霸权秩序的寄生物。

（三）大变局背景下的美国对霸权秩序的护持

目前，美国处于政权更替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的冲击之下，国际秩序观中的内在矛盾可能增加美国对外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但是，应对中国挑战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在党派攻讦和疫情问题上，中国都被纳入美国政治争论中。美国霸权秩序观中的扩张性、斗争性和冲突性因素因此得以凸显。美国国际秩序观中的基本逻辑以及美国新政府与中国在磨合期内打交道的方式和成效，将决定未来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

首先，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会维持在现有轨道，双方矛盾可能继续加剧。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会恶化。同时，伴随美国“政治极化”趋势和民粹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疫情的政治操弄，中美价值冲突与意识形态的矛盾势必升级，两种矛盾相互缠绕，双方缓和空间很小。尽管拜登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是，在既定国内政治结构下，鉴于民主党特性，其国际秩序观中的偏执和冲突维度显然会诉诸意识形态强压策略，美国仍会在“中国威胁”、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这将使两国的对抗性上升。进而可能带来美国强化盟友关系、挤压中间地带和孤立中国等竞争者的政策后果。

其次，美国对华实施遏制战略的议题战线会持续扩展。美国必然会在经贸、军事和国际制度等议题上向中国全面施压，并在高科技、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等新疆域加强围堵。在国际层面，美国会回归多边国际制度轨道，宣扬规则意识；当然，与特朗普政府相比，作为建制派回归的拜登新政府可能稍显“优雅”，在多边舞台上更为“成熟”。在地区层面，拜登新政府无论是重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巩固“印太战略”，其涉及的议题都会从安全领域蔓延到经贸、基建与人文等领域。美国将各类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逻辑仍会持续嵌入到与中国“软实力”“锐实力”“影响力”和“军民融合”等相关的话语体系中，并具体化到更宽广的议题领域。

当前欧盟的国际秩序观与战略转型

张晓通、何樱灏

面对当前国际秩序重组、欧盟内部多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欧盟在“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指导下实施战略转型，通过更灵活、务实的国际秩序观和战略，打造“地缘政治欧洲”，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加强内部团结，争取战略自主，强化区域合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巩固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同时，欧盟当前的国际秩序观与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存在对接的空间，未来双方可以深化合作。

（一）欧洲的国际秩序观走向“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

国际秩序观一方面指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另一方面指对理想国际秩序的偏好。欧盟理想的国际秩序观是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中提出的“有效的多边主义”，但当前其国际秩序观则开始减少理想主义成分，迈向“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首先，“有效的多边主义”是欧盟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化构想，直接影响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实践。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① 出台的背景是欧洲经历了冷战后的繁荣、自由和安全。因此，欧盟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希望借多边主义框架，实现有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具体是把欧盟打造成为一支“规范性力量”，借助欧洲价值观和规范输出，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其次，内外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欧盟国际秩序观的调整，迈向“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一方面，国际秩序变革和重组，国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文明和宗教冲突的多重危机在全球蔓延；另一方面，欧盟内部危机频现，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问题，使欧洲一体化面临倒退的风险。因此，欧盟的国际秩序观朝着“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发展，并在实践中表现出多边主义的灵活性。

第一，2003—2016年，欧盟从“有效的多边主义”过渡到“有原则的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December 2003.

务实多边主义”。2016年6月，欧盟对外行动署发布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战略，对欧盟的力量模式和输出观念进行修正，强调欧盟全球战略^①的核心是构造一个更强大、团结的欧洲。在面对外部危机方面，“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成为欧盟对外行动新的指导方针，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放弃了“有效的多边主义”，而是采取更务实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具体实践中，欧盟不再只向世界推行以规则为基础、从上而下的国际机制，而是探索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打开贸易等领域的大门。^②此举体现了欧洲多边主义的灵活性，为此后发展多边关系和多边框架提供了更大空间。

第二，2016—2019年，欧盟在“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指导下的实践过程。2019年，欧盟对外行动署基于当今世界联通性、竞争性和复杂性增强的大背景，对过去进行总结，对对未来发展进行战略部署，发布了《欧盟全球战略：三年回顾与未来期待》。^③面对全球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竞争，欧盟对外行动列出了五点优先事项，可分为三类：强化欧盟自身安全、增强合作性区域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欧盟、区域和全球三个层次进行策略部署，多边主义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更强。

第三，2019年至今，疫情大流行导致欧盟再次面临危机。在欧洲一体化层面，疫情初期，欧盟成员国争抢医疗物资、关闭边境导致人们对欧盟内部团结的质疑加重。在区域治理层面，欧盟的周边国家对其不伸出援手表示不满。在全球卫生治理层面，欧盟并未在疫情防控方面占据领导地位。面对2020年冬季疫情的持续蔓延，欧盟如何在疫情大流行中更灵活、务实地发挥其多边主义优势，还有待观察。

综上所述，欧盟的国际秩序观从最初的“有效的多边主义”的理想范式，到如今的“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本质上反映出欧盟对于自身和国际秩序的现实认知与妥协，并逐步朝着务实方向转变。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June, 2016.

② Balazs Ujvari, “The EU Global Strategy: From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to Global Governance That Works,” *Egmont Security Policy Brief*, No. 76, July 2016.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Union’s Global Strategy Three Years On, Looking Forward,” June 2019.

（二）“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指导下的欧盟战略转型

在全球治理层面，欧盟积极打造“地缘政治欧洲”，强化军事和经济力量，提高欧洲的硬实力。面对世界格局变化，欧盟期待建立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在内部治理层面，欧盟则加强安全建设、维护欧洲的团结，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向世界展示欧盟的“规范性力量”。

第一，构建“地缘政治欧洲”。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欧盟寻求与之适应的自我定位，以对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进行调整。过去，欧盟的国际身份是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或拥有较强的软实力，^①但是随着多边主义受挫，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荷兰总理曾针对欧盟发表演讲称：“当今欧洲对外政策必须更加务实，少些天真。”^②2019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将自身定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强调欧洲的地理因素、加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欧盟真正成为“地缘政治欧洲”的宏大目标遭受重创。受疫情影响，2020年欧洲的内外计划搁浅。首先，疫情前欧盟推出的诸多战略和政策举措，如“建设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欧洲新产业战略”等将延误。其次，“地缘政治欧洲”的建立是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在疫情初期欧盟各成员国自顾不暇，未能团结抗疫，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地缘政治欧洲”的内部团结。再次，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多边组织，未能利用“地缘政治欧洲”的优势，积极援助周边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欧盟的形象。^③

基于多边主义受挫和国际格局变化的现实考量，2019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构建“地缘政治欧洲”的战略。但是，面对疫情考验，欧盟的危机应对能力还有待提高。疫情之后，“地缘政治欧洲”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未来欧盟持续打造军事、安全硬实力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第二，追求“战略自主”的呼声高涨。“自主”一词是“主权欧洲”的

① 周弘主编：《欧盟是怎样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 Anthony Dworkin and Richard Gowan, “Rescuing Multilateralism,”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June 25, 2019,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rescuing_multilateralism.

③ 黄静：《欧盟“战略自主”放缓脚步》，《中国国防报》，2020年5月18日，第4版。

组成部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对此非常重视。事实上，这是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以及跨大西洋关系变化后，欧盟反复重申的观念。欧盟强调的“自主”主要指“战略自主”，这意味着欧盟不再只注重于安全和防务政策层面的自主，也注重包含外交政策层面的自主，确立了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具体表现为：首先，在防务层面，欧盟表示不能一味依靠美国领导的北约，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曾公开表示欧洲需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其次，在外交层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2020年7月访问丹麦等欧洲国家，希望与欧洲各国共同打压中国，但欧洲并未对此形成统一声音。再次，在网络安全层面，美国希望欧洲选边站队，共同打压中国企业，但欧洲希望寻求“第三条道路”。最后，在对外安全问题上，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分歧严重。由此，欧盟在实践中积极推进“战略自主”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此外，欧盟也始终强调自主并非孤立，更不代表走向多边主义的对立面，而是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创建联盟和多边议程，利用好欧盟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框架，更好维护多边主义。

第三，深化“规范性欧洲”的发展。尽管欧盟委员会转向追求硬实力，但并未忽视欧盟以规则为基础的软实力，也坚持以价值观为指引的“规范性欧洲”。首先，在全球治理层面，欧盟持续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领导力。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推出“欧洲绿色新政”。在欧盟内部提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绿色投融资政策，推广绿色技术。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期待通过绿色外交改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巩固欧盟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地位。这表明，欧盟在追求“地缘政治欧洲”的同时，并未放弃“规范性力量”的底色。其次，在加强欧洲一体化层面，欧盟深知“规范性欧洲”的核心在于欧洲的“多样性统一”。一方面，欧盟强调成为全球治理参与者的前提是欧洲内部团结。另一方面，欧盟需要以团结的多边组织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才能“以身作则”向世界输出多边主义和欧洲规范。然而，欧洲一体化频现危机，疫情再次暴露了欧盟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和成员国之间的分歧，^① 欧盟的内部团结饱受质疑。面对多重危机叠加，

^① 金玲：《世界秩序演变中的欧盟一体化前景》，《人民论坛》2020年第22期，第32—34页。

欧盟需要采取更有雄心并能落实到位的行动。于是，2020年5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欧盟复苏计划，希望借助复苏基金和产业战略调整等方式进一步团结欧洲，推进一体化，向世界展现区域多边组织的“规范性力量”。

（三）欧盟践行“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的走势以及与中国互动

第一，欧盟的国际身份需要重新定位。欧盟过去一直以“规范性力量”的形象活跃于国际舞台，强调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这让其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行动实施“价值观外交”。但在转向基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欧洲”时，对外行动将采取审慎的实用主义策略。“地缘政治欧洲”强调大国博弈、力量对比和竞争，偏向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和“霍布斯世界”。而“规范性欧洲”背后的理念是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强调国际制度与合作，指向的是“洛克世界”和理想主义的“康德世界”。欧盟这两个身份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张力，如何采取一种平衡与折衷的策略，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是欧盟亟须面对的。但是，无论采取何种策略、以何种方式确立国际身份，欧盟都将对未来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影响。

第二，中国需要鼓励坚持多边主义的欧洲。欧盟“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国际秩序观与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存在合作和对接的空间。一是中国理解的“共商”主要是指各国政府之间的“共商”，欧盟所理解的“共商”是国家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之间的“共商”。但是，国家治理和多元协调治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治理模式。中欧可以在不同领域运用两种不同治理方式。二是欧盟认为中欧双方在气候变化、难民与移民、可持续发展和多边机构改革等基于多边主义理念的全球治理领域存在着广阔合作空间，这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共建”“共享”不谋而合。三是在“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指导下，欧盟把合作性地区秩序作为奠定全球多边主义的重要基石，这与中国的正确义利观中强调开放的区域主义、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理念一致。总之，在价值观上求同存异，未来中欧之间就有望在更多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责任编辑：孙震海]

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 世界体系的影响

——兼谈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的新作用

叶 江

【内容摘要】 2020 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与政治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加速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现代世界体系便开始形成，并在百余年前发展成为全球性体系。这一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最为基本的两对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冲击，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能转换以及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将发挥新的作用。

【关键词】 现代世界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治理再国家化 新旧动能转换

【作者简介】 叶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1-0048-19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1003

2020 年在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均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早在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这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世界体系在当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作出的精辟总结，也是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动能转换、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等的高度概括。疫情与现代世界体系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关系紧密，本文将从探讨世界历史及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入手，系统分析疫情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以厘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疫情影响下的未来走向，并进一步讨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以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所提出的新理念和所能发挥的新作用。

一、世界历史、现代世界体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马克思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③由于马克思所言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指的是从 15、16 世纪开始从欧洲形成并随后扩张至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因此，这就意味着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出发，人类的历史是从前资本主义的区域性历史向进入资本主义之后的超越区域性的世界历史演化的过程。毫无疑问，迄今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言的形成于五百余年之前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现代世界体系也就开始发生、发展起来。

① 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央广网，2017 年 12 月 29 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229/t20171229_524081025.shtml。

② 本文中，凡未特别注明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均特指当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涉及过往历史中的百年大变局。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页。

（一）从西欧一隅到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人类历史从区域性走向世界性的过程中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主要构成部分的体系:其一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其二是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家体系,也就是现代国际政治体系。^①然而,不论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还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都是从西欧一隅形成,然后扩展成为全球性体系的。沃勒斯坦指出:

“1450—1640年是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在这段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西欧)创立起来了。”^②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相对应的国际政治体系则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正式形成的,当时也仅局限于西欧。然而,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③,因此随着世界历史形成而产生的由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共同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最终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体系。

现代世界体系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全球性的体系。列宁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④当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之后,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体系由此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全面地深入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从此开始掌控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体系,占据着全球性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

（二）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两对基本矛盾并推动体系的演变

现代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在其内部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两对基本矛盾。现代世界体系中这两对矛盾的运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② 同上,第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④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1页。

动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走向。这也就是说，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在现代世界体系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体系之后，这两对矛盾也就成为世界性的遍及现代世界体系内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最为基本的矛盾。

现代世界体系迄今已经历了五百余年发展演变，而且其成为全球性体系也已百余年。在其内部两对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都经历过各种变化，甚至经受过巨大冲击，如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但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性却始终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今天的人类依然生活在全球性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之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欧美大国始终主导着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体系走向，而近百年来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舞台中央也始终为欧美大国所把持。

（三）现代世界体系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疫情的影响

进入 21 世纪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影响下，过去百余年来由欧美大国把持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权力在进入新千年之后持续增强，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中国在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由此而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首次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导致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①与此同时，世界市场经济领域的经济发展新旧动能也开始发生巨大转变，现代世界体系开始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 年 7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在阐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强调：“未来 10 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10 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 10 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 10 年。”^②毫无疑问，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相关联的变革，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变则是与国际政治体系紧密相关的变化。但是，这两方面的深刻变化却都不以改变现存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的性质

^① 有关进入 21 世纪之后新兴大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讨论，参见叶江：《论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与转移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第 56—63 页。

^②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26 日，第 1 版。

为导向。因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两者的逻辑归宿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重塑。全球治理的内涵包括由国家、公司和市民行为体之间持续地和竞争性地互动所创立、维持和改造的一系列制度。^① 显然，不论是世界经济动能转换、还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变、或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实际上都是现代世界体系之中的巨大变局。

正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在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亦即在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其中的两对基本矛盾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着根本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全球暴发的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内部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疫情与现代世界体系内部两对固有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疫情对发生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经济动能转换、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并厘清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未来趋向，从而更为清晰地认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将如何发挥新作用。

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与疫情对世界市场经济及其动能的影响

现代世界体系内部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发展演变具有巨大的影响；而 2020 年暴发的疫情则在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固有矛盾的同时，通过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对固有矛盾。

（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张力依旧但可缓解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

^① Robert O'Brien,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Matthew J. Hoffmann and Alice D. Ba, eds.,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 Coherence, Con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213.

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从劳动到土地乃至其他生产资料使用日益社会化的过程，同时，私人占有的资本却越来越高度集中和垄断化，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张力十足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② 这也就意味着，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也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即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市场经济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不断突破国家范围而形成全球范围的社会化，巨大的社会财富却集中到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私人手中。于是，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必将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③ 至此，现代世界体系最终走向解体和终结，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由全球性共产主义公有制所取代将成为必然。

然而，从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演变历史看，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过程则是相对比较漫长的。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形成包括“引进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引进新技术、引用新的原料、实现企业本身的新组合”等所有因素在内的创新。^④ 正是在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由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阶级对立、社会不公、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对抗等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现代世界体系也因此而能持续地维持。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实际上是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一种反应，并且对其具有相当大的缓解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③ 同上，第874页。

④ 参见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0。

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在加剧上文分析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同时，却也对当前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疫情加剧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

首先，疫情导致自 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据世界银行 2020 年 6 月估算，2020 年全球经济将收缩 5.2%。^①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Catherine L. Mann）认为，疫情使得自 1969 年以来人类首次面对全球性的 GDP 负增长，就 GDP 而言，目前也许遭遇了 7—8 万亿美元的损失。^②其次，疫情使得世界各国的失业率大大增加，进而影响消费。国际劳工组织（ILO）2020 年 6 月发布的《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2019 冠状病毒疫情和劳动就业（第五版）》指出：2020 年上半年，全球减少的工作时间大幅高于先前的预测值，且 2020 年下半年全球劳动力市场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③再次，疫情一方面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供给侧受到诸如封城等防疫措施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层面的需求侧也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许多国家面临多层次的危机，包括卫生冲击、国内经济动荡、外部需求急剧下降、资本流动逆转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④，以致目前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在疫情暴发后，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⑤最后，疫情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不均。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提出，疫情大流行加剧全球财富不均，缺乏社会保障的穷国人民受到的打击最大，发达国家央行通过购买国债来刺激经济则对富人有利；疫情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巨大灾难，其长远发展可能受到重创，全球经济可能需时数年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⑥

① 《全球经济展望》，世界银行网站，2020 年 6 月，<https://www.shihang.org/zh/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② 《美国专家：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严重性和异质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0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nsd.pku.edu.cn/sylm/gd/503758.htm>。

③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Fifth Edi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June 30, 2020,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9399.pdf。

④ 《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2020 年 4 月，<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⑤ 浙江省并购联合会：《美联储对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下一步美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最新看法》，搜狐网，2020 年 7 月 2 日，https://www.sohu.com/na/405261733_120380503。

⑥ 《世界银行：预计疫情加大全球贫富不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网站，2020 年 7

疫情之所以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失业骤增、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贫富悬殊加大等危机，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如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所提出的，正是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即与劳动创造的财富相比，代际继承的财富具有绝对优势，资本集中将走向极端，造成社会不公。^①另一方面，由疫情所引起的这一系列危机则又反过来激化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本矛盾，并由此而导致现代世界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如同马克思所言：“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②。除非彻底地摧毁现代世界体系而建立超越该体系的全新的人类社会形态，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将始终对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负面影响，并且会由于诸如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而加剧。

(三) 通过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疫情缓解了固有矛盾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对缓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疫情本身则对此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主要指由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互联网和物联网、云计算和云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的新产业与新业态、新模式与新经济、新技术与新动能等对旧经济形态和产业形态以及旧的技术和发展动能进行全面替代。更重要的是，由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与信息技术(IT)紧密相关的摩尔定理，即集成电路性能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的这一定理正在被超越。诸如复合半导体、量子技术、石墨烯等具有超高电子技术性能的新技术正进一步加速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经济管理方面，传统的管理思维习惯、管理方式和方法、管理操作流程等已经或正在被新的管理思维习惯、管理方式和方法、管理操作流程乃至整个新的经济运作

月3日, 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4114/2020/0703/1273681/content_1273681.htm。

① 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模式所取代。全球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等在原创性技术、高科技产品、数字化商业应用技术、新型物流设施等推动下焕然一新。十分引人注意的是，2020年的全球疫情在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相当明显地从下述三个方面加速了世界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

第一，作为新旧经济动能转换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运作数字化转型在疫情中加速发展。疫情的全球扩散促使全球经济活动加快转向云协作，经济管理和运作更倾向于使用虚拟且灵活的团队和大数据。所有这一切在疫情之前已被大多数企业列为待办事项，但是随着疫情的蔓延却变成了必办事项。

第二，全球企业在疫情暴发之后加速提高自动化水平。未来学家瑞文·杰苏萨森（Ravin Jesuthasan）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每当遇到经济衰退时，我们都会通过更高的自动化程度摆脱困境，而我们现在恰好处于所有衰退之源。”^① 世界各地企业的经营思维和战略方向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加速改变，在利用新兴技术提升工业自动化水平方面，全球各种不同企业的态度都变得更加积极。全球疫情大流行导致大量企业裁员，但这却对自动化的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因为企业会使用机器人替代已经被解雇的工人来解决疫情造成的成本问题。

第三，在疫情中“远程移民”（telemigration）这一新的第三产业工作业态迅速扩散与增长。鲍德温（Richard E. Baldwin）首先提出“远程移民”这一与新旧经济动能转换紧密相关的新术语：当代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使得甲国居民能十分容易地从事位于远方的乙国或丙国的办公室工作，就像自己已经“移民”到乙国或丙国一样；归根结底，“远程移民”实际上就是工作、尤其是白领工作的全球化。^② 疫情极大地促进了“远程移民”在亚洲、欧洲、大洋洲和美国的发展，因为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国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许多企业员工只能居家办公，企业因此决定将计算机屏幕前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低薪国家的“远程移民”，从而形成了更新版本的服务业全球化。

^① Annie Nova, “Ami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any Companies Could Replace Their Workers with Robots,” CNBC, June 6,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6/06/how-companies-plan-to-hire-robots-after-coronavirus-layoffs.html>.

^② See Richard E. Baldwin, *The Globotics Upheaval: Globalization,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Wor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Telemigration and Globotics Transformation.”

显然，疫情在加剧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通过促使新旧动能转换的提速和形成更新版本的全球化，加速了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一矛盾对整个体系的否定性冲击。世界银行 2020 年 4 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经济将负增长 5.2%，其中发达经济体为-7.0%，新兴经济体为-2.5%；但是，2021 年全球经济将可能大幅反弹，预计将实现 4.2%的正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为 3.9%，新兴经济体为 4.6%。^① 由此可见疫情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双重作用和影响。

三、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和疫情 对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变的影响

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是指现代世界体系当中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大变局，并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息息相关。而习总书记所提出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则是指发生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大变局，并且与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和市场的基本矛盾相互关联。显然，疫情恰恰也是通过与国家和市场这对基本矛盾的互动而对当前国际政治体系的大变局产生影响。

（一）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决定国际政治体系演变

自现代世界体系中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形成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就决定着国际政治体系及其结构——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

马克思在其晚年的手稿《历史学笔记》中专门探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的出现，以及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通过考察三十年战争及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马克思分析了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主权国家的兴起过程，以及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这样的两种既相

^① 《全球经济展望》，世界银行，2020 年 6 月。

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社会组织如何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而发展。^①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吉尔平 (Robert Gilpin) 也指出: 正是从 16 世纪开始, “民族国家基本上取代了近代以前的政治组织形式, 如城邦、部落和帝国。与此同时, 市场成为组织经济关系的基本方式, 取代了互惠、再分配与帝国统治经济等其他交换形式。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 贯穿着数百年来历史, 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 逐渐成为决定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② 需要注意的是, 马克思更为强调的是世界市场在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这显然与当时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有密切关系。

在有关世界市场与主权国家相互关系以及两者的矛盾运动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作用与影响方面,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 更为强调国家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之后的大国即帝国主义列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吉尔平认为,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基本上是关于国内经济的理论转变成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主要限于西欧……但是, 在 1870 年到 1914 年间, 资本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技术型的和逐渐全球性的开放体系。”^③ 根据列宁的分析,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开始形成的全球性开放时期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转向垄断的时期, 也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时期。列宁认为, 各资本主义强国在帝国主义时期对世界的分割和重新分割对当时世界历史的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 “张伯伦曾经特别指出目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所遇到的德国、美国、比利时方面的那种竞争, 而鼓吹帝国主义是‘代表真理的、英明的和经济的政策’。”^④ 这充分显示出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世界市场与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运动, 决定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格局走向, 西方大国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① 参见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四册中的具体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杨宇光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 页。

③ [美]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第 40 页。

④ 《列宁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799 页。

更为重要的是，列宁针对现代世界体系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特征，即“垄断、夺取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趋向代替了自由贸易和竞争”^①，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②。列宁认为，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规律，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先发国家会因为垄断资本的负面作用而出现生产和技术的停滞，而后起国家则有可能在大规模引进先进科技和外资的情况下实现跳跃式发展并赶超先发国家。于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就会出现不同大国的频繁崛起。就如列宁所举例的那样，“如果拿 19 世纪中叶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而到 20 世纪初德国的实力已能与英国抗衡，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③

（二）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对当今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大变局的影响

马克思和列宁对随着世界历史发展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演变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经典探讨与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加速演变，以及疫情对其产生的影响。正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由市场向国家的转移，才导致了国际格局的加速变化，而各国在处理疫情中的进一步内向化则促使国家在与市场的关系中向着更强势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关联的是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重大变化开始超越 20 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发展不平衡，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并不断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央的现象。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较大幅度领先于美国、欧盟国家方面，还表现在各自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上。自 2010 年起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中，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已经占 35%。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已经稳超主要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0 页。

② 同上，第 554 页。

③ 同上，第 680 页。

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将会持续增加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比重。^①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百余年来以西方大国为主导建构的全球性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演变出现崭新的变化，在世界历史发展演变五百年后，尤其是在全球性的国际政治体系形成百年之后，原先处于现代世界体系边缘或半边缘的新兴大国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国际格局因此而难以再以“单极”“两极”或“多极”来予以界定，以致当代国际格局更为明显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无极化”特征。^② 随着国际格局中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大国为维护其传统的强势地位，一改二战后所采取的亲市场、亲资本、开放和自由的内外政策，纷纷推行以本国、本民族利益为上的所谓“再国家化”新方略，其中英国的“脱欧”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就是这方面最明显的反映。

（三）疫情加剧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表现

第一，疫情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冲击，导致西方大国难以在全球性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保持唯我独尊的中心地位。虽然在短时间内传统西方大国不可能迅速退出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新兴大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趋势，亦即国际格局中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则是难以扭转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发达经济体在疫情流行的 2020 年将衰退 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 4.3%，欧元区经济衰退 8.3%，英国经济衰退 9.8%；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衰退 3.3%。^③ 这显示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衰退程度的不同。更令人鼓舞的是，2020 年 10 月 13 日，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那特（Gita Gopinath）在阐述全球经济形势时，多次提到中国的积极态势。并且根据 IMF 的预测，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同时，中国经济有望在 2021 年持续增长，且增幅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20 年 7 月 1 日。

② 有关国际格局“无极化”的讨论参见叶江：《解读美欧》，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9 年版；叶江：《大变局》，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6 年版；叶江：《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等专著的相关讨论，亦可参见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2008, pp. 44-56.

③ 吴乐珺：《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呼吁——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性复苏》，《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15 日，第 13 版。

显著。^①由此可见，疫情在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同时，却在继续此前已经开始形成的国际格局中力量对比的加速演变。

第二，疫情更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无极化”演变。早在2007年，约翰·齐普曼（John Chipman）就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极世界之中。美国的权力既强大到能设定国际行动议程，又软弱得无法有效地在全球执行这样的议程。其他强权无论是国家还是次国家都有力量足以对抗美国的议程，但是却无力塑造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或推行一个不受外界影响而能持久的地区议程。”^②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也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正在向无极转变：这是一个不是由一两个国家甚或几个国家、而是由众多拥有并行各种权力的行为体所主导的世界。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③疫情全球性暴发之后，哈斯进一步指出：“当下的世界根本不利于被塑造。权力被分配到更多的行为体手中，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普遍缺乏共识。”^④显然，在哈斯看来，疫情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形成的“无极世界”在疫情之后将继续延续。而在如此无极化的国际格局中，“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全球合作的步履蹒跚、大国之间的不和谐，所有这些都是疫情出现之前的国际环境的特征，而这场疫情的大流行使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轻易地展现出来。它们可能会成为后疫情世界的更显著特征。”^⑤

第三，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再国家化”。早在2008和2009年，国际学术界就开始讨论与全球化和区域化潮流相悖的“再国家化”。日本学者认为：“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混沌局面时……我们只有寻求让“国家”再次走到前台。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再

① 吴乐珺：《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呼吁——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性复苏》。

② John Chipman,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7 Press Statement,” 转引自叶江：《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10页的引述。另可参见 <http://www.payvand.com/news/07/jan/1362.html>。

③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p. 44.

④ Richard N. Haass, “The Pandemic Will Accelerate History Rather Than Reshape It,” *Foreign Affairs*, April 7,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4-07/pandemic-will-accelerate-history-rather-reshape-it>.

⑤ Ibid.

国家化’的方式‘澄清’全球化造成的‘混沌’，让‘国家’出面承担解决问题的重担。”^① 德国学者则指出：“有证据表明，欧洲关键领域政策再国家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这种趋势给欧洲和美国既带来危险也带来机遇。”^② 2020年暴发的疫情明显推动着西方大国乃至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各国不同程度地通过“再国家化”或“内向化”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矛盾运动及当前疫情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方面所产生的上述种种影响，一方面充分显示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继续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正由市场向国家方向转移，各国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时更为内向化，以致国家在与市场的关系中向着更强势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恰恰需要通过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来予以调整。

四、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新兴大国的积极贡献

全球治理的理念及实践缘起于20世纪下半叶冷战的终结，虽然其机制与体制的雏形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全球治理体系随着冷战终结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促使全球治理体系不断重塑，而且疫情也在这方面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全球治理的缘起、发展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析，“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是这一大变局中的重要一环。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实质性地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而疫情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治理的理念最先由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当时正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现代世界体系展现出新局面，全球化更为广泛深入地发展。

① 《呼声月刊：世界面临全球化向“再国家化”转变》，中国网，2008年7月3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7/03/content_15949383.htm。

② Joseph R. Wood, “[Re]Nationalization in Europe,”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August 21, 2009, <https://www.gmfus.org/publications/renationalization-europe>.

勃兰特为此在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支持下倡导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探索运用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来应对后冷战时期由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挑战。^①

在学理层面,美欧学者对全球治理理念进行了一系列定义。比如有学者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②。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当代国际体系中“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③还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是对超越国家边界的关系进行治理的无主权权威活动。”^④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1995年公开发表的《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中指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使彼此冲突的或各不相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联合采取行动的一个持续的过程……从全球角度来说,治理过去一直被视为政府间的关系,而现在必须看到它还与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运动、跨国公司以及全球资本市场有关。”^⑤

显然,这一系列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冷战终结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事务新变化所提出的新设想,其具体实践也是为缓解后冷战时期现代世界体系中两对基本矛盾作用产生的影响。然而作为针对冷战和两极格局终结后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的新形势而产生的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其本身就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的。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现代世界体系内形成了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要求当前的全球治理在理论分析、具体实践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机制等层面进行深刻

① 有关全球治理委员会及全球治理理念缘起的讨论参见叶江:《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第一章“全球治理理念的缘起及学术争论”,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②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 Vol. 1, No. 1, 1995, p. 13.

③ [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④ Lawrence S. Finkelstein,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Vol. 1, No. 3, 1995, p. 369.

⑤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3.

反思和重塑，2020年暴发的全球疫情则扮演着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

（二）疫情对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影响

第一，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需要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塑来修复。习近平主席在疫情期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发言中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发出有力信号，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①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塑，就是以平等为基础建构起能更好反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的经济治理体制和机制，从而确保世界各国在疫情之后的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作为大变局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在疫情作用下的加速，将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提供有利条件。原因在于，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打造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等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在疫情之后向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实现参与者共赢的方向发展。^②

第二，国际格局在疫情冲击之下更加趋向于“无极化”发展，同时西方大国的“再国家化”也日益严重。这两者的形成既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然，也会反过来导致这对矛盾变得更为尖锐以致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应对。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在疫情之后的重塑成为当务之急。众所周知，为解决世界市场失灵及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是全球治理至关重要的环节。冷战终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格局“无极化”和西方大国因右翼民粹主义兴起而形成的“再国家化”，导致传统大国单独以及通过国际机制共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日益下降，全球治理因此面临严峻的挑战。更有甚者，为应对疫情，西方大国不仅强化国家的内向化，而且还在“再国家化”过程中舍弃国际合作而强调国家间的零和竞争，其中尤以特朗普政府所

① 习近平：《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②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所作的主旨演讲中对此有全面的阐述，参见：《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6年9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346.htm。

推行的退出全球治理机制以及与新兴大国中国实行“脱钩”政策为甚。正因为如此，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在疫情影响之下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缓和国家与市场矛盾、维护现代世界体系平稳发展的必然途径。

第三，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更为坚定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因此而具有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在自然资源、人口、市场潜力、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拥有负责任和法治化的强政府，这显然有助于它们参与全球治理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已经在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发展、文化等多领域以及全球合作机制建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区域和全球性的治理机制均已提升了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不仅如此，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通常采取稳定、渐进、有序的多边渠道和对话沟通来推进全球治理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而且并不挑战本已占据世界舞台中央数百年的西方大国及其中的霸权国家，同时坚持以开放的多边主义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球治理所必需的国际公共物品，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三）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积极联手重塑全球治理体系

迄今依然处于国际政治体系中央的西方大国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始终持有戒心，并担心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会导致百余年来西方大国所把持的国际事务垄断权的旁落。于是，它们便通过唱衰新兴大国来贬低其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比如在疫情全球流行之时，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题为《疫情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的文章，竭力论证新兴大国在疫情冲击下会黯然失色，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全球化的新支柱会因此而倒塌，更何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文章还强调：不能指望中国在疫情中向世界经济提供动力而使之走出衰退，南非是疫情中最为脆弱的国家，巴西已在疫情中大乱阵脚，印度则在疫情前和疫情中面临财政动荡，而俄罗斯更是在疫情中与沙特在油价

问题上缠斗而损失惨重。^① 但是,事实却截然相反,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其中尤其是五大金砖国家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积极联手应对疫情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2020年4月,金砖国家举行应对疫情特别外长会晤,五国外长就坚持多边主义、携手抗击疫情、深化金砖国家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晤通过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指出:“我们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恪守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民主、包容和加强协作的原则。我们将继续推动加强全球治理,通过改革提升其包容性、代表性和民主性,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决策中的实质性参与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符合当代现实。”^② 这十分清楚地凸显了作为百年来首次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疫情期间和疫情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担当,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不论守成的西方大国如何唱衰新兴大国,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都坚持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相互协调并努力与守成大国一起积极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总之,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两对基本矛盾的运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现代世界体系在其基本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也形成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正是因为疫情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中既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又在相当程度上对缓和这两对矛盾产生了一定作用,因此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将在疫情期间及此后继续推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现代世界体系将继续向着既充满矛盾又有利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进入世界舞台中央并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方向发展演变。

[责任编辑:孙震海]

^① Adam Tooze, “The Coronavirus is the Biggest Emerging Markets Crisis Ever,” *Foreign Policy*, March 28,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8/coronavirus-biggest-emerging-markets-crisis-ever>.

^②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8日,第2版。

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 影响分析*

——以全球半导体产业为例

余南平 戢仕铭

【内容摘要】 目前，由新技术引发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围绕新技术特别是影响下一代生产方式的关键技术的竞争呈加速态势。在此背景下，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思潮快速兴起，并与大国传统战略博弈叠加，驱动全球技术主导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改变和战略行动升级。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全面技术封锁与技术遏制战略行动，以影响和破坏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和产业链最为典型，影响了全球重要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压制了全球技术链协同，并对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风险。

【关键词】 技术民族主义 半导体产业链 技术遏制 全球政治经济治理

【作者简介】 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首席专家（上海 邮编：200062）；戢仕铭，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62）

【中图分类号】 F11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1-0067-21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1004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20DZA099）和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 2020 年度课题“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与上海发展对策研究”（2020-GZ-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8 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博弈逐步由传统的贸易领域转向科技领域。同时，随着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技术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并呈蔓延之势。在全球供应链“本土化”“战略自主”的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以技术遏制为主要手段对中国采取行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链与供应链在“安全问题”口号下突然被放大，开始影响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生产与供应链布局，进而可能引发全球价值链的重大结构性重塑。在此背景下，未来全球价值链的变动将朝什么方向演化？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又将面临何种风险？本文将从全球价值链结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半导体产业为切入点，结合美国在技术民族主义思潮驱动下所采取的行动，就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民族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

技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分支，其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为本源。分析技术民族主义形成的一般原因和影响，首先应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简要梳理，并对技术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演变进行必要提炼。

（一）民族主义的欧洲血统

尽管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但其中某些元素却可以追溯到民族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近代工业化后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政治权利的渴望与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推动了欧洲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认为，国家与民族具有天然的联系并相辅相成，而法国大革命留下的政治遗产，为民族主义找到了第一次合理的政治表达的机会。^① 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1774 年奥尔特（Peter Alter）的著作中。^② 美国哲学和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认为，民族主义是民族以寻求自治为目的、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行为集合体，其政

^① Jeremy Black, “Essay and Reflection: On the ‘Old System’ and the ‘Diploma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2, No. 2, 1990, p. 301.

^② Peter Alter, *Nation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p. 3.

治边界与国家边界一致。^① 还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具有巨大的亲和力。无论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原因,还是产物,民族主义都应该被视为是现代性现象的一部分。^② 就历史渊源而言,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一种学说,欧洲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世界上出现的其他民族主义都是欧洲的翻版,也是政治思想上模仿欧洲学说的结果。^③ 对于凯杜里等一批研究者来说,民族主义是政治思想领域现代化的产物。但对于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这样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者来说,他们更愿意从“反射性”角度思考,认为民族主义是对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一种社会回应,^④ 并且这种回应对现代性的形成至关重要。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被另一位民族主义研究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定性为“功能主义者”,^⑤ 因为它关注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作用。^⑥

与盖尔纳的“功能主义”所不同的是,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强调民族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功能,他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将民族主义发展置于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背景下去考察。^⑦ 另一位英国历史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则进一步将民族主义与科学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科学国家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型干预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被世界上非欧洲地区所普遍采用时,民族主义时代就会到来。^⑧ 正如美国学者大卫·贝尔(David Bell)所

①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Background," *Journal of Virology*, Vol. 87, No. 18, 1994, p. 997.

②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2006, p. 35.

③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13.

④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p. 71.

⑤ John A. Hall,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1.

⑥ 值得注意的是,盖尔纳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晚期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思潮鼎盛阶段。这些思潮的前提假设就以欧洲为中心,将欧洲或西方社会变革的经验塑造为世界其他地区融入全球体系的标准。

⑦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

⑧ Anthony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3, p. 21.

总结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情感，它还是一项政治工程，而且还要主动创造一个民族，把它的人类原材料塑造成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样式”。^①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主义本身具有被国家政治再强化和再塑造的特点。

（二）技术民族主义的渊源

技术与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技术通常是国家权力的储备与行使工具，对国家权力的不同追求方式深刻影响着国家对科学组织进行投资和创建的不同模式。^②因此，理论上，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技术民族主义就一直存在。经济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及其塑造的舆论氛围虽然降低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可见性，但近代历史表明，只要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新技术革命进入活跃期，技术民族主义就会高涨。“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最早源自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1987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文。该文基于美日经济竞争背景，认为美国应该警惕日本对美国技术的复制行为，并采取强硬措施保护美国在技术领域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地位。^③1995年，美国华威大学经济学者保罗·斯通曼（Paul Stoneman）又对技术民族主义的定义进一步解释。他认为技术民族主义将技术创新直接与国家安全政策和经济发展关联，技术作为国家安全的最基本条件，只有完成技术本土化才能够实现国家富强。^④日本学者山田墩（Atsushi Yamada）对西方的技术民族主义观点予以反驳。他从历史学角度比较了亚洲和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并把技术民族主义划分为新、旧两种不同模式。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依赖于国家政治力量干预是逆全球化的一种表现。而新的技术民族主义则是在全球化的框架下，通过技术交流和创新形成新的全球性技术闭环。^⑤

① [英]大卫·贝尔：《发明民族主义法国的民族崇拜：1680—1800》，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7页。

② John Krige and Kai-Henrik Barth, “Global Power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Osiris*, Vol. 21, No. 1, 2006, p. 21.

③ Robert Reich, “The Rise of Techno-Nationalism,” *Atlantic Monthly*, Vol. 1, No. 5, 1987, p. 31.

④ Paul Stoneman, “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George Washing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Economics*, Vol. 29, No. 3, 1995, pp. 846-847.

⑤ Atsushi Yamada, “Neo-techno-nationalism: How and Why It Grows,” *Columb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 Vol. 123, No. 17, 2000, p. 30.

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技术民族主义是一个多层次、内涵丰富的概念,不仅存在于许多国家的技术发展历史中,而且存在于许多国家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研究中。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的技术政治学说具有重要影响。他借鉴了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科学民族主义思想,^①认为尽管一些国家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占据领先地位,但在改变世界的某些通用和专项技术上却都贴上了明显的特定国家标签。因此,特定的技术成为一个国家主要的标志性特征。^②他的研究为“技术国家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假定国家经济和技术绩效是由国家创新效率决定的前提下,技术民族主义一直以一种极端和普遍的形式出现,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学术圈发起的“市场失灵论”的辩论中。虽然这表面上仅是学术观点的辩论,但其最重要的国际背景是美苏之间的全面冷战,迫使美国学者思考寻求国家力量对技术发展的介入。^③

技术民族主义在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一方面,学者们看到了技术民族主义对保持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优势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也看到,随着技术民族主义力量上升而出现的国家经济保护主义行为,涉及全球化中的贸易与技术分享成为困扰国家发展的新问题。^④日本历史学家中山茂(Shigeru Nakayama)结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路径,认为中国采取了与技术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模式——技术全球化模式。这种模式弥合了技术鸿沟,适合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但他也同时指出,该模式延续的前提是技术民族主义不会重新获得压倒性的力量。^⑤中国学者更多是从理论

① Daniele Archibugi, “Technological Globalization or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Futures*, Vol. 29, No. 2, 1997, p. 121.

② Christopher Freeman, *Systems of Innovation: Selected Essay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 103.

③ 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强调国家直接介入创新研究,美国国防部在1958年设立了高级计划研究局(DARPA),该机构一直通过军民融合方式主导美国的科技前瞻应用研究。具体参见[美]安妮·雅各布森:《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④ 技术守成国与技术追赶国在看待“技术民族主义”问题上通常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⑤ Shigeru Nakayama, “Techno-Nationalism Versus Techno-Globalism,”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 6, No. 1, 2012, p. 9.

上探讨新技术民族主义,认为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实行技术霸权主义,中国应当实施技术创新并推动自主创新政策。^①

综合来看,技术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针对不同的对象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具体的战略诉求。从这个角度而言,技术民族主义与政治学语义上的民族主义相比,缺乏普遍性,而是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目的性、行动力,且通常与特定阶段的国家利益认知高度关联。

二、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对中美博弈的影响

技术民族主义通常对应着国家保护主义行为和对外指向性行动。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极强保护主义传统的国家,经济学中的美国学派思想深刻影响着美国政治精英,而“美国优先”则是美国学派的思想传承与通俗化表述。^②通过分析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的表现特征,包括其在历史上的表现和精英们的认知,可以看到,早在2013年就有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能力的全面进步,并向美国发出对中国进行技术遏制的“战略警告”^③。此后,美国逐渐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技术遏制政策,即使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和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之际,美国也未调整这一政策,反而加速对中国的技术遏制并强化对核心技术的管控。另外,即使中美达成了阶段性贸易协定,也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遏制的政策。这种观点在2018年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政策建议中得到了验证。他认为中美之间的系统性竞争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且是保护美国经济基础的问题。^④纳瓦罗的观点与美国学派早年的代表人物亨

① 王稳、仲鑫、马光明:《“新技术民族主义”还是“技术霸权主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5、9页。

② 关于美国学派、美国保护主义以及典型技术民族主义表现的相关讨论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2013年“全球百位思想家”之一瓦科拉夫·斯米尔以历史叙述方式全面介绍了美国制造业的世纪性崛起与衰落,包括美国目前面对中国全球制造能力所面临的问题。具体论述参见[加]瓦科拉夫·斯米尔:《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④ Peter Navarro, “Team Trump is Protecting America’s Vital Manufacturing, Defense

利·克莱（Henry Clay）在 1824 年提出的看法毫无不同。^① 因此，从维护美国长期竞争力的角度看，面对中国的“战略威胁”，美国的政治精英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切断与中国的技术联系，即使这会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产生破坏性结果。美国的行动符合以自我认知为出发点的战略利益。^②

（一）技术民族主义影响美国的战略认知

在战略认知上，如果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中国新问题”的讨论，^③ 那么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各界对这一问题达成战略共识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对技术遏制的战略认知逐渐清晰？

通过分析特朗普 2017 年 3 月发布的《总统贸易议程》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年度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当时虽然提出了“保卫国家经济主权”和“强化美国贸易法案”的主张，但还只是将中美之间的问题限定在“贸易逆差”的范围内，技术管控和技术遏制并不是当时美国与中国博弈的主要战略手段。^④ 但是，从 2018 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开始，就可以在美国各种官方文件中看到美国反复提及“中国制造 2025”，^⑤ 包括 2018 年 6 月已经就职于白宫的纳瓦罗所领导的白宫贸易和制造业办公室发

Industrial Base from Big Risks,” White House, October 10,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team-trump-protecting-americas-vital-manufacturing-defense-industrial-base-big-risks/>.

① 亨利·克莱曾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倡导者，坚持遵循汉密尔顿的“制造业立国论”，并坚持以有效的干预主义行动推动美国工业、制造业进步。他关于美国竞争优势保持的论述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第 7—8 页。

②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戴尔·科普兰提出“贸易预期理论”，以回应国际关系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经济依赖”问题的讨论。按照科普兰的观点，历史上的关键大战，大多数都源于恐惧衰落。具体论述参见[美]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 页。

③ Graham Allison, “2014: Good Year for a Great War?”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1, 201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2014-good-year-great-war-9652>.

④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7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6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March 10, 2017,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17/AnnualReport/AnnualReport2017.pdf>.

⑤ 关于美国调查中国对美贸易和 WTO 合规情况的报告参见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January 7,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Reports/China%202017%20WTO%20Report.pdf>; 关于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一系列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相关判定，参见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https://www.trade.gov/press-releases>。

布的报告，^① 都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此高度警觉，政策也开始全面转变，并由此产生了自我强化的演绎式推断。虽然很难精确和全面分析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加快形成对中国技术遏制的战略共识，但是来自政治视野之外的技术领域的舆论影响不容忽视。

早在 2017 年，美国著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以《战场奇点》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对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充满“美国式担忧”的报告。这份报告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逻辑体系和推理结果，而且在于它详细列举了许多信息源的分析 and 判断，并隐含性地提供了美国对于中国进行技术管制的庞大清单。^② 可以说，2018 年是全球技术史上人工智能概念普及的元年。2018 年 5 月，在白宫举行的美国“人工智能峰会”上，美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战略报告。一个月后，英国著名风险投资家伊恩·霍加斯(Lan Hogarth)发布了其与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的联合研究成果，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民族主义”这一新的地缘政治思维和理论体系将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人工智能将使国家间的民族主义竞争加剧；他们还进而预测“人工智能民族主义将造成全球政治生态不稳定和经济环境动荡，美国和中国将形成双寡头，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③ 随后，2018 年 9 月英国著名媒体人阿莫尔·拉詹(Amol Rajan)也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络版上撰文提出“技术民族主义将决定 21 世纪”的论断。^④ 而最有影响力的言论则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John Allen)

①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June 19,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6/FINAL-China-Technology-Report-6.18.18-PDF.pdf>.

② 许多研究都忽略了美国重要战略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重要性。该智库由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米歇尔·弗卢努瓦联合创立，这两人曾在奥巴马政府中分别担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官。新美国安全中心持续研究和关注对华“大战略”问题。《战场奇点》报告参见 Elsa B. Kania, “Battlefield Singular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China’s Future Military Power,” CNAS, November 28, 2017,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attlefield-singularity-artificial-intelligence-military-revolution-and-chinas-future-military-power>.

③ Lan Hogarth, “AI Nationalism,” June 13, 2018, <https://www.ianhogarth.com/blog/2018/6/13/ai-nationalism>.

④ Amol Rajan, “Techno-Nationalism Could Determine the 21st Century,” BBC, September 8, 2018,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5370052>.

在 2019 年初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再次强化了技术民族主义概念。他认为技术民族主义是建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并使技术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领域，而这种技术可能先在军事领域与国家间竞争中得到体现。^① 2019 年，世界各国陆续推动 5G 网络商业化，而中国的 5G 技术优势明显。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2019 年 4 月底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称“美国必须赢得先进网络技术国家竞赛的胜利”，美国随后将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纳入制裁的“实体名单”。^② 同期发布的《2019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提供了实证数据，指出中国在全球简单和复杂价值链中的地位稳固且不断上升；中国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等各贸易领域增加值的网络枢纽地位，让美国各界产生了广泛和深层次的担忧与战略威胁认知。^③

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技术发展能力与相应的全球市场潜力是可怕的，将会在未来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能力，并足以对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构成全面威胁。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研究员、中国研究项目资深顾问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认为，“中国的能力和雄心已发生变化，在全球价值链方面体现为中国在技术层面的地位上升；过去美国占据主要位置，现在中国逐渐赶超并要求拥有一席之地。”^④ 对华温和的美国战略学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虽然认为中美两国必须合作打造一个约束竞争的框架，寻求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但也认为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的竞争会对中美关系模式构成挑战，而 21 世纪

①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Rise of Techno-Nationalism,” July 3,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7/the-rise-of-techno-nationalism-and-the-paradox-at-its-core/>.

② 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夫勒认为，地缘政治、威胁认知、政治经济融为一体是美国战略转变的出发点，而当下技术环境的迅速变化可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战略转变的重要“威胁认知”基准点。[美]梅尔文·莱夫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商务印书馆 2019 版，中文版序。

③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价值链能力实质上对应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权力，并可转化为某种国际政治权力。相关论述参见余南平、黄郑亮：《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欧洲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45—70 页；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规模与能力变化可参见：World Bank,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trade/publication/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19>.

④ Chery Wijaya, “The Future of ‘Made in China 2025’ Policy: Will Washington Maintain Its Edge?” *SIM Economics Society*,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simecons.com/post/the-future-of-made-in-china-2025-policy-will-washington-maintain-its-edge>.

的关键技术会是两国技术竞争的核心内容。^①早在2018年6月，美国政治学教授裴敏欣更悲观地断言，对于美国来说，允许中国继续进入美国市场并获得美国技术相当于是帮助中国提升经济能力，进而在战略上击败美国；美国应寻求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并防止中国获得美国的高科技，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趋势甚至可能是一场全面的冷战。^②

受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技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张，美国对中美竞争本质的认识也愈发清晰和具体。2020年5月18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题为《中美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的文章，其主要观点是：中、美均已将对方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正在军事、经济、科技、国际秩序及信息五大关键领域进行全方位竞争，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将进一步加剧双方对抗。^③与此同时，美国白宫于2020年5月20日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报告，系统阐述了美国如何在《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对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思路。^④2020年6月24日，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防部副部长的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作证时也特别提出，“这场中美技术竞赛是美国必须关注的主要竞争领域，并将在接下来半个世纪对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产生最深刻和持久的影响”。^⑤2020年10月，美国白宫又发布《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报告，该报告继续强化和突出了美国加强技术管控和结盟遏制，确保技术优势的基本

① Stephen J. Hadley, “A Win-Win U.S.-China Trade Deal Is Possible,” *Foreign Policy*, April 11,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11/a-win-win-u-s-china-trade-deal-is-possible/>.

② Minxin Pei, “The Shape of Sino-American Conflict,” *Project Syndicate*, June 6,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trade-war-strategic-conflict-by-minxin-pei-2018-06>.

③ Charles Edel and Mira Rapp-Hooper, “The Five Ways U.S.-China Competition Is Hardening,” *Foreign Policy*, May 18,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18/united-states-competition-coronavirus-pandemic-tensions/>.

④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⑤ 弗卢努瓦是美国重要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与战略风险咨询公司 West Exec Advisors 的联合创始人，其观点代表着美国民主党精英对中国问题的主流看法与策略。相关证词参见：<https://westexec.com/michele-flournoy-testifies-before-the-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the-chinese-view-of-strategic-competition-with-the-united-states/>。

战略。^① 因此，在宏观战略认知层面，美国的结论是中美技术竞争与竞赛已经开始，而这一点也可以被看成是美国的“广泛战略共识”。在这种共识下，美国针对中国在全球进行技术遏制行动，不仅是美国保护主义历史传统的延续，而且是新历史环境下技术民族主义哲学扩大的政治经济行动表现，其凸显了在“美国优先”旗帜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再认识和战略行动的新举措。

（二）美国在战略行动上步步升级

历史上，美国一直是技术民族主义的忠实践行者。无论是在二战时期通过隐蔽手段破坏德国的原子弹研发，还是冷战期间对苏联的技术封锁和技术遏制，美国国际权力的获得和维护都保留着技术民族主义的历史烙印。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通过严格审查中国对美国企业和技术的并购、发起“301调查”、逐步建立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等方式，开始对中国实施全方位技术遏制战略。

第一，强化对华技术投资与并购审查。自2017年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强化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2018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针对中国的白皮书中称，中国正在通过技术投资窃取美国的顶尖技术。因此，美国需要授予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的权限，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敏感初创企业进行更严格的审查。^② CFIUS年度报告显示，自2017年以来，CFIUS共审查了109宗涉及中国投资的交易申请，几乎阻止了所有的交易申请。^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多次阻止涉及中国的技术型收购。^④

① 美国在大国博弈中通常采用占据优势的结盟和技术遏制手段与对手博弈。相关论述参见[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相关白宫报告参见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October 15,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0/National-Strategy-for-CET.pdf>。

② 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 “China’s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y: How Chinese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Technology Enable A Strategic Competitor to Access the Crown Jewels of U.S. Innovation,” January 14, 2018, [https://admin.govexec.com/media/diux_chinatechnologytransferstudy_jan_2018_\(1\).pdf](https://admin.govexec.com/media/diux_chinatechnologytransferstudy_jan_2018_(1).pdf)。

③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 Reports and Tables,”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international/the-committee-on-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cfius/cfius-reports-and-tables>。

④ “Presidential Order Regarding the Proposed Takeover of Qualcomm Incorporated by Broadcom Limited,” White House, March 12,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order-regarding-proposed-takeover-qualcomm-incorporated-broadcom-limited/>。

2020年5月20日,美国财政部对《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进行全面修订,标志着美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的关注角度和理念发生新的转变,一是管辖范围扩大到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敏感数据等诸多领域;二是新兴技术领域投资审查结果发布之后,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出口管制规则的密集出台;三是选定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作为“合作国”,组成协同审查委员会建立同一标准投资审查机制。^①美国此举不仅对其技术对外转移设置了障碍,而且也极力将对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做法扩散至全球,并已产生恶劣的连锁效应;目前,德国、英国、荷兰等国也纷纷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海外技术并购加强审查。

第二,对华发起以技术转让为重点的贸易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动用关税工具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调查的重点为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中国存在要求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设立研发机构,以换取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资格,而这将严重削弱美国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掌控力。^②通过分析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采取的各种行动,可以发现,美国对华关注的重点已从传统的贸易平衡转向对核心产业和技术的管控。这也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技术发展速度的担忧,进而采取技术民族主义行动。

第三,强化对中国企业的单边技术出口管制。围绕新兴和关键技术的管控,美国已经打造了一套完备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作为冷战时期技术民族主义思维的遗留产物,一直充当着美国在经贸领域的“长臂管辖”工具。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不断扩大对华行动规模,^③频繁将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以

① Investment Security Office, “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Certain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Foreign Persons,” Federal Register, May 21, 2020,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5/21/2020-10034/provisions-pertaining-to-certain-investments-in-the-united-states-by-foreign-persons>.

②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and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March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③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专门负责根据《出口管理法》和《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对美国技术的出口实施管制,是美国对他国进行技术遏制的实际操作部门。目前美国

切断美国对华技术输出。BIS 的监管动作是动态和连续性的，在 2019 年 5 月将华为公司首次纳入“实体清单”后，BIS 发现华为仍可通过含有美国技术的境外代工方式进行生产，为此，2020 年 5 月 BIS 又发布新的管制规定，通过延长临时通用许可（TGL）^① 和修改《出口管理条例》中的直接产品规则，^② 全面切断了对华为半导体产品和技术供应，使华为面临芯片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并严重打击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与相应的全球价值链。^③

第四，推动构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多边体系。美国已开始推动《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 简称《瓦森纳协定》) 下的多边框架共同行动，并采用类似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④ 以防止中国科技公司使用其他国家技术替代美国半导体技术。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府推迟签发光刻机制造商 ASML 向中国的出口许可证，瑞典则以法律形式将中国华为排除在其 5G 网络建设之外。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多边框架行动，本质上是在技术民族主义的驱动下，通过严格的措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和全球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维护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将朝着更加专业化和高端化的方向发展，以使美国依靠技术优势继续占据全球价值链、产业链、技术供应链的顶端，确保其全球霸权基础不被挑战。^⑤

按照技术扩散风险的大小及安全关切的程度将出口目的国分为 A、B、C、D、E 五个组别。

①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ssues Expected Final 90-Day Extension of Temporary General License Authorization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ay 15, 2020,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5/department-commerce-issues-expected-final-90-day-extension-temporary>.

② “Commerce Addresses Huawei’s Efforts to Undermine Entity List, Restricts Products Designed and Produced with U.S. Technologie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ay 15, 2020,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5/commerce-addresses-huaweis-efforts-und-ermine-entity-list-restricts>.

③ 美国的技术管制升级已对中国华为公司产生了全面影响。2020 年 11 月，华为公司被迫出售荣耀手机业务，未来也可能因芯片不足而无法提供新的智能手机。

④ 2019 年 12 月在奥地利召开的瓦森纳安排出口管制会议中，42 个《瓦森纳协定》成员国均同意扩大出口管制范围。瓦森纳出口清单变更参见 Summary of Changes to Lists(2019), December 6, 2019, <https://www.wassenaar.org/summary-of-changes-to-lists-2019/>.

⑤ 美国采取多边协同框架在全球遏制中国获得技术的根本担忧是，中国是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国家，国内配套加工能力极强。因此，一旦全球技术转移继续发生，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将迅速提高自身的全球价值链技术能力，并威胁美国的技术垄断和霸权。

三、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影响

目前，技术民族主义驱动下的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遏制，不只针对单一的技术交易行为，而是对中国战略性产业中的通用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全面封锁。半导体作为一个全球化最彻底、最全面的产业，包含了全球价值链中所有的属性和要素，其全球产业链的紧密分工、协作塑造了全球专业化合作分工模式。而以半导体产业作为分析案例，可更清楚地分析技术民族主义行为对该行业全球产业链运行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改变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内部结构，以及技术民族主义的扩散将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什么连锁影响。

（一）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运行模式

半导体是当今世界高知识集成和高水平制造分工协作的成果。其设计、制造和批量生产过程的误差几乎为零。目前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已实现高度专业化，其生产体系遍布全球。这些生产过程中高度复杂的分工，实际上是在严格的技术链管理下，选择竞争优势或相对优势企业来执行各个环节的任务。总体上来看，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包括研发、设计、制造和组装四个基本环节。分析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生态系统，可将现有产业链的厂商分为四种主要模式。其一，国际整合元件制造商（IDM）模式，以英特尔、三星和德州仪器等公司为代表，能够在企业内部完成垂直整合。其二，无制造厂的IC设计商模式，以高通、联发科、博通等公司为代表，专注于半导体的研究和设计，将生产、测试、封装等环节外包。其三，代工厂模式，以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日月光、联电等公司为代表，只负责制造、封装或测试的其中一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晶圆厂”。其四，原始设备生产商模式（OEM）或原始设计制造商模式（ODM），即芯片完成其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的流程后被交付给原始厂商，如中国大陆地区的华为、小米等企业，然后被整合到各种应用终端，该模式增加了全球价值链末端产品的复杂性和互联性。

（二）主要经济体半导体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生产位置

在过去二十年的全球化中，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已发展为全球化的代表性

行业。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特征是严格按照自身技术禀赋而进行全球分工协作和高度集成的。半导体芯片会经过多次反复的进出口，跨越多个国家，最后嵌入到终端成品中。目前，全球半导体行业主要由一小部分美国企业主导，美国企业占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的 45%，韩国占 24%，日本、欧盟各占 9%，中国台湾占 6%，中国大陆占 5%，全球其余国家和地区占 2%。^① 全球主要半导体企业能够利用绝对的技术优势，创造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过去二十年中，只有东芝、三星和台积电等少数亚洲半导体公司成功扩大了市场份额。这类公司的成功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对专业化和创新的持续关注以及把握获取国外技术的机会。观察美国半导体企业在全球各区域市场的比重，可以发现美国企业在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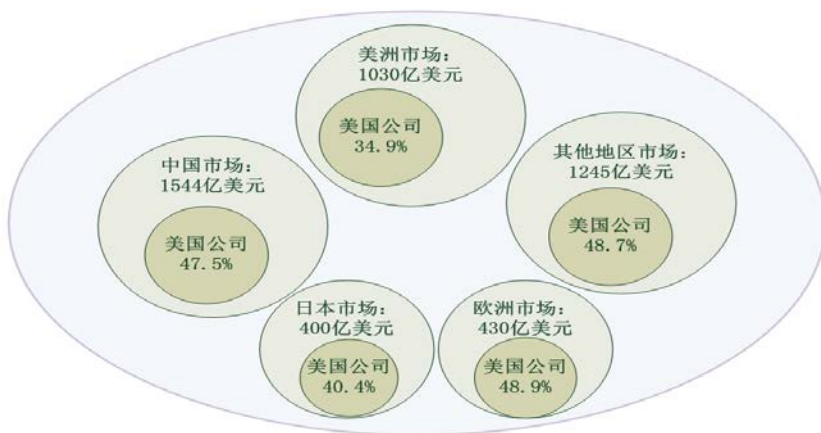


图 1 2019 年美国企业在全全球半导体市场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源：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data-resources/market-data/>。

2019 年美国供应了全球 45% 的半导体产品，而中国大陆虽然只提供了全球 5% 的半导体产出，但却是目前全球半导体产业最大的需求市场。美国的英特尔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的 37%；高通公司 75% 的产品最

^① 作者根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的数据分析整理。数据来源参见 SIA，<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data-resources/market-data/>。

终流向中国，只有不到 5% 的产品销售到美国本土。^① 因此，从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层面看，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包括切断芯片供应等行为已造成广泛的附带性损害，不但影响了美国跨国公司，还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级产品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此外，进一步分析半导体企业的全球高附加值分布结构，可以发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通常选择将最具价值的知识产权部分限定于本土和特定区域（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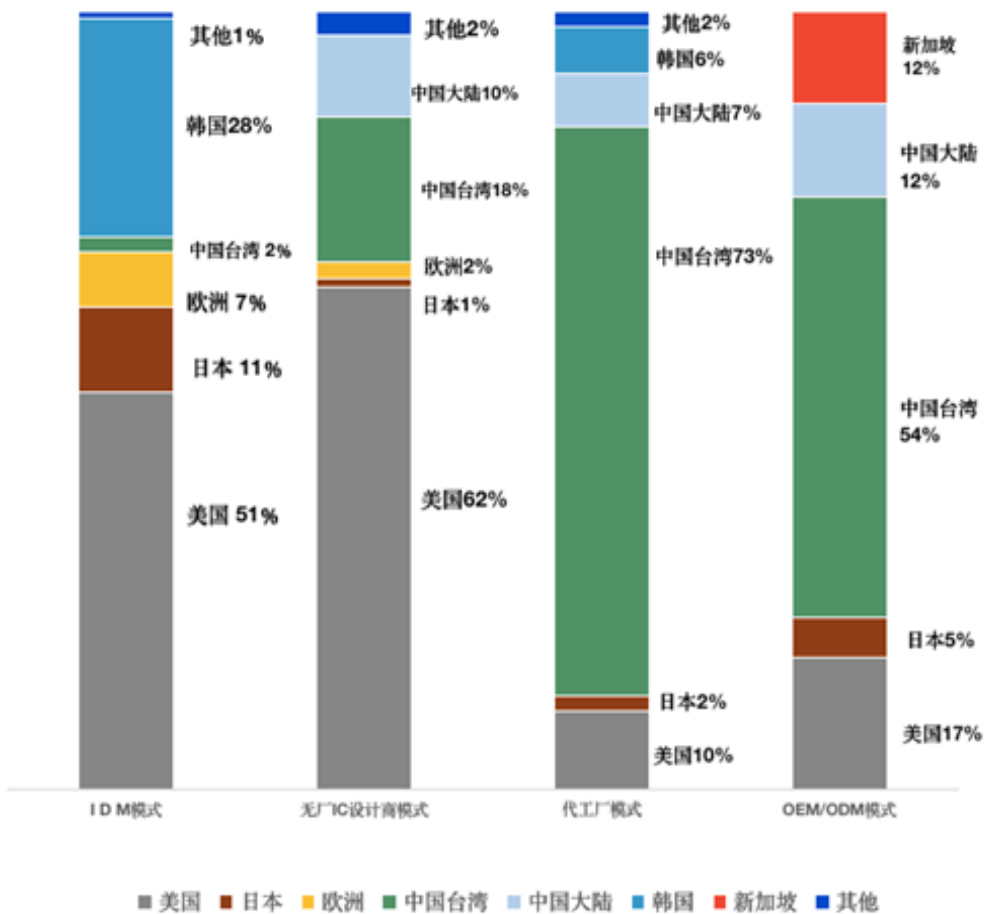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模式的半导体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资料来源：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data-resources/market-data/>。

^① Seamus Grimes and Debin Du, “China’s Emerging Role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April, 2020, p. 27.

领导型企业在布局各个价值单元方面充当“串联者”角色，以联盟构建产业生态圈的组织形式，将产业链上的关键价值单元的主体企业吸纳和整合在一起，形成创新闭环，共同推动和控制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这是典型的全产业单元的链式布防模式，在锁定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的同时，以数据和知识产权实现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控制。

（三）技术民族主义对半导体价值链的扭曲

如前所述，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高度分工、协作，使半导体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充分利用竞争战略，实现关键的可持续价值创造。过去三十年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是全球行业进行优化整合的过程。特别是全球半导体价值链，需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寻找竞争优势单元来达到最优的效率和生产力。在此过程中，半导体技术通过进入不同的产品市场，实现渗透、融合和创新，并使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实现在价值链中的价值。

在过去的全球价值链构建过程中，由于技术壁垒的存在和掌控全球价值链核心技术源头的需求，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维方式是坚持把复杂的全球半导体价值链限定在人为或政治指定的地理区域内，而其行动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不断加大对顶级半导体企业的投入。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芯片设计的成本进一步提升，已从 10 纳米级的不到 2 亿美元上升至 7 纳米级的 3 亿美元，而 5 纳米级的成本将超过 5 亿美元。^① 另外，随着半导体技术进步导致的摩尔定律趋于终结，从技术逻辑而言，全球芯片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技术断层期，技术突破需要超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生态支持，而技术民族主义所主张的“国家领先和技术控制”模式，则宣称能够代替现有的全球价值链模式，支持技术断层期的产业发展。因此，在技术民族主义思维的主导下，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在设计端不断攀升的成本可能只有超专业化的公司才能承受，而产业也可能变得更扭曲和封闭，并大大降低该产业的技术分工效率。

不仅如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生产端也存在扭曲的趋势。考虑到中国半导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程度和产业扩散能力，美国半导体企业对中国市场及相关行业进行大幅度的技术切割，事实上将对整个技术行业的生

^① 数据来源：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https://www.wsts.org/67/Historical-Billings-Report>。

产方向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美国的技术管控和遏制导致半导体行业生产速度放慢，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技术民族主义将造成长期附带损害，必然会导致全球半导体产品结构和市场的扭曲。经合组织（OECD）报告显示，受到复杂的地缘博弈因素影响，价值链中下游的国家可能将寻找技术代替，最终导致技术主导国的产能过剩。^①

从产业界的实际反应来看，就在美国宣布加大对中国芯片实行禁运和技术管控后，中国半导体企业被迫加大新产能投资。^② 由于目前中国芯片的产出目标很大程度上是防止芯片“断供”，而非与全球市场标准价格和技术水准持平，因此也可能导致一些非理性的市场动机和被动性扭曲。此外，从技术角度来看，未来全球对半导体产品的需求，正从通用芯片转向为特定用途量身定制的“系统级芯片”（SoCs）转变，^③ 这对半导体行业集中度和 IDM 模式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中国企业面对美国在技术民族主义主导下不断扩大的“断供”行动，只能被迫考虑建设安全的半导体供应链体系。因此，目前全球对芯片的过度投资可能导致未来对半导体价值链中高端通用芯片的需求大幅度减少，分散化程度上升，全球投资效益下降。由此可见，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变革叠加，正在共同重塑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进而对全球价值链本身造成扭曲。

（四）技术民族主义与“加拉帕戈斯综合征”

在主张政府支持研发的观点中，最具说服力的是认为政府的支持存在“知识溢出”效应，私人企业的短板导致其对研发投入不足，知识溢出弥补了这一点。同时，有研究表明，国家研发的边际社会回报率比私人研发的边际回报率高出 3 到 4 倍，^④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忽视如此大的回报率差异。但

① OECD, “Measuring Distortion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 December 12, 2019,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8fe4491d-en.pdf?expires=1593163980&id=id&accname=guest&checksum=B4672BA9D31B7EE80D729F1B36FB5DFC>.

② “Chinese Memory Chip Production Reaches 5% of World Total,” Asia Watch, November 21, 2019, <https://www.asiawatch.net/2019/11/21/chinese-memory-chip-production/>.

③ Global Data, “Technology Trends in Semiconductors,” February 10, 2020, <https://www.semiconductor-digest.com/2020/02/10/technology-trends-in-semiconductors-revealed-by-globaldata/>.

④ Brian Lucking Nicholas Bloom, and John Van Reenen, “Have R&D Spillovers Changed?” Working Paper No. 2462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2018, p. 17,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4622/w24622.pdf.

国家介入研发本身可能会推动技术民族主义影响的扩大，进而产生一个重大问题：未来全球半导体产业是否将以技术民族主义的形式来推动产业发展？

第一，技术民族主义扩散将造成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扭曲与瓦解，造成“双输”局面。如果说当今的大国科技竞争是一场赛马的话，那么技术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产业政策就是在遏制对手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加速发展。美国扭曲和瓦解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和价值链将导致多种后果：一方面，产品需求方的中国被动构建完整半导体产业链，导致全球半导体价值链朝着愈发“碎片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的半导体产业也会遭受严重冲击。对此，国际咨询公司波士顿集团在2020年3月的报告中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将结束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①从价值链的内在结构看，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扭曲、断裂、瓦解，不仅将使中国承受压力，而且将导致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因全球市场份额的萎缩而减少研发投入，长期看将影响美国企业的技术进步。

第二，技术民族主义扩散将导致“加拉帕戈斯综合征”效应，降低各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在技术民族主义思维主导下建立的内部封闭市场，可能使本地企业在世界舞台上处于竞争劣势。首先，这缘于技术民族主义本身的悖论。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企业的研发工作愈发本土化，而技术受制于人的国家的企业被迫脱离全球标准而运行和研发，但由于缺乏竞争与生态规模限制，将降低各自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这将导致技术受制于人的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出现“加拉帕戈斯综合征”。^②因此，如果技术

① 波士顿集团（BCG）的报告认为，若美国对中国实现半导体技术脱钩，则美国半导体行业将会损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以及1.5万—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具体报告参见 Antonio Varas and Raj Varadarajan, “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 BCG, March 7, 2020,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0/restricting-trade-with-china-could-end-united-states-semiconductor-leadership>。

② “加拉帕戈斯综合征”来自生物学，用来描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方特有物种，它们按照理想中的状态进化，并逐渐与其他大陆上的同类物种区分开来，自成一体，但如果把它们置于别的海岛或者大陆上，则就无法存活。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NEC）是加拉帕戈斯综合征的典型实例。该公司曾经主导日本手机市场，但后因缺乏国际竞争力而被迫退出手机市场。从半导体产业来看，出现“加拉帕戈斯综合征”的半导体企业将无法参与全球竞争。相关分析参见 Cheng Ting-Fang and Lauly Li, “Fearing Spies, Huawei Redeploys US-linked Executives,” Nikkei Asian Review, October 16, 2019,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Huawei-crackdown/Sources-Fearing-spies-Huawei-redeploys-US-linked-executives>。

民族主义思维被进一步强化，并付诸国家间的“技术切割”，将迫使全球产业链脱离原有的发展轨道，在造成全球产业体系碎片化的同时，还会缩小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形成零散的全球多系统和多制式。

第三，从全球价值链结构的变化来看，技术民族主义的大规模扩散，特别是技术主导国的遏制引发被遏制国家的被动应对，无疑将导致全球价值链内在结构的变动。鉴于当前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不确定性影响，不仅表现在全球半导体领域，同时还会表现在其他技术产业领域，届时其影响就不仅限于某一领域产业链和价值链，而且将导致全球生产体系的颠覆性重塑，并可能在产业链端终止既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产业链的安全，并开始加大本土化和区域化研发部署的力度，可见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已经不容忽视。

结 束 语

通过对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起源、演变形式的讨论，以及美国运用技术民族主义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特别是美国的技术管控政策对全球半导体价值链造成现实和潜在影响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共性和趋势性问题，这需要思考和总结。

第一，目前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格局已日益受到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技术民族主义已被美国各界放大为“全面技术型冷战的战略性思维”^①。而这种战略先发控制的影响，包括引发的主动和被动的连锁反应，将对当前国际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在技术民族主义

^① 拜登重要顾问库尔特·坎贝尔也在2019年强调，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不辞而别地结束了；他在批评特朗普政府封杀华为5G网络技术时认为，美国应该组织盟国提供更好的技术，而不是采用简单的封杀；相关文献参见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5, 2019, pp. 96-110。拜登团队另一重要顾问埃利·拉特纳组织领导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19位专家撰写专门报告，强调“促进数字自由和打击高科技自由主义；相关文献参见 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20,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NDAA-final-6.pdf?mtime=20200116130752>。

“零和博弈”思维的主导下，全球生产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可能遭受全球价值链断裂和技术系统性阻断的后果。这种以高端技术为核心博弈点的新型大国对抗模式，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各自建立“全产业链”的平行竞争模式，其结果正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包括在底层技术上逐步切断了全球价值链内在的联系。

第二，对于如何降低技术民族主义不断上升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风险。这需要世界各国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珍惜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既有全球价值链体系带来的合作成果，加强技术领域的全球性合作和共享。同时，还应摒弃“技术超越论”“技术领先论”等狭隘思维，防止其上升为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历史上的很多悲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表明，偏见、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第三，世界各国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中应以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目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并不稳定，且随着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强化供应链安全，全球价值链开始向区域化和本土化演进，技术民族主义的进一步扩散可能会导致各种“加拉帕戈斯综合征”后果。因此，如果不能尽早在技术良性竞争与技术合作方面达成广泛共识，世界不同市场可能会出现不同技术标准，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更难以找准定位。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深度发展的当下，让世界各国各自重新回到全产业链、经济自给自足，不仅在经济成本上不可承受，而且也会给世界体系带来巨大不确定，包括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

第四，在目前技术民族主义主导力量上升，并排斥全球合作，强化非市场化竞争的背景下，技术上被遏制的国家为获得必要的发展权利和产业生存权利，要主动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模式（GVC）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并向国家价值链（NVC）转型，从而形成 GVC 和 NVC 相互协同全球价值链的新模式。这也是提升自我技术能力，降低技术民族主义风险的重要路径。

[责任编辑：杨立]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 前景探析

刘阿明

【内容摘要】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发展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 四方安全对话 印太战略 三边合作 地区秩序 东盟方式

【作者简介】 刘阿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20）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1-0088-2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1005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 Quad 或“四方对话”）机制沉寂多年之后于 2017 年再度“复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在此之前，虽然它们之间的三边和双边合作取得了进展，但四方对话和联合行动却未出现。对于该机制的重启，既有充满担忧的批判性观点，又有乐见其成的积极评价。无论如何评价，该机制都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和政策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演变，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与 2007 年的首次出现相比，重启的机制具有哪些新特点？经过三年的演进，它对地区以及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前景进行研判，并进一步分析在新的地缘战略形势下，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再次出现的地缘战略安排。

一、问题的提出

2017 年 11 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复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实际上，四国合作最早始于 2004 年 12 月。彼时，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促使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快合作，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救援行动。在当时合作的基础上，2006 年，安倍晋三在其当选日本首相几个月前，首次以“民主国家的集合”之名提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概念，^①得到了另外三方的响应。2007 年 5 月，利用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议之机，四国官员低调举行了会晤。同年 9 月，美、印在“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中将澳大利亚、日本与新加坡纳入，实现了首次扩容。

Quad 的出现引起了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分别与其目标指向及主导国有着最大安全关联度的中国和韩国的关注和担忧。作为对这种关切的积极回应，2007 年 11 月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明确表示，澳不会再次提议针对中国的四边对话，四国会议是一次性的。^②随着澳大利亚的退出和安倍晋三的辞

^① Shinzo Abe, *Towards A Beautiful Country*, Tokyo: Bungei Shunju, 2006, p. 160.

^② Frank Ching, “Asian Arc of Democracy,” *The Korea Times*, April 24, 2008,

职，Quad的合作也随之搁置。

此后十年间，尽管四方对话和联合行动没有出现，但四国内部的三边和双边合作却取得了进展。三边对话被认为是夯实双边并进一步拓展四边关系的工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始于2002年的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和2011年开始的美、日、印三边对话，特别是2015年日、印、澳首次举行的三边战略安全对话，被看作是“加强了一种‘四边式’伙伴关系再次出现的重要趋势”^①。在双边层面，除了美日、美澳传统同盟关系得到加强外，日澳之间也建立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2+2”）定期会晤机制，实现了所谓的“辐—辐”联系，促进了双边防务合作的持续升级。更值得注意的双边关系动向是美、日、澳三国分别与印度关系的跨越式发展。自2007年以来，美、印签署了数个军事、情报合作协议，提升了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2014年9月，日、印建立了“特别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并于2016年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日本首次在防止核扩散这一核心外交政策原则上做出妥协；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印澳战略关系迎来大发展，双方签署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并于2017年建立“2+2”对话机制。与此同时，三边和双边的实质性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也在增加。^② 此类联合行动显然超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同盟体系，在四国间建立了多重合作关系，提升了协作能力，并反过来为更深入的政治互信奠定了基础。^③

伴随三边和双边互动的强化和升级，Quad于2012年12月再次正式成为各国政府层面讨论的问题。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建议美、日、澳和印度合作，“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广阔的……民主安全菱形。”^④ 2017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opinion/2008/04/171_19480.html.

① John Nilsson-Wright, *Creative Minilateralism in a Changing Asia: Opportunities for Security Convergen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India and Japan*,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July 28, 2017, p. 18.

② 关于四国间双边关系的演进，详见屈彩云：《双边视角下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第37—50页。

③ Patrick Gerard Buchan and Benjamin Rimland, “Defining the Diam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CSIS Briefs*, March 2020, p. 4.

④ Lavina Lee, “Abe’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and New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30, No. 2, December 2016, p. 1; 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20—21页。

年 11 月，在东亚峰会举行之际，美、日、澳、印四国外交官举行了十年来的首次会晤，会后各自发表声明，表达对 Quad 的支持。美国宣称，与日、澳、印的“四边磋商是美国推进地区接触的新里程碑”^①。澳大利亚认为，“Quad 对于澳大利亚和地区都是一个重要的合作平台”^②。相对而言，印度对于 Quad 的态度更加谨慎，但也表达了对“印太”区域内更大的多边合作的期待。四国迄今已举行了六次会晤，不仅将会晤级别提升到外长级，而且不断扩展新议题，既包括对各自“印太”地区愿景的讨论及对地区秩序原则的重申，也涉及具体的海洋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协作领域。

Quad 的新发展基于其固有的历史轨迹，因而此次其再现被称为“Quad 2.0”。自重启之日起，对 Quad 的评价主要有两类。一是充满担忧的批判性观点，认为 Quad 将无法显示作用和发挥影响。一方面，虽然四国之间在利益上有共通性，但鲜有迹象表明它们具有协调一致的战略优先目标，即使是美国也未必始终将遏制中国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由于 Quad 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其理念的分裂性和对抗性不仅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而且也得不到地区内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的支持。^③二是乐见其成的积极评价。一些学者认为，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过去十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中国力量的增强及其在领土诉求上的立场是四国之间加强联合的关键驱动因素；此次 Quad 的重启是以“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对地区事务频繁的讨论和协调行动为基础的，必将使四国合作进一步加强。^④中国学者往往以更加理性和特有

①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7, p. 46; 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November 4, 2019, p. 6.

② Lowy Institute, *The 2019 Lowy Lecture: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October 3,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2019-lowy-lecture-prime-minister-scott-morrison>.

③ 关于 Quad 的批判性观点，主要参见 Michael D. Swaine,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 2018,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u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 Huong Le Thu ed., “Quad 2.0: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Revived Concept,” *Strategic Insights*,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14, 2019, pp. 1-26; Benjamin Zala, “Taking the Potential Costs of the Quad Seriously,” in Andrew Carr ed., *Debating the Quad*, Centre of Gravity Series, No. 39,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Canberra, March 2018, pp. 19-22; William Choong, “America under Trump Lacks Commitment to Compete with China in Asia to Defend th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ugust 13, 2018,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18/08/america-under-trump>.

④ 关于 Quad 的期许性观点，详见 Jesse Barker Gale and Andrew Shearer, “The

的中国视角对 Quad 的重新活跃进行分析，认为四边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明显有针对中国崛起之意，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峻挑战，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尽管 Quad 未来仍面临一些挑战，但中国应警惕其战略意图并审慎加以应对。^①

二、“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

相较于十年前的稍纵即逝，Quad 此次三年多来的发展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并对地区战略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加以认真分析与研判。

（一）新版“四方安全对话”的特点

第一，Quad 升级版具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即与中国对抗。这与十年前的 Quad 具有明显的区别。此种变化源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是为了阻止美国进入（印太）地区”。^②次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继续追求军事现代化，以便在短期内取得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定义为国家威胁，而美国的国防任务之一就是“以扩展同盟和伙伴关系为主要战略手段”，达到“维持印太地区力量对比优势”的地缘战略目的。^③2020年5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罗列了所谓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领域“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将中国界定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和美国生活方式造成威胁的国家。^④美国是四国中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CSIS Briefs*, March 2018, pp. 1-4; Ian Hall, “Meeting the Challenge: the Case for the Quad,” in Andrew Carr ed., *Debating the Quad*, pp. 12-15; Arzan Tarapore, “The Geopolitics of the Quad,” *Commentar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geopolitics-of-the-quad>.

① 张洁：《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59—73页；张力：《“印太”视域中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初探》，《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第1—8页；陈庆鸿：《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进展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6期，第44—52页。

②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46.

③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pp. 2, 4, 9,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④ White House,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唯一直接将中国贴上“敌手”标签的国家，并将 Quad 称为“一个绝对恰逢其时的想法”。^①

相应地，其他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的担忧。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国，日本对中国“威胁”的渲染一开始就出现在安倍晋三“民主安全菱形”的提议之中，并一再扬言要关注中国在亚洲的军事能力和意图。日本 2020 年度《防卫白皮书》用整整 34 页分析中国军力，声称中国军力快速增强，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升级，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影响。^② 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正在上升到与美国相匹敌甚至在某些时候高于美国。”^③ “自 2016 年起，主要大国在促进其战略偏好和寻求发挥影响力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包括中国积极寻求在印太地区更大的影响力。”^④ 为谋求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上升也相当警惕，并不断强调两国之间力量的“不对称性”。显而易见，虽然尚未形成一个明确针对中国的同盟，但四国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以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为目的。四国形成的菱形地缘分布具有一种潜在的地理优势，使其能够作为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合作机制，协调各方战略，阻止中国以地区“霸权”国家出现。^⑤

第二，“民主价值观”成为 Quad 秩序构建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认为，“所有的 Quad 成员都是民主国家，这是其最突出的特点。”^⑥ 这一点其实与十年前并无不同，之所以在今天被突出强调，是因为新版 Quad 试图以“民

May 26,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ranscript of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8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2, 2018, <https://dod.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538599/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plenary-session-of-the-2018-shangri-la-dialogue/>.

② 《专家点评：日本 2020 版〈防卫白皮书〉煽动“中国威胁”》，央广军事，2020 年 7 月 17 日，http://military.cnr.cn/ydcj/20200717/t20200717_525172166.html。

③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November 2017, p. 25.

④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 July 2020, https://defence.gov.au/StrategicUpdate-2020/docs/2020_Defence_Strategic_Update.pdf.

⑤ Arzan Tarapore, “The Geopolitics of the Quad,” *Commentar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geopolitics-of-the-quad/>.

⑥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8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2, 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538599/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plenary-session-of-the-2018-shangri-la-dialogue>.

主价值观”作为整合、构建地区秩序的战略抓手。首先，以价值观为基准界定朋友和敌人。早在2007年Quad首次出现前后，美国战略界就大张旗鼓地讨论过“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声称要建立一种民主国家间的协调一致，在欧亚大陆及以外地区加强自由民主体系，以应对非民主国家造成的问题或威胁。^①“四方对话”不仅被定义为“世界上四个最大的民主国家”间分享关于地区安全看法的平台，强调四国价值观的共通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协作关系和相互信任，而且在国家间关系中以价值观为标准，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分野，并以此确立对立的战略思维。其次，凸显“民主价值观”对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各种场合都被美国大力渲染。在2017年11月第一次会议之后美国发表声明称，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原则，四国伙伴承诺加强合作，并将继续讨论进一步加强在“印太”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②在2019年1月印度瑞辛纳对话中，首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表示，Quad“有着25年渊源的生机勃勃的关系……在过去70多年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为我们所有国家带来了和平与安全……”^③Quad被看作是民主伙伴国家为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而进行磋商的重要手段。通过在所谓“共同的民主价值与原则”基础上寻求建立“印太”地区秩序，Quad实质上打破了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奉行和持续推进的开放的地区主义进程，将地区国家以价值观划线，渲染地区存在所谓“自由”和“压迫”两种秩序之争。^④

第三，Quad构成更宏大战略，即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① 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September 27, 2006; 刘阿明:《民主国家同盟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96页。

② Heather Nauert, “Australia-Ind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the Indo-Pacifi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state.gov/australia-india-japan-u-s-consultations-on-the-indo-pacific/>.

③ Jim Garamone, “Commander Stresses Importance of Indo-Pacific Partnership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9,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727679/commander-stresses-importance-of-indo-pacific-partnerships/>.

④ 陈庆鸿:《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进展及前景》,第52页。

⑤ Wu Shicun and Jayanath Colombag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China's Response*, 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 October 2019, p. 5.

在 2007 年四国首次会晤之后，安倍晋三就在印度国会发表了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宣称“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正形成一种自由与繁荣之海的动态结合。”^① 这可谓“印太”的粗浅表达。十年来，随着自太平洋西海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广袤区域日益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心，这一区域的“印太”标签和所谓“印太战略”更为世界所熟知。Quad 的重启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不仅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而且在理念和效用上调一致。一是推动对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FOIP）理念的认同。这一理念由安倍晋三于 2016 年首倡，之后得到美国的强调和支持。在 2018 年 6 月第 17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四国均阐述了各自的“印太”理念，“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尊重国际法等成为共同要素，FOIP 理念得到了 Quad 所有成员国的支持。^② 二是成为践行“印太战略”的重要方式。“印太战略”的实施有赖于盟国与伙伴的支持，为此美国正在重新赋予其盟国活力、加强与伙伴国的联系纽带。在美国同盟体系的支持下，Quad 以更大的灵活性、相对低的交易成本和自愿而非约束性的承诺方式，加强美国对伙伴国的非对称性控制，并防止其被拖入不希望介入的冲突之中。^③

第四，加大对发展和治理的投入，以配合战略实施。自第二次会议开始，四国在声明中特别列出了“发展和互联互通、良治、地区安全（包括反恐和防扩散）、海上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等内容，尤其强调“可持续的、私人领域主导的发展、海上安全和良治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④。

目前，四国已经在“印太”地区开展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美国共同宣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设电网；在“印

①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August 22, 2007,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② Huong Le Thu, “‘Indo-Pacific’: (Re-)revise and Resubmit,” Australian Naval Institute, <https://navalinstitute.com.au/indo-pacific-re-revise-and-resubmit/>.

③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019, pp. 232-244.

④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Japan-Australia-India-U.S. Consultations,” June 7, 2018,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2062.html;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s,” November 15, 2018, <https://www.state.gov/u-s-australia-india-japan-consultations-2/>; 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s (‘The Quad’),” May 31, 2019, <https://www.state.gov/u-s-australia-india-japan-consultations-the-quad/>.

太”商业论坛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确认三国将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即实施“蓝点网络”计划。四国在“印太”区域内的总援助额已经达到数百亿美元。^①有学者甚至称，迄今为止 Quad 所进行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扩大了成员国之间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合作范围。^②此外，四国投资与发展合作还着眼于追求特定的“标准”。2018年11月，第三次 Quad 会议表达了对透明度、真实需要和可持续债务负担的关切。次年5月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美国主办了四国+印尼政府官员会议，讨论了需要通过透明的金融来进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同时强调新的基础设施融资计划。^③透明、高质量、与国际标准一致、利用私人机构等“标准”也在2019年 Quad 会议时成为四国共同的关切，四国表示要继续协调一致和密切合作，确保可持续的私人领域的发展、海洋安全以及良治。^④可以说，Quad 2.0 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十年前的经验教训，议题设置更加多元，其目的在于全方位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意欲从更深远和全面的角度发挥地区作用。

总之，与十年前相比，Quad 2.0 保持了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价值观基础，并在美国的战略引导下，将中国作为现实威胁因素，以促进四国间开展密切和全方位的地区合作，具备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基础。^⑤

（二）新版“四方安全对话”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各领域合作加强了四国间的战略联系，提升了国家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四国频繁的军事演习、战略对话、技术协议和协调行动，有助于培养合作的习惯、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过去三年中，四国间的军事活动、

① Gwen Robinson, “Southeast Asia Gains New Leverage as China and US Battle for Influence,” *Washington Post*, June 14, 2019, <https://washingtonianpost.com/magazine/money/southeast-asia-gains-new-leverage-as-china-and-us-battle-for-influence/>.

② Nina Lebedeva, “Why Is the US-Japan-Australia-India Format Being Revived?” *Astute News*, February 5, 2019, <https://astutenews.com/2019/02/why-is-the-us-japan-australia-india-format-being-revived/>.

③ Asia Development Bank, “New Tools for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of Event, May 4, 2019, <https://www.adb.org/annual-meeting/2019/events/sustainable-infrastructure>.

④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ustralia-India-Japan Consultations (‘The Quad’),” <https://www.state.gov/u-s-australia-india-japan-consultations-the-quad/>.

⑤ Jesse Barker Gale and Andrew Shearer,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p. 4.

信息与情报交流快速增长,创造了历史新高。自2018年美、印举行首轮“2+2”对话后,四国中的每两国之间都确立了“2+2”对话机制,与已建立的三对三边对话机制相互补充,加强了彼此间的战略沟通。美、日、澳、印战术协作能力也在提高。美、印、日“马拉巴尔”和美、澳、日“护身刀”从双边演变为三边联合军演后规模不断扩大,参加演习的武器水平和装备通用性持续提升,三国海军的整合度和协同作战能力日渐加强。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印度一改之前态度,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使四国协调得以强化;美国也在考虑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空中力量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进行联合训练,并寻求提升四国海上力量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第二,在既有合作基础上,四国纷纷将战略触角拓展至更多的议题领域和更广阔的地理范围。正如美国《亚洲再保证法》中所称:“美、澳、印、日四国间的安全对话对于在印太地区应对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战是关键性的。”^①“四方对话”被视为“印太”地区地缘战略的倍增器,是实现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首先,Quad在议题领域将合作重点置于“高政治”领域——南海。四国或以“自由航行”为名派遣军舰在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或以所谓“南海军事化”为借口,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扩建与防御设施建设。^②对于华盛顿来说,Quad实践了美国“印太战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总体安全目标。^③其次,基于Quad的三边或多边协调开始积极向“低政治”领域扩展。2018年7月,美、日、澳宣布建立“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同年11月三国签署《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共同动员和支持私营部门在“印太”地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强数字互联互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美、日、印则在三边对话框架下设立了基础设施三边工作组,并就开发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达成意向协议。^④在发展领域,美国借Quad升级之机加大对

^① 115th Congress, S. 2736-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2736/text>.

^② 李金明:《在南海遏制中国:印太战略的根本目的》,《学术前沿》2018年8月(上),第16页。

^③ Wu Shicun and Jayanath Colombag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China's Response*, p. 8.

^④ 刘飞涛:《美国“印太”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策略》,《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3页。

湄公河次区域的投资，强化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2020 年 9 月，美国会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湄公河五国，将 2009 年建立的“湄公河下游倡议”合作机制升格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既有的 35 亿美元地区性援助的基础上，今后几年再投入数十亿美元，并宣称要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密切合作，对冲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①

Quad 的重启也为其非主导成员国扩展地区战略创造了条件。由于历史问题，日本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一直有限，这被日本很多右翼政客视为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高科技强国的地位不相称。Quad 的恢复强化了日本在谋求地缘政治大国方面的野心，使其有机会将经济与军事技术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和战略影响。日本借与澳、印进行频繁军事演习之机在南太平洋、南海海域和印度洋海域进行军事力量投放演练。2020 年 6 月，日本更是修改《信息分享法》，允许与澳大利亚、印度以及英国分享情报，并在防卫省设立新机构，用以在东盟和太平洋群岛事务方面加强与印、澳的协调。^②此外，从“亚太”扩展到“印太”本身是基于一种现实判断，即印度将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美国鼓励“印度作为一个主导性全球力量和更加强大的战略和防务伙伴出现”^③。印度通过与日本加强海上安全协调，进一步将触角延伸到西太平洋区域。澳大利亚外长佩恩（Marise Payne）也坦言，澳期待“今后更加密切地与印度接触来支持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伙伴”^④。印度洋与南太平洋的结合是印、澳两国都希望看到的战略拓展。澳大利亚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强调在印度洋的利益，包括保护所谓“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和搜救区域、离岸领土和关键的海上通道”，为此计划在国防设施上投资 10 亿美元，以期在西澳大利亚部署小型护卫舰、离岸巡航舰艇以及潜艇。^⑤

① Michael R. Pompeo, “The Mekong-U.S. Partnership: The Mekong Region Deserves Good Partners,” Press Statement, September 14, 2020, <https://www.state.gov/the-mekong-u-s-partnership-the-mekong-region-deserves-good-partners/>.

② “Japan Defense Ministry to Create Post for ASEAN Affairs,” *The Japan Times*, June 28, 2020,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6/28/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defense-ministry-asean-post/>.

③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46.

④ Marise Payne, “Address to the Raisina Dialogue,” January 9, 2019,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speech/address-raisina-dialogue>.

⑤ Aakriti Bachhawat, “Australia’s Indo-Pacific Pitch: What’s in it for the Quad,” *The Strategist*, February 5, 201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ustralias-indo-pacific-pitch->

第三，在外交上释放政治信号。四国以团结一致的方式表达共同的利益诉求，具有一定的外交象征意义。^① 在各自的声明中，四国均表达对共同议题的关注，从最初聚焦地区安全议题，如遏制朝鲜核武器项目、海上安全等，到后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发展；同时在理念上也显示出相当大的共性，即强调在“印太”地区促进一种基于规则的秩序、促进地区内的自由价值观。四国对于理念原则的支持和针对特定议题所进行的小多边联合行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一定的“弱结盟”特点。^② 这是“一种松散的地缘战略联盟，各国关注中国对其利益的潜在挑战，但却不以有强制力的同盟机制来刺激中国。”^③ 因此，虽然 Quad 以表达决心的象征意义以及实质性行动强化了其特定指向的威慑价值，但四国仍不期待将 Quad 提升为正式的军事联盟。相反，它只是表达了在与第五国（也许是中国）发生紧张关系或军事冲突时，四国至少做好准备相互帮助。^④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种形态会在短时间内发展为正式的多边同盟机制，Quad 释放的一致性政治信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止步于象征意义，对实质性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较为有限。^⑤

第四，加强美国在地区同盟框架及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性作用，以此回应美国衰落之说。Quad 从两个方面体现了美国的主导性。一方面是体现了特朗普政府^⑥ 所认同的同盟形态，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地区同盟的演变趋势。

whats-in-it-for-the-quad/.

① Jame Curran, “All Shot and No Powder in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East Asia Forum, January 27, 2018,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1/28/all-shot-and-no-powder-in-the-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

② Darren J. Lim and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4, 2015, pp. 696-727.

③ John Hemmings, “A Reborn Quadrilateral to Deter China,” *The Interpreter*,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November 9, 2017,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reborn-quadrilateral-deter-china>.

④ Derek Grossman, “The Quad Is Poised to Become Openly Anti-China Soon,” Rand Corporation, July 28, 2020,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e-openly-anti-china-soon.html>.

⑤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9*, p. 22, <http://www.cscap.org/uploads/docs/CRSO/CSCAP%202019%20Regional%20Security%20Outlook.pdf>.

⑥ 因为 Quad 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全面复活并发挥影响的，而且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 Quad 的存在及影响在后特朗普时代大概率会延续下去，因此从论证逻辑上说，尽管美国进入政府更迭的阶段，但是文中的一些表述或判断仍无法避开“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

Quad 符合特朗普总统蔑视多边主义、抱怨盟友和伙伴“搭便车”、坚持“公平分摊责任”的态度。^①“(让)盟友(和伙伴)为美国可持续的地区战略接触贡献更多”显然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②美国要求地区盟友和伙伴对其安全作出更多贡献, Quad 正是澳、日向美国政府证明它们承担各自安全责任的一种方法。^③另一方面是维持美国在同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从地缘位置还是从战略力量而言, 四国的结合都将对区域内的力量均势产生影响。美国需以“印太”地缘概念为基准, 在中美竞争的大视野下维持甚至加强对地区同盟体系和具体安全事务的主导权。通过鼓励次级盟友即各个“辐”之间选择性地彼此合作, Quad 对正式、长期的双边同盟发挥了有效的补充作用, 其排他性也保持了美国对亚太双边同盟框架一贯的控制力。同时, 借促进盟友和伙伴间的沟通互动, 美国向其盟友和中国显示决心, 加强对那些所谓受到中国“威胁和霸凌”的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支持。^④

三、“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走向

Quad 重启是地区战略框架的显著变化。尽管其特点也对地区安全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迄今为止四国尚未发表共同声明或联合公报来展示对未来的共同规划, 更不用说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或设立共同的协调机构。从其缘起背景和演变轨迹来看, Quad 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内生性制约、特定成员国的作用和地区战略环境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 Quad 的内在局限性决定了四国难以形成更加紧密的同盟型关系
第一, 共同目标飘忽不定。较之十年前, 虽然 Quad 整体的安全目标相

①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Vice President Pence Announcing the Missile Defense Review,” January 17,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vice-president-pence-announcing-missile-defense-review/>.

②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 241.

③ “Pax Trumpiana—America’s Allies are Preparing for a Bumpy Ride,”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7, 2016,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16/12/17/americas-allies-are-preparing-for-a-bumpy-ride>.

④ Daljit Singh,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Shades of a New Cold W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une 24, 2020, <https://www.iseas.edu.sg/media/commentaries/sino-us-strategic-competition-shades-of-a-new-cold-war/>.

对更加聚焦于中国，但“四国之间没有能够共同分享的、单一的关键性国家利益”，^① 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共同优先目标。安全因素构成了同盟战略产生的最初和最主要动机，但是，安全利益并非国家的唯一利益，尤其是在当前地区安全认知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即使日、澳、印三国均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单一双边关系，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多排在第二位，甚至超过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美国的地区盟友还是印度这种非盟国，考虑到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依赖，都不愿看到与中国的关系过度紧张，均试图避免正式的多边安全承诺。^② 换言之，Quad 这种伙伴关系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从属于其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只有当地区冲突涉及使用武力时，四国才会寻求一种更新的目标。即便如此，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将把它们的全部努力放在利用现有的双边安全同盟，以回应一个主要的、小幅升级的军事活动。^③

第二，威胁认知差异。在缺乏共同的、相同程度的战略威胁感的前提下，四国之间相互依赖不足，“亚洲版北约”的形成绝非易事。一个国家通过观察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来评估其“品格”（忠诚或不忠诚），尤其是当一个国家评价另一个国家是否支持非条约义务时，具体的国家行为将是一国判断另一国忠诚与否的标准。^④ 澳大利亚是 2007 年制约 Quad 发展的主要原因。陆克文曾在回忆录中详细阐述了当时澳大利亚退出的考虑，包括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历史包袱、未来两国与中国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以及这种“四边同盟”方式会给澳美双边同盟带来的影响。这些质疑仍然是今天 Quad 2.0 需要面对的问题。印度政策精英依然对澳中关系未来进展顾虑重重。而澳大利亚内部对 Quad 价值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致，一旦新政府执政，政策延续性可能生

① Nick Bisley, “Is There a Problem with the Quad?” *China Matters Explores*, July 2018, p. 1, <http://chinamatters.org.au/wp-content/uploads/2018/07/China-Matters-Explores-July-2018-The-Quad-1.pdf>.

② Joel Wuthnow, “U.S. ‘Minilateralism’ in Asia and China’s Responses: A New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8, No. 115, 2019, pp. 133-150.

③ Jeff Smith, “Why the Quad Won’t Ever be an Asian NATO,” *The Strategist*, January 24, 201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why-the-quad-wont-ever-be-an-asian-nato/>.

④ Iain D. Henry, “What Allies Want: Reconsidering Loyalt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4, Spring 2020, pp. 45-83.

变。^① 为了避免成为“反华急先锋”，印度曾连续三年拒绝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军演，印澳关系也被认为是四组双边关系中的最大的短板。当然，四国之间的地缘战略算计将因时、因地、因事而发生变化，但国家间战略上的不信任将是持续的影响因素。

第三，政治环境变化对主导国领导意愿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一方面倾向于在西欧和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却加大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和介入。“印太”作为美军地缘政治的重中之重，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军事战略精心经营的目标区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美国在经过长期酝酿后正式推出“印太战略”，并对 Quad 进行升级改造。Quad 2.0 与十年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美国大力推动并主导了这一演变过程，以期在诸如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南海问题上，突出 Quad 在军事方面的作用。^② 然而，美国政治周期的变化同时也对 Quad 的发展提出了挑战。2021 年的新政府如何看待这一安全安排，以及以何种方式展现领导意愿，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四国对于 Quad 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的官方解读并不相同。^③ 印度和澳大利亚更多将其看作是“印太”地区众多多边安排之一，不愿对其赋予任何特殊意义。^④ 因此，虽然美、日最初希望将 Quad 的合作级别提升至部长级，但印度一直反对。^⑤ 随着后续发展，也许这种姿态会有微调，例如，2020 年 11 月举行的“马拉巴尔”军演变身成为四国联合的形式，但是，无论是从参演装备和人员规模，还是从官方和媒体的宣传来看，联合演习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可以说，只要印度等国依然避免将四国合作塑造成为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联盟，这种低层级合作就不会有实质性改变。面对“不情

① Lalit Kapur, “The Indo-Pacific Enigm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1, 2020, <https://amti.csis.org/the-indo-pacific-enigma/>.

② Derek Grossman, “How the U.S. Is Thinking about the Quad,” Rand Corporation, February 7, 2019, <https://www.rand.org/blog/2019/02/how-the-us-is-thinking-about-the-quad.html>.

③ Jesse Barker Gale and Andrew Shearer,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p. 4.

④ Simi Mehta,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A Way Forward,” *Policy Forum*, July 25, 2019, <https://www.policyforum.net/the-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a-way-forward/>.

⑤ Derek Grossman, “How the U.S. Is Thinking about the Quad,” <https://www.rand.org/blog/2019/02/how-the-us-is-thinking-about-the-quad.html>.

愿的参与者”，即使美国也不急于将 Quad 转变为一个“反华集团”。^①

（二）印度的影响

链条的力量受制于其最薄弱环节，即所谓的“木桶效应”。在 Quad 中，印度是公认的最弱一环，在某种程度上，Quad 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印度的态度。印度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力量最弱，与其他三国相比，印度海军及整体军事力量是最弱的一方，印度的武器系统并非依赖美国，短期内无法实现与其他三国在军事上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其合作意愿最弱，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而且高度重视“战略自主性”。^② 作为四国中唯一没有与美国缔结同盟条约的国家，印度认为，与一个大国结盟会将自己置于另一大国的对立面。莫迪特别强调，“印度不会把印太地区看作是一个战略或一个成员有限的俱乐部，也不是一个试图寻求主导的集团，更不会直接反对任何国家，印太的地理定义本身就不能如此。”^③ 虽然印度与美、日、澳的安全联系的深化促进了 Quad 的回归，但是，印度对 Quad 的看法具有多面性，既希望借其平衡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影响力，又不愿支持 Quad 获得更大的地区主导权，更未表明已准备好在南海或西太平洋区域与其他三国共同采取实质性军事行动。当被问及四国是否要建立一种常备军事任务集团或设立一个联合司令部时，大部分印度受访者给予了否定回答。^④ 这意味着未来 Quad 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发展成有制度约束力的多边联盟体系。

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印度有可能越来越重视 Quad 的战略作用。首先，Quad 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军事实力。美、日有着先进军事技术，与 Quad 的合作将帮助印度在广阔的印度洋区域获得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从而增强实力。2017 年的日印《防务装备与技术转让协议》和 2018 年的美印《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使印度在国防科技和军事技术转让方面获得了两国支持；2019

^① Derek Grossman, “The Quad Is Poised to Become Openly Anti-China Soon,”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e-openly-anti-china-soon.html>.

^② 何理：《美日印三边合作升温的背景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2 期，第 30—31 页。

^③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④ Patrick Gerard Buchan and Benjamin Rimland, “Defining the Diam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p. 2.

年美、印又签订重要防务协议，印度将从美国采购系列先进武器装备。其次，作为“东向政策”升级的一部分，印度希望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Quad 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小多边平台。澳大利亚的战略位置重要，在信息收集和潜艇战力等海洋军事技术能力上不容小觑。印、澳之间在 2015 年建立了年度海洋对话、2017 年建立了“2+2”会晤机制，并在近三年中加强了互动；2018 年，印、澳空军相互加入对方的空中和海上军事演习，双方战术协调不断增强。再次，印度是 Quad 成员国中唯一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的国家。2017 年上半年中印“洞朗危机”与下半年 Quad 的回归并非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2020 年两国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冲突虽然结束了军事对峙，但此类事件无疑强化了印度国内主张警惕和制衡中国的强硬派立场。面对两国实力上的差距，Quad 被印度寄予更大的希望用于遏制中国。^①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印度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无论是中印矛盾、印巴矛盾构成的现实威胁，还是对保持在孟加拉湾甚至整个印度洋区域战略优势的渴望，都可能促使印度以更大的决心参与 Quad。当然，这种决心更多来自其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对互惠伙伴关系的期待、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而非被动地被 Quad 牵制。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所称，“印度的愿景……必须通过自己的叙事和理念，找到更加清晰的表达方式……关于利益扩展，印度真正能发挥影响的地区仍然是印度洋，这一事实没有改变。”^② 可见，尽管在战略上存在重视 Quad 的动力，但印度仍将以自己的节奏进行具体的政策安排，而印度对 Quad 的承诺无疑将决定四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限度。

（三）次区域战略空间能否容纳 Quad 的成长

东南亚的历史表明，没有东盟的支持和参与，地区政治或军事合作框架常常无法发挥持续的影响力。东南亚处于印度洋、太平洋两洋交汇点，是

^① Derek Grossman, “The Quad Is Poised to Become Openly Anti-China Soon,”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e-openly-anti-china-soon.html>.

^② Ind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Keynote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Indian Ocean Conference in Maldives,” September 3, 2019,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1915/Keynote_Speech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at_Indian_Ocean_Conference_in_Maldives_September_03_2019.

Quad 的关注区域，也是采取行动的核心区域。这一对话机制最初就引起了东盟的注意。东盟对 Quad 的认知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一是东盟特有的政策偏好，即“东盟方式”。由于东盟自身的多样性，其对 Quad 针对特定目标的安全同盟形式并不认同，也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Quad 的排他性合作特点，显然不符合东盟包容、开放的地区合作理念。二是对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担忧。如同担心 Quad 被用作对中国进行“软遏制”一样，东盟国家对于这个新多边集团可能损害其在地区的中心地位和团结一致表示疑虑。^① 一些分析认为，只要东盟仍然以亚洲地区主义的驱动力量自居，任何正式的四国安排都将遭到其反对。^② 虽然美、日、印、澳均处于东盟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架构之内，但考虑到以东盟为中心建立的亚太多边机制在处理如南海问题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现实，^③ Quad 将拥有比“清谈馆”更多的军事能力和实质性举措，可能在安全领域产生更大影响，甚至削弱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主导性地位。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亚洲多边主义秩序的建设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东盟能否保持其地区中心地位并重新证明其能力，无疑是一种考验。^④ 随着《东盟印太展望》的发布，东盟已经接受了“印太”这一事实，说明其外交未来将致力于在更大的地缘空间中纵横捭阖。对 Quad 的价值，东盟各成员国之间存在迥然不同的观点，反映出当前地区战略环境的复杂性。^⑤ Quad 之所以对某些东南亚国家有一定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希望进一步扩展海上军事能力，以期在海洋和陆地领土争端

① William Choong, “Quad Goals: Wooing ASEAN,” *The Strategist*, July 11, 2018,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quad-goals-wooing-asean/>.

② Lavina Lee, “Abe’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and New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pp. 1-41.

③ Sarah Teo and Bhubhindar Singh, eds., *The Future of the ADMM/ADMM-Plus and Defence Diplomacy in the Asia Pacific*, RSIS Publications, February 23, 2016, p. 2,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idss/the-future-of-the-admmadmm-plus-and-defence-diplomacy-in-the-asia-pacific-2/>.

④ Seng Tan, “Consigned to Hedge: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January 2020, pp. 131-148.

⑤ 关于东盟国家对 Quad 看法的相关民调，详见 Huong Le Thu, “Southeast Asian Perceptions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October 23, 2018, <https://www.aspi.org.au/report/southeast-asian-perceptions-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

中争取最大利益。Quad 成员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技术能力、先进的装备以及后勤和训练技术，已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加强军事关系的目標，如越南等国纷纷加强与美国、印度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则是从经济利益和地区治理考虑，Quad 成员国的市场巨大，各国宣布的对东南亚次区域和落后国家的投资计划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例如，日本提议的湄公河发展援助得到了泰、越、柬、老、缅等国家的支持。2020年3月，四国官员讨论了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新西兰、韩国和越南首次加入，形成了“4+3”对话模式。在可见的未来，东盟国家根据不同领域有选择地与各个区域外国家进行合作，已成为一种趋势。^① 新加坡对 Quad 的评价有一定代表性。2018年5月，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称新加坡至少现在不会加入“印太战略”或 Quad，因为 Quad 并没有完全回答各国对于“东盟中心地位的疑问”。^② 可见，只要 Quad 仍然在功能、理念和制度建设上存在损害东盟中心地位的倾向，东盟主导的次区域战略空间将无法容纳其成长与发展。

综上所述，Quad 混合了局限性和成长性两类因素，其发展前景有待进一步观察。可以肯定的是，Quad 机制化的机会并不大。虽然美国公开声称，华盛顿的目标是将“四方安全对话”组织正式化，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组织，用结构化的方式吸引“印太”地区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以共同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仍需要其他成员国的坚定意愿和积极配合才能实现。^③ 显然，从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发展到一种事实上的同盟仍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目前 Quad 既无可能也无现实条件转变为一个机制化的行为体。^④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调查显示，虽

① Ankush Ajay Wagle, “How will ASEAN Balance a Tug of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US-led ‘Quad’ in the Indo-Pacific?” *Jakarta Post*, October 24, 2018,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8/10/24/how-will-asean-balance-a-tug-of-power-between-china-and-us-led-quad-in-the-indo-pacific.html>.

② Vivian Balakrishnan, “Singapore not Joining US, Japan-led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r Now,” *Strait Times*, May 14, 2018,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ingapore-not-joining-us-japan-led-free-and-open-indo-pacific-for-now-vivian-balakrishnan>.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puty Secretary Biegun Remarks at the 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um,” August 31, 2020, <https://www.state.gov/deputy-secretary-biegun-remarks-at-the-u-s-india-strategic-partnership-forum/>.

④ Huong Le Thu,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ASEAN Centrality,” in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eds.,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SEAN*, p. 99.

然四国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接受将定期的部长级会议作为首脑会谈的补充，但在是否支持建立某种永久性的 Quad 秘书处并由四国轮流担任主席这个根本问题上，各国反应不一，大多持怀疑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Quad 充其量只是一个缓慢的“聚合”而非快速机制化的过程。^①

四、中国的应对

作为中国周边最具争议的地缘政治安排之一，Quad 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是随着中美紧张关系加剧，Quad 针对中国的功能有可能被逐步激活，对此中国需更积极和审慎应对。可以说，当前决定 Quad 前景的最大单一因素仍然是中国。为了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应努力从战略角度影响 Quad 的发展。

第一，针对 Quad 的内在局限性，应进一步扩大各国的威胁认知鸿沟。美、日、印、澳四国间正式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成反比。在“印太”国家中，在与中国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之间寻求平衡的做法日益盛行，尤其是后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显得更加脆弱已是不争的事实。^② 因此，保持经济手段的影响力，并将冲突限制在一种可控的范围内，无疑是中国外交亟须达到的目标。

中国需要不断扩大澳大利亚和印度“两面下注”的空间。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促使两国放弃 Quad 这一小多边安全合作方式，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地鼓励它们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并强调两者并行不悖，而非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更不能主动迫使两国更深地依赖 Quad。虽然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结构性难题，中、澳之间也有需要认真对待的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总是会把自己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永远的战略优先选项。通过在多个伙伴之间“两面下注”以维持战略自主，已经成为此类国家战略的共同特点。中、印两国同为金砖国家合作机

^① Patrick Gerard Buchan and Benjamin Rimland, “Defining the Diam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p. 2.

^② Max Fisher and Audrey Carlsen, “How China is Challenging American Dominance in Asia,”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3/09/world/asia/china-us-asia-rivalry.html>.

制的成员，有着畅通的政治沟通渠道。在洞朗危机后，中、印领导人利用各种多边场合频频会晤和互访，不仅稳定了两国关系，而且建立了军方热线，并完成了第一个安全合作协议，以防止“双边分歧激化为对双方都不利的敌对关系”^①。同样，在2020年发生边界冲突后，中印双方经过多轮会谈，逐渐稳定了边界局势。中、澳两国经济联系依旧密切，对澳大利亚来说，其政府意识到在两年的龃龉不断之后，需要“重启”与中国的关系。^②提升中国与印、澳的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增加政治交往，有助于削弱Quad安排对它们的吸引力。

第二，在四国行动的核心区东南亚，应进一步推动以东盟为中心的“包容性地区主义”机制建设。从四国不断强调东南亚在“印太”地区及“印太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可见，Quad希望通过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认可而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和“可信度”，毕竟南海问题是促使四国重启合作的一大动因。但是，即使是越南这样强硬的声索国，对于Quad的任何“反华”集团标签都相当敏感，“Quad+”在地区内依然遭到相当大的抵制。^③当认同政治从社会个体、群体上升到主权国家对自身的认同、对他国的排斥，其内在冲突就更加令人担忧。如果认同政治在一个社会内部已经造成了冲突，其必然也将导致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④有鉴于此，中国应继续秉持包容、开放、合作的地区主义理念，倡导地区和平主义；应进一步强调该地区的未来决不能由所谓的“民主四国”来决定，因为以价值观为合作基础、以针对某一国为合作目标的地区主义不但不符合地区内大部分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会使东盟所推动建设的地区和平机制的努力付诸东流。面对“印太”地区所经历的深刻、激烈和不稳定变化，唯一有利于所有国家的选择是继续坚定支持包容、开放、合作的地区主义理念，创新性地发展地区机制中的东盟中心

^①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9*, p. 21.

^② Lai-Ha Chan, “Hedging or Balancing?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s Differing China Strategies,” *The Diplomat*, July 14,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hedging-or-balancing-australia-and-new-zealands-differing-china-strategies/>.

^③ Derek Grossman, “The Quad Is Poised to Become Openly Anti-China Soon,” <https://www.rand.org/blog/2020/07/the-quad-is-poised-to-become-openly-anti-china-soon.html>.

^④ 郑永年：《认同政治与时代大冲突》，《联合早报》2020年6月30日，<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200630-1065167>。

原则，积极推动“和平地区主义”机制建设。

总之，鉴于 Quad 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结 束 语

由于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得以在最初四边对话的基础上重启。这一发展固然体现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规划和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 Quad 2.0 会比其前身更加成功。鉴于各方利益重点和威胁认知的差异妨碍了集体行动的有效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若要发挥预期作用，其内容和形式均有待充实和提升。虽然它会像世界上其他话题一样“一时引人注目，转瞬归于平寂”^①，但 Quad 作为“印太”地区内重要的战略变化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领域（如南海），Quad 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有着遏制中国意图的安全集团，Quad 将进一步恶化地区战略环境，并可能导致区域内部关系紧张的零和竞争状态。未来，无论是从各国不尽相同的利益重点和威胁界定，还是该集团中最弱一方对于组织发展的决定性制约作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对其接纳的程度来看，Quad 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将是其最大制约因素。中国应积极主动运筹和平外交政策，化解 Quad 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努力争取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南博一：《王毅回应“媒体炒作印太战略”：各种话题像浪花转瞬归于平寂》，澎湃新闻，2018年3月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1920。

澜湄合作的动力机制*

——基于“利益—责任—规范”的分析

卢光盛 聂姣

【内容摘要】 尽管中国主导创设的澜湄合作机制是湄公河地区国际合作机制的后来者，但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已成为次区域合作的典范。对澜湄合作理论层面的研究与澜湄合作快速发展的现实是不相称的。本文试图搭建一个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创设地区机制的动力，认为澜湄合作是中国推动自身利益与湄公河国家利益相适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导下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积极构建“利益—责任—规范”三位一体的地区规范的过程。然而，目前增强澜湄合作发展动力还面临着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中国责任”与“他方期待”不对称、地区规范建构缓慢等因素的制约。澜湄合作要在众多地区合作机制中脱颖而出，需要关注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和集体认同的建设。而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机制和保持制度的灵活性将是未来澜湄合作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澜湄合作 利益—责任—规范 周边外交 机制创设

【作者简介】 卢光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教授（昆明 邮编：650091）；聂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 邮编：650091）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1-0110-20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1006

* 本文系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7ZDA042）的阶段性成果。

澜湄合作是中国主动倡议,旨在稳定、协调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关系的新型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从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角度来看,澜湄合作是中国从国际机制的被动参与者到主动创建者角色转变的重要一步,“澜湄合作或可成为中国外交制度中最有成效的倡议。”^①对于目前已经取得较好发展成绩的澜湄合作而言,如何保持澜湄合作机制的生命力,如何在澜湄合作中塑造和提高中国的制度话语权,进而将中国理念转化为地区规范乃至国际规范,如何在中国主导的地区机制实践中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地区机制理论,这些是本文要着重思考的问题。目前,很多国内学者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实践在理论研究层面的不足。例如,徐秀军提出“如何将‘一带一路’的实践在理论上用中国话语加以阐释是中国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②。杨洁勉也多次提出要重视中国外交的理论构建。^③澜湄合作同样如此,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澜湄合作实践层面的研究,即对澜湄合作的建立原因、发展现状、面临困难、未来发展等方面的研究。^④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中国主导的澜湄合作对湄公河地区的影响,认为中国在澜湄合作中仍然主要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影响。^⑤还有国外研究关注澜湄合作所面临的

① 李巍:《澜湄合作的发展与挑战》,察哈尔学会网站,2019年12月2日,<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15556>。

② 徐秀军:《“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理论命题》,《世界知识》2019年第20期,第16—17页。

③ 杨洁勉:《大国崛起准备的理论启示》,《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第1页;杨洁勉:《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1—15页;杨洁勉:《中国外交70年: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第6—19页;杨洁勉:《“一带一路”深入发展需要理论先行》,《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9日,第3版。

④ 详见李晨阳:《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遇、挑战与对策》,《学术探索》2016年第1期,第22—27页;卢光盛、金珍:《“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原因、困难与路径》,《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3期,第22—38页;卢光盛、张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与跨境安全治理》,《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22页;卢光盛:《澜湄机制如何从湄公河地区诸多边机制中脱颖而出》,《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第24—27页;卢光盛、别梦婕:《澜湄合作机制:一个“高阶的”次区域主义》,《亚太经济》2017年第2期,第43—49页;卢光盛、罗会琳:《从培育期进入成长期的澜湄合作:新意、难点和方向》,《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2期,第18—28页;刘卿:《澜湄合作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43—54页;李巍、罗仪馥:《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澜湄合作机制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第17—25页。

⑤ Sebastian Biba, “China’s ‘Old’ and ‘New’ Mekong River Politics: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Benefit-sharing Perspective,” *Water International*, Vol. 43, No. 5,

挑战,认为相关挑战主要包括合作尚不成熟、项目分布不均、信息和参与度有限、与该地区现有机制之间的界限模糊、成员国潜在的债务问题、因中国地区影响力扩大而削弱东盟团结等。^① 总体而言,理论层面的研究与澜湄合作快速发展的现实是不相称的。在澜湄合作已经由快速拓展期进入全面发展期的背景下,本文探索构建一个“利益—责任—规范”三位一体的地区机制分析框架,对澜湄合作过去四年多的实践进行理论化分析和探究,并就未来如何增强澜湄合作的发展动力提供若干前瞻性思考。

一、中国创设地区机制的动力分析

当前,在全球化遭受挫折的背景下,区域化有加强的趋势,^② 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日益显现。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逐步扩大,中国已成为地区秩序构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参与和创设地区机制成为中国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动力反映了特定政治现象的发展及其背后推动力之间的关系。^③ 分析地区机制的动力,能更深入地认识地区机制的内在驱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地区机制的发展方向。

(一) 中国创设地区机制的动力分析框架

二战后,国际机制的大规模兴起带动了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形成了国际机制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权力的现实主义、基于利益的自由主义和基于文化的建构主义。^④ 与西方合作理论不同,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命运共同体

2018, pp. 622-641; and Carl Middleton, Jeremy Allouche, “Watershed or Powershed? Critical Hydro Politics, China and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1, No. 3, 2016, pp. 100-117.

① Poowin Bunyavejchewin,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 Viewed in Light of the Potential Regional Leader Theory,” *Journal of Mekong Societies*, Vol. 12, No. 3, 2016, pp. 49-64; Pongphisoot Busbarat, “Grabbing the Forgotten: China’s Leadership Consolid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ISEAS Perspective*, February 6, 2018, pp. 1-8; and Pich Charadine, “Cambodia in the Context of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MLC): Progress and Ways Forward,” Konrad-Adenauer-Stiftung, December 2018, p. 4, <https://www.kas.de/documents/264850/264899/PICHT=1547520230286>.

② 张蕴岭:《国际治理向何处去(中)》,《世界知识》2019年第22期,第72页。

③ 赵建明:《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动力学分析(1953—2007)》,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3页。

④ Andreas Hasenclever,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为指向，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赢为目标，以承担大国责任为重要条件，体现出后来者应有的谨慎和大国应有的气度。^① 基于此，在吸收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流派关于国际机制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际合作的理论和实践，本文尝试提出“利益—责任—规范”框架，探索搭建一个理解中国主导构建地区机制的初步分析框架，提炼和总结中国的地区合作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地区机制乃至国际机制理论。

第一，利益。

利益是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国家交往离不开利益。在国际机制中，利益是国际机制创设和维持的根本动力。在地区机制中，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考虑机制主导国的自身利益，二是要兼顾机制中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三是需要考虑对地区外利益攸关方的影响。一方面，维护自身利益是主导国创设国际机制的首要出发点。国际合作以共同利益为前提，但国家利益仍是决定一国外交行为的首要因素。另一方面，共有利益是开展国际合作的首要前提。机制的构建缘于各方共同利益需要，其建立本身就是一个积累或培育共有利益的过程。^② 换言之，地区机制的创设和维持，实际上是各参与方促进共同利益并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利益在地区合作中有重要导向作用，但在关注利益创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地区机制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往往是影响地区机制深化的一大障碍，利益分配问题处理不当会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一个较好方案是建立利益分享（Benefit Sharing）机制。利益分享是人类在获取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如何在资源的使用者与提供者之间分享由资源利用所带来的收益。^③ 在水资源合作中，利益分享机制有助于评估沿岸国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了解水资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

①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16页。

② 王公龙：《国家利益、共有利益与国际责任观——兼论中国国际责任观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23页。

③ 郭延军、任娜：《湄公河下游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各国政策取向与流域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144页。

源产生的相关收益，是“促进拥有跨界河流国家之间合作的实用工具”。^①

第二，责任。

一般而言，一个大国只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才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国际地位的认可，而供给公共产品是体现大国国际责任的最主要方式。^② 地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中国是公共产品的新兴供给者，但相关经验和供给能力还不足以完全承担供给地区公共产品的责任。维护地区合作是地区内各国共同的责任，不只是主导国的责任。因此，地区相关国家根据自身能力应当承担相应的地区责任。同时，国际机制的创建和维持又不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其不能同等地、无差别地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偏好和需求。^③ 承担过多的责任也可能会造成“出力不讨好”的局面，若中国提供过多的区域公共产品，可能会使地区内国家和域外大国产生疑虑，即中国试图通过垄断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谋求地区霸权。

“角色”是理解责任的重要视角，既包括机制主导国自身的角色认知，也包含其他参与方对主导国的角色预期，即“他方期待”。一般而言，国家依据对自身国家利益目标的认知来决定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国际责任是中国国际角色发生变化所必须关注的议题。从中国自身角色认知角度看，国际责任是对国家身份和国家能力的清醒认识，中国已经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认知。从其他参与方对主导者的角色预期的角度看，国际社会期待日益强大的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可以说，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既是自身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是国内外的共同需求。^④ 在国际机制中，促进机制内各国的发展是各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但各成员国承担共同国际责任的能力是不同的。这种能力差异使得机制内各国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快与较为落后的国家之间承担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① Seungho Lee, “Benefit Sharing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Water International*, Vol. 40, No. 1, 2015, p. 140.

② 黄河、戴丽婷：《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年第1期，第254页。

③ 刘宏松：《声誉、责任与公正：中国多边外交的三种需求》，《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第27页。

④ 王公龙：《国家利益、共有利益与国际责任观——兼论中国国际责任观的构建》，第27页。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际发展合作或国际发展援助领域。^① 与常规对外援助集中于单个国家相比，跨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多个国家采取以结果为导向的发展合作措施。^② 在传统的发展合作或发展援助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中，由霸权国和国际发展机构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其余国家以“搭便车”的方式免费享受公共产品。但在次区域合作中，由于没有一国完全具备承担供应公共产品的能力，因此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需由地区内国家共同分担。在地区合作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引申为地区机制内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彼此分担相应的责任，以实现地区的繁荣稳定，进而实现命运共同体目标。在中国创建的地区机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包含两方面内容，即“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前者指地区内各国都承担相应的责任，后者指地区内国家应根据不同情况承担有区别的责任。地区合作能否顺利推进，地区大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承担着更重大的责任。

第三，规范。

规范是指施动者要求受动者遵守其提出的一系列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它规定了受动者在言论、行动等方面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③ 地区内国家对地区机制的认可程度，关乎这个机制的发展以及该机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地区认同主要通过地区规范来实现，当地区规范被地区国家强化、内化之后，就可能会产生对于该地区机制的认同。简言之，地区共有规范的形成关乎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行为体遵守国际规范主要出于几个方面原因：一是他国尤其是霸权国的强迫；二是来自国际社会的规范性压力；三是维护或增进自身利益，比如通过遵守国际规范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合法性；四是自身对该规范的认同。^④ 换言之，地区机制的规范依赖于其强制性

① 叶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对 2015 年后议程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105 页。

② 黄河、戴丽婷：《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第 257 页。

③ 范佳睿、翟崑：《规范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当代亚太》2017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④ 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分析》，《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62 页。

(被动性)和主动性。强制性是由于行为体担心规范执行者的惩罚,这往往是因为行为体之间有明显的实力差距。强制性也是由于遵守规范符合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当遵守规范能获得更多物质利益时,行为体自然会选择遵守规范。主动性则表现为成员国自身认为这种规范是合理、合法的,应该遵守,因此主动参与地区合作,共同塑造地区规范。这种主动性建立在地区内相关国家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这一意义上的地区机制已被内化于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和自身利益中,行为体是自愿、主动地遵守规则。^①

现实主义从权力的角度看待规范,认为规范是权力的外在表现。^②国际规范的塑造过程实际上就是提升一国隐性权力的过程。^③规范传播要经历一个过程,即让地区内其他国家自觉接受地区规范,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在一个新创设的国际机制中,往往是“核心成员国确立了某种规范,所有成员国逐步接受和内化新规范”^④。在地区机制中,中国可以扮演规范倡导者的角色,并在规范的制度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本文对澜湄合作中规范构建的讨论加入了国际机制道义性的考量,主要侧重于价值层面,即“通过树立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来建立新的地区规范”^⑤。

(二) “利益—责任—规范”的互动关系

在地区机制中,“利益—责任—规范”三者是互动关系,利益是地区机制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责任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是领导的动力;规范是应遵守的价值观,是精神动力。三者环环相扣,相互作用。或者说,地区机制中的“利益—责任—规范”之间形成了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见图1)。从递进的角度来看,利益是物质基础,规范是理想追求,责任是联系两者的桥梁。“利益—责任—规范”之间的关系是双

① 刘宏松:《机制合法性与国际机制的维持》,《学术探索》2005年第2期,第84页。

② 程晓勇:《东盟规范的演进及其对外部规范的借鉴:规范传播视角的分析》,《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第35页;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5, p. 7.

③ 孙德刚、韦进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规范塑造评析》,《国际展望》2016年第4期,第113页。

④ 程晓勇:《东盟规范的演进及其对外部规范的借鉴:规范传播视角的分析》,第37页。

⑤ 卢光盛、别梦婕:《“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外交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以澜湄合作为例》,《国际展望》2018年第1期,第23页。

向流动的，既包含着“利益—责任—规范”循序渐进的过程，地区机制在利益的引导下强化相关国家的责任，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性规范；又包含着“规范—责任—利益”的反向作用过程，地区机制的本质是建立规范，共同塑造规范以更加高效的方式促成集体行动，进而收获共同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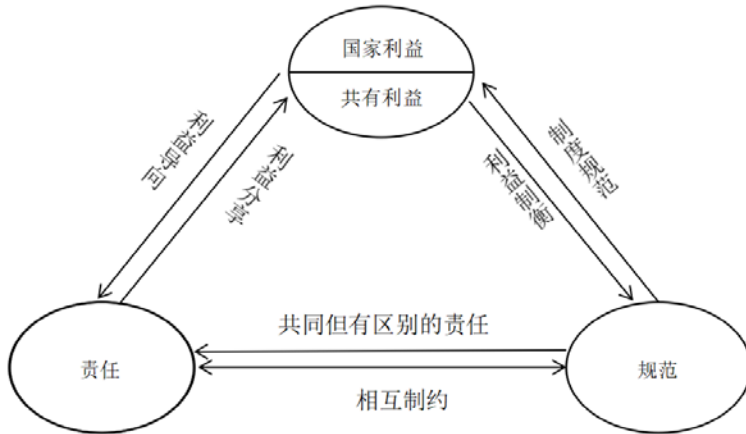


图1 “利益—责任—规范”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利益与责任的关系中，利益导向强化了相关国家的责任。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崛起依托于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因此承担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的责任，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在责任与规范的关系中，责任会提升行为体间的认可度和信任度，进而促进规范的构建。反之，共同制定地区规范也有利于改变地区内的角色结构，赋予成员国“主人翁”意识，进而承担共同的责任。在规范与利益的关系中，利益是地区规范的物质基础，遵循规范就是在塑造和维护共同利益。实际上恰恰是行为体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将规范不断建构和再建构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而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规范对地区秩序的维护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影响着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利益、责任、规范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比如阎学通认为国际责任包含在国家利益中，提出了“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大的

责任已成为中国的重要利益”的观点。^①其次，利益、责任、规范之间具有跳跃性。比如利益诉求和认知的形成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逻辑。^②另外，通过遵守规范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合法性，这能够带来物质和声誉上的收益，这种收益又进一步强化了行为体遵守国际规范的意识。再次，在地区机制与利益、责任、规范的关系上，存在着“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机制是国家追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也塑造着国家利益或偏好，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利益有限制作用。^③最后，利益、责任、规范之间的平衡和约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目前没有一个权威的国际性机构可以对一个利益交织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责任定位，^④因此当利益、责任、规范三者出现矛盾时，只能尽可能把利益的实现纳入国际道德和国际规范的框架内。在中国创设的地区机制中，作为地区机制的引领者，中国在积极承担地区合作主要责任的同时，需要在坚持国际机制道义性原则上建立适当的自我约束机制，加入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以强化行为规范与道德吸引力，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二、澜湄合作的动力分析

澜湄合作是湄公河地区国际合作机制的后来者，但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已发展成为次区域合作的典范。中国推动自身利益与湄公河国家利益相适应，主动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追求地区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塑造“利益—责任—规范”三位一体的地区规范。

（一）增进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共同利益是澜湄合作的物质动力

在地区合作利益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国家利益和湄公河国家共同利益成为澜湄合作的物质动力，也是根本动力。

①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② 仇华飞、叶心明：《规范引导与争论：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3页。

③ 焦世新：《利益的权衡：美国在中国加入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4页。

④ 刘鸣：《中国国际责任论评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第52—54页。

第一，澜湄合作的创建与迅速发展符合中国追求地区引领地位的国家利益。首先，澜湄合作实现了中国从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向建设者、引领者的转变。中国参与国际机制要经历从全面参与国际机制、使国际机制更为合理、参与创立新国际机制、积极参与新国际机制的决策、适时承担主导国责任的过程。^①显然，澜湄合作机制的提出且成功推进说明这个“适当时机”已经到来。通过主导创建澜湄合作，中国在经济上增强了与湄公河国家的联系，在政治上获得了湄公河国家的支持。^②其次，澜湄合作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威望。中国主导创建澜湄合作机制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湄公河国家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并逐步消除该地区国家对中国的疑虑。通过创建澜湄合作机制，使中国在地区层面具备了制度影响力，既扩大了制度性权力，也提升了外交话语权。^③再次，有利于加强湄公河国家对中国的认同。中国对参与地区机制日益积极，除了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考虑外，身份认同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④对现阶段的澜湄合作来说，中国对身份认同的考量发挥着较大作用。

第二，澜湄合作机制的创建与迅速发展以各成员国的强烈合作意愿为前提。首先，湄公河国家具有以合作促发展的需求。通过参与澜湄合作，湄公河国家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上半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中国对湄公河国家的贸易额、投资额却逆势上扬，分别增长8.7%和33.5%。^⑤其次，澜湄合作有助于增强湄公河国家的国际地位。对湄公河国家而言，加入由中国主导创设的澜湄合作，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其与中国进行外交博弈的筹码，帮助有关国家更有效地增进国

①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86页。

② 罗仪馥：《从大湄公河机制到澜湄合作：中南半岛上的国际制度竞争》，《外交评论》2018年第6期，第144页。

③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34页。

④ 郭清水：《中国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的利益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53页。

⑤ 《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8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8/24/c_1126407739.htm。

家利益。^①同时，澜湄合作也为湄公河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外交博弈提供了备选方案。再次，澜湄合作满足了湄公河国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澜湄合作机制本身就是制度性公共产品，而且中国也在尽力满足区域内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公共产品的需求，从而提高中国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中国为澜湄合作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包括：为澜湄次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资金、技术等支持，将与湄公河国家分享澜沧江全年水文信息，承诺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成功后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优先向湄公河国家提供，等等。

（二）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中国成为澜湄合作的领导动力

作为一个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大国，中国有责任在地区机制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中国提出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的倡议，就是其探索发挥建设性领导作用的一种表现。随着中国扮演的国际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承担的国际责任也越来越重。澜湄合作是在中国具备了担当地区机制积极主导者的意愿和实力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中国国际责任发生变化后的产物。中国在澜湄合作中展现的区域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为澜湄合作机制的创设和维持提供了持续保障。

相较于传统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主要是由大国或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提供，澜湄合作是一种“以次区域内南南合作为基础，争取次区域外多元化力量参与的新型区域合作”的新模式。^②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澜湄合作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度体系（见图2）。可以说，澜湄合作是中国在湄公河地区提供的一种“软硬兼顾”的区域公共产品。“软”表现为中国引领澜湄合作的制度建设，将价值、理念、规范等公共产品提供给澜湄地区。一方面，中国作为“规则构建者”主导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在湄公河地区的诸多合作机制中，域外国家而非处于地理“中心圈”的湄公河下游国家才是推动机制发展的“动力源”。^③在澜湄合作机制中，作为域内国家的中国成为推动机制发展的“动力源”，体现了湄公河地区合作由“外力驱动”向“内

① 李巍、罗仪馥：《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澜湄合作机制分析》，第19页。

② 黄河、戴丽婷：《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第258页。

③ 卢光盛：《澜湄机制如何从湄公河地区的诸多多边机制中脱颖而出》，第26页。

力驱动”的转变。^①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精神引领者”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澜湄合作的目标是构建澜湄命运共同体，在该目标指引下，澜湄合作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该地区原有的合作机制协调发展，积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澜湄合作还注重培育“澜湄精神”，比如在有形的身份建设上，2018年1月发表的《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明确提出要设计澜湄合作徽标及其他澜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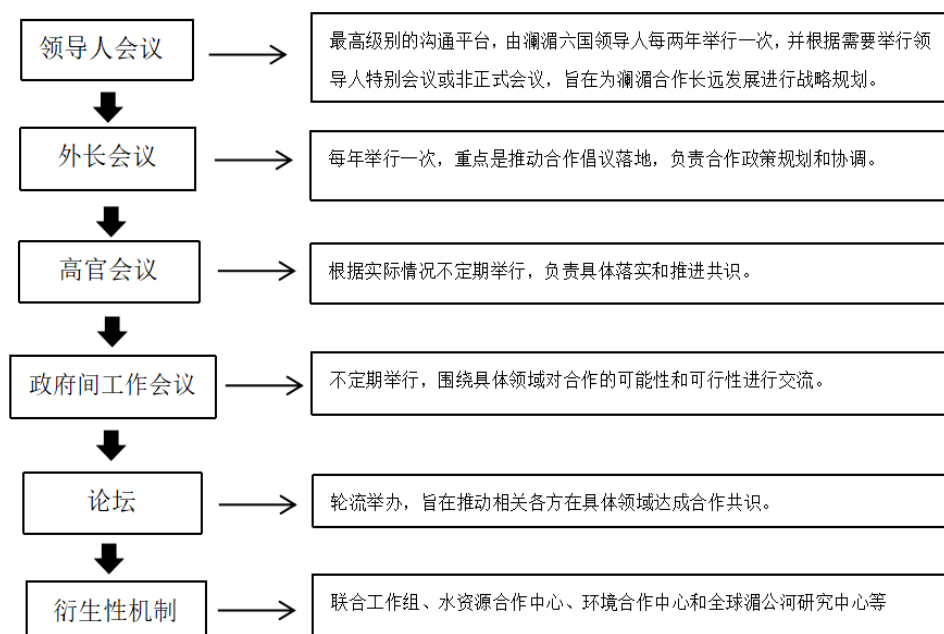


图2 澜湄合作的制度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硬”表现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作为“合作推动者”积极推动落实澜湄合作的具体议题。一是提供政策支持。自澜湄合作启动以来，作为合作主导国，中国为澜湄合作的机制建设、合作内容、项目推进等提供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政策支持。二是建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

^① 卢光盛、金珍：《超越拥堵：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路径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第105页。

在负责任大国理念的指导下，中国 2016 年提出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并承诺之后 5 年提供 3 亿美元资金，成为澜湄合作最大的资金投入国。截至 2020 年 3 月，该基金已累计支持湄公河 5 国提出的 410 多个接地气、惠民生的项目。^① 三是早期收获项目成效明显。首次领导人会议确定的 45 个早期收获项目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效后，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又确定了《澜湄合作第二批项目清单》，目前已经与缅甸签署了第三批项目合作协议。

在澜湄合作中，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具有相同的发展目标。中国作为大国，负有更大责任，尤其是承担着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然而，仅中国承担责任是不够的，需要在澜湄合作进程中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有其他五国承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将澜湄合作的发展目标转化为其国内发展的战略与具体行动，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合作目标，并使合作行稳致远。

（三）基于“澜湄认同”之上的澜湄地区规范构建是合作的精神动力

遵守国际规范的过程被很多学者称为“规范的内化”。芬尼莫尔 (Martha Finnemore) 和斯金克 (Kathryn Sikkink) 认为，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包括规范兴起、规范普及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② 温特 (Alexander Wendt) 认为，规范的内化有强迫、利己、合法性三种程度。^③ 澜湄合作规范构建追求的是第三种程度的规范，即合法性层面规范的内化。其最终落脚点还在于如何提供一套不同于该地区现有合作机制的治理理念和运行模式，这套理念和模式是以实现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在澜湄合作中，要在湄公河国家对澜湄合作表示认可的基础上，共同塑造澜湄地区规范。共同体需要有共同的行为规范，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也是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共同设计、制定和遵守地区规范的过程。目前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已经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三亚宣言》《金边宣言》《万象宣言》《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与澜湄合作专项基金、疫情下中方设立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等，为构

① 《中缅举行 2020 年澜湄合作专项基金 缅方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人民网，2020 年 3 月 24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324/c1002-31646097.html>。

②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95-896.

③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8 页。

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此外，澜湄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中国理念转变为国际规范的试验田。

三、增强澜湄合作发展动力的制约因素

在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澜湄合作机制从快速拓展期进入全面发展期。随着合作的全面发展，该机制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增强澜湄合作发展动力还面临诸多制约。

（一）澜湄合作中的利益分歧

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更注重澜湄共同利益的构建，但湄公河国家更注重自身利益。具体而言，澜湄合作中的利益分歧不仅包括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的利益分歧，也包括澜湄六国间的利益分歧。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的利益分歧主要在于收益多寡。湄公河五国担忧中国的崛起使其拥有了相对于湄公河下游国家更大的权力，进而担心中国可能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不对称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从而损害下游国家的利益。^①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垄断”（benefit monopoly）。^②目前澜湄六国间的利益分歧主要表现为由澜湄流域水资源开发所引发的四大主要矛盾，中国在上游的水电开发计划引起湄公河国家的焦虑，泰国计划实施的大型干流引水项目引发越南和柬埔寨的不安，老挝实施的湄公河干流开发计划引起越南和柬埔寨的强烈反对，越南和柬埔寨兴建系列水电站引发彼此之间关于水电开发跨境影响的争端。^③

此外，与澜湄区域利益攸关的主要行为体的干扰也是扩大澜湄国家共同利益的一大制约因素。澜湄合作作为湄公河地区机制的后来者，对当地已有制度安排构成潜在挑战。中国在该地区创建澜湄合作机制的行为引起了该地区已有制度安排利益攸关方的担忧，进而引发相应的政治反应。自 2000 年

① Heejin Han, “China, An Upstream Hegemon: A Destabilizer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Mekong River?” *Pacific Focus*, Vol. 32, No. 1, 2017, p. 36.

② Seung-ho Lee, “Benefit Sharing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p. 143.

③ 屠酥、胡德坤：《澜湄水资源合作：矛盾与解决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54 页。

以来，在湄公河地区已发起了至少 13 项单独的次区域合作倡议。^① 这些机制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湄公河国家的多层次地区合作需要，也反映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成为湄公河国家除澜湄合作以外的备选合作机制。

（二）“中国责任”与“他方期待”不对称加剧湄公河国家的对华疑虑

他者定义的国际责任与自我定义的国际责任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② 中国对责任的认知与湄公河国家对中国的角色预期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国责任”与“他方期待”的不对称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湄公河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使“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相互交织。目前中国参与国际事物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即使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但还是引发了外界的猜疑和担忧，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将各方利益汇集在一起，但中国却被指称可能会“占据”许多有利节点，进而强化对其他参与方的“控制”。^③ 这些言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时常出现，实际上在澜湄合作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声音。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部分湄公河国家对澜湄合作的疑虑，即怀疑合作可能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附带产物。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方面缺乏透明度和约束力。^④ 甚至认为中国试图在澜湄地区建立“水霸权”（Hydro-hegemony）。^⑤ “水霸权”是指通过掠夺、整合和遏制等方式实现对水资源的控制，形成“流域霸权”，它是通过一系列策略和战术（如胁迫/压力、条约、知识构建等）来执行的，而这些战术是在脆弱的国际制度下利用现有的权力不对称实现的。^⑥ 从结构上看，中国压倒性的经济和军

① Thomas Parks, et al., “ASEAN as the Architec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sia Foundation*, September 2018, p. 45.

② 印言蹊：《论当今世界中国的国际责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6期，第150页。

③ 徐秀军：《“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理论命题》，第16—17页。

④ Sebastian Biba, “China’s ‘Old’ and ‘New’ Mekong River Politics: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Benefit-sharing Perspective,” p. 637.

⑤ Poowin Bunyavejchewin,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 Viewed in Light of the Potential Regional Leader Theory,” pp. 49-64; Vannarith Chheang,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A Cambodian Perspective,” *ISEAS Perspective*, November 7, 2018, p. 5; and Heejin Han, “China, An Upstream Hegemon: A Destabilizer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Mekong River?” pp. 30-55.

⑥ Mark Zeitouna and Jeroen Warner, “Hydro-hegemony—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Water Policy*, Vol. 8, No. 5, 2006, p. 435.

事实力在弱小邻国中引发了战略焦虑，湄公河下游国家认为，这一地区可能成为中国扩大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跳板。^① 澜湄合作经常被解读为中国对湄公河地区现行机制的挑战，甚至是替代机制。^② 由于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存在落差，相关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逐渐增加。

（三）认知差异及对规范塑造不足使构建合作规范的进程缓慢

在对澜湄合作的认知问题上，由于湄公河国家对中国的认同程度有待提高，使得不同国家对澜湄合作有不同认知。虽然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表示支持中国主导的澜湄合作，柬埔寨和老挝的态度相对积极，但缅甸、泰国和越南的态度则相对谨慎。相关国家认为澜湄合作可能会使现有的地区机制边缘化，如湄公河委员会（MRC）、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和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ACMECS）。中国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集中进入后，在东道国也引发了公共关系等问题，加剧了湄公河国家的担忧。^③ 相关国家认为，中国通过澜湄等次区域合作进一步提升了政治影响力，可能会影响东盟的团结，给东盟与地区大国的平衡战略带来更多困扰，担心中国或利用澜湄合作在诸如水资源管理等有争议的跨界问题上提升自己的话语权。有学者认为，澜湄合作可能给东南亚带来多方面影响。^④

国际机制与国际规范的紧密关系意味着澜湄合作地区规范构建也必须紧随其后，但其目前进展缓慢。尽管中国日益成长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框定议题、提出核心概念、议程控制等方面的能力还比较低。^⑤ 中国上述能力不足使澜湄合作规范构建进程缓慢。同时，中国主动塑造新规范必然会触碰在澜湄地区活动的既有大国的敏感神

① Vannarith Chheang,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A Cambodian Perspective," p. 5.

② Shang-su Wu, "The Trouble With the Lancang Mekong Cooperation Forum," *The Diplomat*, December 19,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2/the-trouble-with-the-lancang-mekong-cooperation-forum/>.

③ Vannarith Chheang,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A Cambodian Perspective," *ISEAS Perspective*, November 7, 2018, p. 5.

④ 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影响，分别是巩固中国的势力范围、取代泰国的次区域领导地位和扩大东盟的分歧。参见 Pongphisoot Busbarat, "Grabbing the Forgotten: China's Leadership Consolid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ISEAS Perspective*, February 6, 2018, pp. 5-7.

⑤ 朱立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27页。

经。比如美国主导下的湄公河下游倡议（LMI）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区域融合以减少中国的影响力，为了制衡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美国还于2020年9月宣布启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Mekong-US Partnership），并指责中国“日益威胁湄公河的自然环境 and 经济自治。”^①

四、未来增强澜湄合作发展动力的思考

与日、印、韩、美等国家在湄公河地区建立的机制相比，中国主导的澜湄合作是拥有更多资源和相对高效的合作机制。共同的利益需求、中国承担地区大国责任以及地区合作规范的构建使澜湄合作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就未来发展而言，扩大澜湄国家共同利益、由“中国驱动”向“多国发力”转变、相对稳定的合作规则和制度灵活性将是保持澜湄合作生命力的重要方向。

（一）凝聚和扩大澜湄国家的共同利益，探索构建利益分享机制

坚持“利己”与“利他”的统一，通过扩大共同利益来促进自身利益。“共同发展”是破解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利益挑战”的核心理念。^②在澜湄合作中，要破解中国自身利益与湄公河国家利益间的分歧，根本方法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共同利益，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扩大澜湄国家共同利益可通过培育共同目标和应对共同威胁两方面来实现。培育共同目标能达到以实现小目标逐步带动大目标、以实现大目标超越小分歧的效果。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实现次区域各国共同繁荣是澜湄合作的最终目标，在实现这个最终目标之前，可从双边命运共同体做起，如加快建设依托中缅经济走廊的中缅命运共同体，让各国切实感受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责任。也可从非传统安全入手应对共同威胁，后疫情时代澜湄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就是最好的切入点。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表明，人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共同威胁远远大于国与国之间彼此构成的威胁。^③比如，

① 《湄公河：美国启动伙伴计划会给流域资源之争带来什么》，BBC新闻，2020年9月2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4264192>。

② 张春：《新时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挑战与应对》，《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7期，第4页。

③ 王帆：《论观念差异与国际合作——“合异论”的提出》，《国际观察》2020年第3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中国与湄公河国家面临的共同威胁。目前的澜湄合作面临着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考虑以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为契机，加快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探索构建利益分享机制，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湄公河国家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构建利益分享机制对各方实现利益诉求都是有利的，通过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让中国更有效地应对湄公河地区利益分歧方面的诸多挑战。^① 具体而言，可从两组关系入手。一组关系是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享。根据合作机制中各个国家的不同需求，处理好与各国的利益分享问题，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可考虑进行一定的利益让渡。另一组关系是中国与域外国家的利益共享，这可通过加强地区间合作来实现。不可否认的是，澜湄合作与湄公河地区现存的制度安排存在部分功能重叠的问题。但这并非未来澜湄合作的障碍，反而可以看成是澜湄合作的优势。对新兴的地区制度来说，通过制度联接并借鉴现有多边制度可以降低成本、避免重复。^② 未来澜湄合作要促进地区合作机制间的强强联合，充分发挥机制对接的区域带动性，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地区外的相关利益攸关方探索构建利益分享机制。

（二）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从“中国驱动”转向“多国发力”

强化责任意识，承担与中国实力相匹配的责任和道义，充分发挥中国的领导作用，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为湄公河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这方面，不应满足于仅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更要多贡献“观念产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若在澜湄合作中过于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不利于澜湄合作的未来发展。在当前东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中，由于东盟担心其“中心地位”弱化，因此在该地区出现了“在地区合作进程中拒绝主导性角色”的趋势，例如，由于担心中国对地区进程的主导，东盟拒绝了中国提议的中国—东盟防长会议，而在2010年建立了以东盟为核心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讨

期，第24页。

① 郭延军：《权力流散与利益分享——湄公河水电开发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129页。

② 刘玮：《兼容性制度竞争：双层对冲与地区制度的嵌套设计》，《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第70页。

论地区防务问题。^① 在澜湄合作中同样如此，中国承担过多的责任不仅加重了中国自身的压力，而且中国也无法单独决定湄公河地区的秩序。中国在澜湄合作中展现出过多“主导性”可能会适得其反，加深湄公河国家对中国意图的疑虑和戒备。在此情况下，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相当必要。

湄公河国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有待提升，实现由“中国驱动”向“多国发力”转变。2012年，泰国提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倡议，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此后澜湄合作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完善。^② 但从目前形势看，泰国的作用发挥得并不明显，或者说泰国在澜湄合作中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澜湄合作需要强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责任意识，加快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当然，这个“多国”也可以包括域外国家。从澜湄合作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层面出发，协调与域外大国的关系，沟通减少同质性公共产品供给，更多地提供湄公河国家缺口较大的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公共产品，减少竞争性供给造成的资源浪费。可以考虑与域外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在敏感程度较低、互补性强的领域可考虑与域外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在时机成熟时，甚至可以考虑“扩员”。

（三）培育和强化“澜湄精神”的集体认同，加强合作规范塑造

从长远来看，国际机制竞争实际上是国际规范的竞争。澜湄合作要真正在现有国际机制中脱颖而出，就必须重视规范的构建。未来规范的构建，要以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共同制定地区规则，探索彼此舒适的规范方式。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共同规范澜湄地区秩序需要融入中国智慧和湄公河国家的文化理念，加入更多关于道德、价值观方面的观念，强调各国之间的地位平等，强化相互之间的认同。当然，囿于湄公河五国的实力，中国在澜湄地区规范构建中要承担积极引导、适时提出地区治理理念的责任，引领构建一些必要的规范和原则。另外，对规范的探索，要放在东盟乃至整个东亚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同时规范的构建依然要以尊重东盟规范为大前提。

① 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95—96页。

② 于宏源、汪万发：《澜湄区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挑战与实施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第76页。

在提升澜湄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规则的同时，还要保持制度的灵活性。澜湄合作要建立的，应该是一种兼具规范性和灵活性的规范，这种规范既要受到制度的约束，又要尽可能避免强制性的羁绊。在制度化建设上，要对澜湄合作做更为明确的规划和设计，避免湄公河地区原有机制的缺陷，并防止合作流于形式。可考虑逐步建立稳定可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增强中国行为的可预测性，强化中国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吸引力。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既可以降低成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对中国创建澜湄合作机制意图的担忧，也可最大程度展示中国对澜湄合作承诺的可信性。在灵活性上，可以考虑继续坚持目前以项目建设为基础的发展方向，保持项目弹性，并可以适当让渡一些非战略性利益。

结 论

在中国的军事、经济力量还不足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背景下，中国在制度与规范层面更容易与周边邻国产生共同利益，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①在湄公河地区，澜湄合作要在众多的国际机制中脱颖而出，需要关注更高层面的地区机制的制度设计和集体认同的建设。基于此，本文提出“利益—责任—规范”的分析框架，从利益、责任到规范，是中国在地区层面创设合作机制的基本逻辑和动力。要维持澜湄合作的发展势头，构建澜湄地区的共同规范是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只有不断增强合作动力，才能保持澜湄合作机制的吸引力。就中国而言，增强澜湄合作的动力需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进而增强合作对湄公河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同时，中国不仅要注意与湄公河国家的协调，也要注重与域外利益攸关者的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范，维护地区的稳定、安全。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齐为群、王在亮：《物质、制度、规范综合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80页。

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

——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彭 泉

【内容摘要】 中东欧民粹政党有大量社会底层支持者，农民是最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基础。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东欧民粹支持者与历史上保守势力的支持基础有类似的逻辑。在农业仍为关键产业的中东欧国家，当传统经济受到转型后突如其来的外部经济影响时，既有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受到严峻挑战，在本土保守势力的推动下，竞争力不足的中东欧国家呼吁保护传统经济，反对以西欧为代表的新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腐化、以威权整肃国内腐败、强调历史上的民族荣光、复兴宗教及家庭伦理等。这一思潮被民粹政党用以获取政治权力。在外部经济压力下，农民、城市底层民众、经济民族主义者、保守的政治精英、大文化中心论者共同构成支持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政党的兴起是精英和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中东欧民粹政党自该地区转型后就出现在政治舞台，其影响深度和广度是欧洲其他地区所不及的。有鉴于此，探索一条以民粹主义基础为导向的策略路径，整合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三类实践主体，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积极推进民粹政党或执政党的对华合作，是中国强化和拓展中东欧地区利益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民粹主义 民粹政党 民粹基础 中东欧 中欧关系

【作者简介】 彭泉，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20）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1-0130-23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1007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东欧剧变和制度转轨已 30 多年。反观中东欧“重回欧洲”的历程，当下势头正强劲的民粹主义浪潮是后转型时代新挑战与旧矛盾的反映，“新欧洲”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曲折。民粹主义古已有之，被称为“被人类历史宠坏了的孩子”^①。它认为“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是对立的，民粹动员表达了真实的民意。^②然而，作为民主的反常现象，民粹主义常被民族主义与极端主义者所利用，造成消极甚至灾难性后果。当前民粹主义正席卷欧洲，相较于西欧，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更多、权力更大，如代表中东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ád Group）四国均是民粹政党执政。^③自转型以来，不同于西欧，中东欧民粹政党一向处于政治核心而非边缘。但是学界对中东欧民粹主义的理论研究较少，一些研究将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视为对全球化危机的反应，^④或将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作为政治衰败的后果。^⑤当代中东欧民粹主义还被认为是由经济转型的期望落差导致的，民众未过上曾被许诺的如西欧一样的富足生活，在对欧盟非理性的期待之下引发疑欧主义。^⑥中东欧转型后较弱的制度和法律基础提供了另一种解释，^⑦新媒体、社会动员等形式也促进了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⑧民族矛盾或腐败也是两个重要原因。^⑨投票行为的社会政治学派指出，选民具

① [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3 页。

② Margret Canovan, “Taking Politics to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Ideology of Democracy,” in Yves Meny and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25-44.

③ 维谢格拉德集团成立于 1991 年，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它们是中东欧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四个国家。

④ Klaus von Beyme, *Rightwing Populism: an Element of Neodemocracy*,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9, p. 67.

⑤ Béla Greskov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Budapest: CEU Press, 1998; and Slavoj Ziz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32, No. 3, 2006, p. 553.

⑥ Ana Bojinovic Fenko, Marko Lovec, Jure Pozgan, and Danijel Crncec, “Euro-scepticism as a Functional Pretext for 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the Eurozone, Migration and Ukrainian Crises,” *Teorija in Praksa*, Vol. 56, Special Issue, May, 2019, pp. 392-417.

⑦ Bojan Bugarcic, “Populism,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1, No. 2, 2008, pp. 191-203.

⑧ Grigorij Mesežnikov Olga Gyárfášová, and Daniel Smilov, eds., *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ratislava: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2008, p. 10.

⑨ Erhard Störling, “Soziale Trägergruppen des Nationalismus in Osteuropa,” in Bernd Estel,

有团体身份，通过支持者的基本构成与分布可以理解某个群体的选举偏好。因此，当前的研究虽各有关注点，但都认为中东欧民粹政党的支持者为民粹主义者、受教育水平低的本土人士、社会底层、失业者和宗教信仰徒等，对这类选民的研究已比较充分。农村选民也是中东欧民粹力量的主力，但对他们的研究尚比较缺乏，农民这一重要的民粹主义的基础常被忽视。

一、研究问题：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农民基础

当前西欧民粹主义的出现是由高生产率、高福利、后物质文化转向等现代化阶段的危机导致的，选民基础多为社会中产和城市工人。中东欧民粹政党则多有农民基础、农业根源，农民及底层选民特别支持两类民粹政党。

第一，以涉农问题为核心，兼顾多类保守议题的农民民粹政党，农民选民是选票的直接来源。如拉脱维亚的农民与绿党联盟（Union of Greens and Farmers）一方面维护农民利益，另一面坚持民族主义，反对本国俄罗斯少数民族裔。俄裔群体主要是苏联时期迁居到该国的城市工人，与本土农村居民冲突不断。农业一直是拉脱维亚历届大选中的关键问题。^① 在保加利亚，亚历山大·斯坦博利斯基农民联盟（Agrarian Union Aleksandar Stamboliyski）有较大影响，它是1993年由农业主义政党农民国家联盟（Bulgarian Agrarian People's Union）的激进派组成，并以20世纪初保加利亚的农民民粹首相亚历山大·斯坦博利斯基（Aleksandar Stamboliyski）命名。匈牙利民粹政党独立小农业者党（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Agrarian Workers and Civic Party）在20世纪90年代两度参与组阁。由此可见，农村是这些农业政党的票仓。

第二，拥有底层选民支持的右翼民粹政党，农民是不可或缺的选举资源。例如，在波兰，由于农业政党人民党（Polish People's Party）在2007—2015年执政期间对贫困农民、社会底层关注不足，使农村和城郊选票流入法律与

Tilman Mayer et al. eds., *Das Prinzip Nation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4, pp. 299-322.

① Janis Paiders and Juris Paiders, "Role of Agriculture on Regional Variation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 Results in Latvia," *Research of Rural Development*, Vol. 2, No. 20, 2014, pp. 171-177.

公正党(Law and Justice),2015 年后者得票率为 37.58%,议会席位占 51.09%。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法律与公正党获得 45.3%的选票,70%的农村选民支持该党。^① 2019 年在爱沙尼亚选举中,极右民粹政党保守人民党(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大获全胜,获得 19 个议席并参与组阁。该党吸纳了人民联盟(People's Union)的农村选民,煽动农民抗议,指责政府和欧盟对本国农民的支持不足。^② 此类民粹政党虽未以具体的涉农问题为核心,但保守性政策主张还是得到农民等底层选民的支持。

中东欧农民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他们既是疑欧主义的主力军,也是反腐与呼吁道德重塑的主力军,与底层工人和转型后只有少部分私有财产的本土民众共同反对世界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反对国内腐败和新自由主义价值。^③ 一方面,中东欧许多国家尚处于现代化进程,农村居民的比重较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大;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是议题导向的,农村与社会底层拥趸的出现表明,与农业、农村、农民或者与地权、城市化、经济模式等相关的问题突出。因此,中东欧民粹政党为何有大量的农村选民等底层支持者?其在现代化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均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二、理论框架：历史制度主义与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农民基础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存在有社会历史及政治文化根源,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困境可揭示当前的民粹主义问题。^④ 历史制度主义是解读制度变革问题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分析本文提出的问题。

^① Zosia Wanat, "Poland's Farmers Switch Loyalties to Boost Ruling Party," *Politico*, May 31, 2019,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ands-farmers-switch-loyalties-to-boost-ruling-party-pis-law-and-justice/>.

^② Aldis Austers, *Eurocepticism in the Baltic States: Much Ado about Nothing?* September 2017,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pp. 15-16.

^③ Don Kalb, "Upscaling Illiberalism: Class, Contradi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Populist Right in Post-socialist Central Europe,"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1, No. 3, 2018, pp. 303-321.

^④ 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É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Verso, 1998; and John Higley, Jan Pakulski, and Włodzimierz Wesolowski, eds., *Postcommunist Elites and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一）历史制度主义及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农民基础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认为，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民主制度的建立在于解决农民问题；现代化意味着农民保守思想的彻底变革。^① 在中东欧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始终相伴而生，从而出现了以保守力量为代表的特殊制度。彼得·霍尔（Peter Hall）指出，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② 强调“制度”这种宽泛的正式或非正式程序在政治分析中的核心位置。历史制度主义首先是历史的，政治发展是随时间而发展的过程；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又是制度的，强调实践过程中的主要政治意涵嵌入制度之中。^③ 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时间序列的重要性、政治制度的惯性、政治过程的偶然性、政治制度的继承性。^④ 它认为，政治事件和政治选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影响政治结果和方向。民粹政党兴起是政党制度的表现形式，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制度结果，当前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农民基础可以从历史上的农民民粹主义中找到相似的逻辑。^⑤

中东欧已在一战后、二战后和冷战后经历了三次艰难的转型，农业与农民问题都是关键问题。^⑥ 在中东欧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是酝酿政治与经济保守思潮的地区，农民被视为难以驾驭的群体。^⑦ 近代中东欧民粹主义正是以农民运动和农民政党为代表，这股民粹潮流从19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是在农奴制走向严重危机而本土资本主义又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产生

①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②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5, 1996, pp. 936-957.

③ Paul Pierson,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9, No. 2, 1996, pp. 123-163.

④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31页。

⑤ 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政治行动者的利益界定、关系形成等都是制度的结果，因此制度也包括竞选规则、政党系统结构，甚至民粹政党登台等制度情境的特征。政党制度始终是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的一个中心。参见此书的导言部分：Sven Steinmo,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⑥ [英]罗伯特·拜德勒克斯、伊恩·杰弗里斯：《东欧史》，韩炯、吴浩、柴晨清等译，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67页。

⑦ Tara Zahra, “Imagined Noncommunities: National Indifference as an Analytical Category,” *Slavic Review*, Vol. 69, No. 1, 2010, pp. 93-119.

的。农民民粹主义是以农民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类型，在中东欧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反映了农民和中小生产者对专制农奴制的反抗，也反映了农民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破坏农业经济的负面情绪。^① 最终，有农村基础、农业导向的政党、团体与阶层联合起来，强调利益受损的本土底层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但最终却催生了法西斯主义。“以追寻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对事件和行为进行解释”是历史制度主义最有益的启示，也是本文的理论分析基础。^②

（二）理论框架及基本假设

历史制度主义是宏观的社会学路径，从权力导向的视角关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③ 它通过突出区域的历史制度独特性，展现政治变迁。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政治结果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为进程，注重考察政治背景、关键节点、时间序列、路径依赖等；二是政治互动，即政治主体间的结构关系或排列方式。科学理论由清晰的因果机制、可证伪的假设、通过推论解释的一系列经验现象组成。^④ 本文的理论与具体假设如下。

第一，过程分析：民粹主义的农民基础是外部经济侵入传统经济的后果。摩尔指出，“在商业关系已经开始削弱农民经济的地方，社会中的一些因素就会大肆歌颂农民，称其为社会脊梁”“呼吁彻底的道德复兴”“提倡一种在过去被证实有生命力的生活方式”。^⑤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上的保守、排外源自新经济力量威胁，反对商人、资本家、进入本国市场的外部力量等。经济民族主义还体现在政治与文化上，反对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拒绝博爱与自由，反对多元主义，推崇宗教虔诚、家庭观念、传统艺术与民间习俗等。经济受损者会通过文化与道德复兴，用理想的过去批判当下现实，并在政治上批判大众民主制度，认可旧的制度和专权，推崇顺从和等级。因此，外来经济对传统经济的破坏是导致反动思潮出现的诱因。当代民粹主义在一

① 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6—108 页。

②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1983, pp. 734-749.

③ Ellen M.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Vol. 26, No. 1, 1996, pp. 5-34.

④ William R. Freudenburg, and Rort Gramling, “How Crude: Advocacy Coalitions, Offshore Oil, and the Self-negating Belief,” *Policy Sciences*, Vol. 35, No. 1, 2002, pp. 17-41.

⑤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第 500—526 页。

一定程度上泛化，一是民粹主义动员范围的跨国性，^①二是民粹政党的社会基础扩展，^②三是农民支持的民粹政党出现议题泛化。农民民粹主义不再只是政党标签，而指向所有利益受损者群体。在外来经济影响下，中东欧国家的农业等传统经济均十分脆弱，民粹政党为民间利益受损者提供了宣泄不满的渠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变得更为保守。因此，在转型后的部分中东欧国家在面临外部经济压力和传统经济受到威胁与损害时，农民等社会底层群体就坚持排外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产生保守的政治与文化诉求。

第二，结构分析：中东欧民粹主义是由上流精英与底层大众共同促成。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指出，理解当代农民民粹主义，要走出阶层纯粹主义的安全区。^③阶层之间既存在对立，也存在合作。如法国的底层农民和城市平民对自由经济改革带来的物价上涨不满，农业商品化的失败促成大革命中农民与资本家的合流。在德国，利益受损的农民则与法西斯主义走到一起。在中东欧，由于缺乏成熟的本土资产阶级，历史上不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此数量庞大的农民、农民政党和农民运动承担了推动现代化的角色。^④一方面，他们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一面，他们又阻碍了社会进步。格里特·汇泽尔（Gerrit Huizer）指出，农民的保守性决定了其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反动的帮凶。^⑤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在工业资本难以发挥作用的地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更明显，保守思潮更强烈，这为受到经济冲击的精英利用非理性、反唯物主义、反资产阶级的观念操纵民众创造了条件。虽然文化与政治上的保守为掌权者提供了维持统治的高压秩序，但在民间总会得到响应。当前，中东欧地区以农民为基础的民粹政党常出现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保守主义上

① Saturnino M. Borras Jr. and Jennifer C. Franco, "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s Struggling for Land and Citizenship Rights," *IDS Working Paper*, No. 323, 2009, pp. 1-44.

② Saturnino M. Borras Jr., "Agrarian Social Movements: The Absurdly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Agenda of Defeating Right-wing Populism and Exploring a Socialist Future,"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20, No. 1, 2020, pp. 1-34.

③ Henry Bernstein, "The 'Peasant Problem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1905-1929,'"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45, No. 5-6, 2018, pp. 1127-1150.

④ David Mitrany, "Communism and the Peasants," *Annal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76, 1951, pp. 99-104.

⑤ Gerrit Huizer, "How Peasants Become Revolutionaries: Some Case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6, No. 3, 1975, pp. 27-56.

层能够轻而易举地煽动底层民众从而获得支持。因此，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出现是利益受损的保守主义上层与底层民众共同推动的结果。由此可见，底层民众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诉求被同样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上层精英利用，其通过各种策略获得农村及底层选民的支持，从而推动了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这是精英与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

综上所述，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已有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结合民粹政党兴起的“供需机制”，即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反建制需求，民粹政党通过策略或话语提供民粹纲领，迎合民意，以此在选举中获得选民支持，^① 当前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农民等底层基础可用图 1 的框架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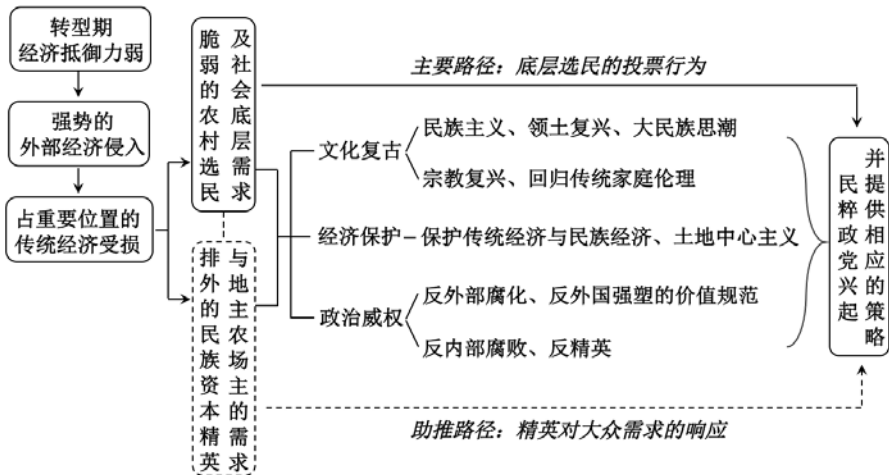


图 1 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农民基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实证分析：外部经济对中东欧的冲击及民粹主义基础

西方现代化理论被批判为单线程（uni-linearity）及目的论（teleology），

^① Roger Eatwell, “Ten Theorie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Peter H. Merkel and Leonard Weinberg, eds.,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2003, pp. 45-70.

忽视传统的社会关系基础和社会历史制度，拒绝发展的多样性。^①中东欧国家在一些转型方面由于不适应地区发展状况出现很多问题。

（一）外部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冲击及社会经济领域的需求

中东欧国家进入转型期后，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业自由化是向现代化迈出的最激进的一步，包括价格自由化、土地私有化、农业生产与供给私有化、农业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制度自由化等。农业自由化不仅要求将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归还原所有者，或转让给私人，而且要求农业参与一体化竞争，并为外部企业进入本地市场提供便利等。^② 本文认为，转型与外部经济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外部资本、外部市场、外部投机和外部竞争等四个困境，导致农业、土地与本土经济问题，由此引发保护民族经济的呼声。^③

第一，外国资本选择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地区，拉大了城乡差距。在全球农业人口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东欧地区农业人口依然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以罗马尼亚为例，农村74%的人口以耕种为生，全国46%的人口是农民。^④ 在中东欧国家，农业贡献了其GDP及就业人口的1/5到1/6，这一比例在欧盟其他国家只有2%—3%。^⑤ 中东欧国家农业地区的失业也十分严重，贫困人口增加。在一些国家，由于城市的高失业率，甚至还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回流，加重了农业部门的负担。在农村人口密度较高的情况下，农村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并未跟上。中东欧有限的资源都流向大城市，外国投资多集中于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农村被忽视。^⑥ 随着转型后农业私有化比例的

① Paul Blokker, "Post-Communist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Studies, and Diversity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8, No. 4, 2005, pp. 503-525.

② Johan F. M. Swinn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Reform Choic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Vol. 7, No. 3, 1999, pp. 637-664.

③ 需要说明的是，在学者的学术研究、中东欧的媒体报道和中东欧国家领导者的政治表述中，转型领域的“外部（external）”或“外国（foreign）”特别指向经济联系密切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参见夏海斌：《中东欧国家转型：外部约束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④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https://ec.europa.eu>；贸易经济数据库，<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⑤ Jeroen Klom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Liberal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od Policy*, Vol. 49, 2014, pp. 332-346.

⑥ Sabine Baum and Peter Weingarten, "Developments of Rural Econom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Overview," *Rural Areas and Development, European Rural Development Network*, Vol. 2, 2004, pp. 1-23.

提升,大部分拥有土地的个人都不具备专业种植能力,只好将土地出租或荒废,土地使用情况不理想。在匈牙利,转型的最初十年,私人土地的占比从14%增长到54%,而国有比例从60%下降到11%。^①当前,匈牙利90%的农村土地为私有,但土地使用情况堪忧,种植面积从转型之初的25万公顷降到20万公顷以下。^②另外,农业回报率低,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农村人口占比较高,外国资本更愿意投资城市和服务业,这些因素均拉大了城乡差距。

第二,外部市场吸引力更大,人口流失严重,农业竞争力不足。市场化与一体化使劳动力能够走出国门,在收入更高的欧盟成员国就业。2007—2018年,除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外的中东欧国家都出现了人口向西欧和北欧快速流动的情况。维谢格拉德四国过去30年间人口减少约1000万,成为全球人口下降最快的地区,造成劳动力结构失衡。^③由于担心经济崩溃,中东欧国家对人口外流的担忧甚至高于对外来移民的担忧,罗马尼亚近60%的民众担心人口外流,而不足10%的民众担心外来移民;匈牙利近40%的民众担心人口外流,而担心外来移民的民众不足20%。^④在外流人口中,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农村青壮年,后者主要流向德、法等国家,而使本国的农业竞争力下降。留在本国的只有老年人、农民和低学历年轻人,他们的收入水平只有西欧国家的1/4。^⑤同时,在西方享乐主义的腐化下,年轻人对教育不再感兴趣,中东欧国家文盲的比例有所增加。^⑥教育水平的下降导致民众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煽动,民粹政党能够获得大量选

① Jerzy Banski, "Agriculture of Central Europe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ontemporary Changes of Agriculture in East-Central Europe*, Vol. 15, 2008, pp. 7-20.

② Sabine Baum and Peter Weingarten, "Developments of Rural Econom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Overview."

③ "Central Europe's Population Expected to Shrink by Nearly 10 Million in 30 Years," Kafkadesk, September 3, 2018, <https://kafkadesk.org/2018/09/03/central-europes-population-expected-to-shrink-by-nearly-10-million-in-30-years/>.

④ Kafkadesk, "Central Europe's Biggest Headache? Emigration, not Immigration," Kafkadesk, April 4, 2019, <https://kafkadesk.org/2019/04/04/central-europes-biggest-headache-emigration-not-immigration/>.

⑤ Benjamin Elsner, "Emigration and Wages: the EU Enlargement Experi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91, No. 1, 2013, pp. 154-163.

⑥ 马细谱、李少捷:《中东欧转轨25年:观察与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票。^① 因此，大量的农民、老年人、底层工人、低学历者成为民粹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

第三，外商获准购买土地，引发巨大冲突。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之初都只允许本国公民购买土地，但是随着它们加入欧盟，中东欧国家成为西欧地产商的投机和炒作之地。例如，1992年波兰1公顷土地的价格是298欧元，2016年达到9169欧元。^②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东欧各国逐渐放开外商投资土地的政策，外商进入中东欧引起本地农民和保守者的不满。土地被视为本土与外来、民间与执政者之间冲突的核心，这也引发转型后一波较大规模的疑欧思潮。^③ 另外，外商哄抬地价，物价也随之疯涨，而民众收入水平较低，使现代化和城市化受到打击。同时，在中东欧国家，土地象征着群体祖先及共有神话的渊源，有助于强化群体认同。因此，个体劳动者、家庭及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匈牙利人所言，通过向外商出售土地获得财富是对民族感情的严重伤害。^④

第四，外部竞争加剧背景下的中东欧农业商品化与负债。在与西欧农业集团的经济竞争中，中东欧国家以小农为主的农业商品化困难重重。一方面是技术、生产效率和小农生产模式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制度安排的原因。农民本就对转型期的自由贸易、物价改革和取消农业补贴持反对态度。转型后中东欧本土保守主义政党对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也颇有微词，认为旨在通过欧盟内部协调、自由流通、免征关税以保证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的政策损害了本土农业，使本国农民在竞争中利益受损。有数据表明，欧盟80%的农业补贴只覆盖20%的农场，且几乎都是西欧的大型农业集团，中东欧国家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农业获得的地区补贴有限，因此丧失了竞争力。^⑤ 在保加利

① Joshua K. Dubrow, "Interview with Piotr Zagorski on Education and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Inequality*, January 31, 2009, <https://politicalinequality.org/2019/01/31/interview-with-piotr-zagorski-on-education-and-support-for-right-wing-populist-parties-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

② Jerzy Banski, "Phas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entral Europe-Selected Process and their Result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64, No. 12, 2018, pp. 546-553.

③ Katherine Verdery, "Transnationalism,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Property: Eastern Europe since 1989,"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5, No. 2, 1996, pp. 291-306.

④ Martha Lampland, *The Object of Labor: Commodification in Socialist Hunga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⑤ "1.6 Million Farmers Receive Almost 85 Percent of the EU's Agricultural Subsidies,"

亚，93%的农民是缺乏竞争力的小农，人口达 34 万之多，七成农民每年的产值不足 2 000 欧元。^① 面对西欧的竞争，中东欧国家的小农负债严重，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这些个体家庭农户和中小农企较多的国家，这一问题尤为严重。自 2008 年以来，中东欧国家的农民要求保护本土经济、拒绝单一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罗马尼亚甚至强制要求超市 51% 的进货都必须来自本国供应商，与欧盟大唱反调。

面对上述问题，中东欧国家的农民提出了限制外商购买土地、打造强势民族经济、吸引本国人留在国内等要求，还通过民间的农民院外集团向欧盟施压，消极对待单一市场。一方面，本国资本和本土经济脆弱，抵御外部经济的力量不足，从而激发保护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土地私有化不仅表明土地归个人，而且回归“集体自我”，土地和农业被视为民族根基。

（二）外部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冲击及政治文化上的需求

苏联时期的历史遗产与特异性在中东欧民粹主义者的意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土地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学，教权主义（clericalism）与民族一统（irredentism）等。^② 受到政治威权主义、领土修正主义的影响，中东欧民粹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对多元自由主义，二是保守主义。当传统经济受到破坏，政治保守、民族宗教、文化复古等为民粹政党提供了机会。

第一，反对外部腐化及多元自由主义。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更崇尚大民族主义、男权主义、尊崇父权，在受到外部市场力量影响的情况下，威权有助于稳定政治的等级秩序，防止自由交易的腐蚀。^③ 当西欧、北欧、南欧的民粹政党已将性别平等、环境保护、言论自由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甚至亲

European Data Journalism Network, May 24, 2019, <https://www.europeandatajournalism.eu/eng/News/Data-news/1.6-million-farmers-receive-almost-85-percent-of-the-EU-s-agricultural-subsidies>.

① Tzvetina Borisova Sofia, “Small Farming in South East Europe at a Crossroads,” *Osservatorio Balcani e Caucaso Transeuropa*, November 19, 2013, <https://www.balcanicaucaso.org/eng/Areas/Balkans/Small-farming-in-South-East-Europe-at-a-crossroads-144134>.

② Andrea L. P. Pirr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fferent Context and Issues of the Prophets of the Patri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9, No. 4, 2014, pp. 99-628.

③ Max Gluckman, *The Ideas in Barotse Jurisprud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犹太主义的主张内化，中东欧民粹政党仍将自由和法治视为敌人。^①以农民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能够解释为什么中东欧国家长期反对女性权利和犹太人等行为。^②当中东欧国家的传统经济结构受损，呼吁政治权威、反抗多元主义价值的声音不绝于耳。当代实践表明，当无法应对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就会退化，甚至出现反欧盟的价值观，并逐步减少对欧盟的承诺与责任。欧盟作为一个规范性力量，价值观是其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首选手段，当成员国出现“去欧洲化”的倾向，也会迅速反映在价值观上。

第二，反对内部腐败，回归良好的乡土道德。中东欧国家腐败严重、顽固保守。当外来资本进入本国传统经济，特别是以腐败等形式造成社会失衡与福利受损，公众就要求打击腐败，呼吁道德回归。外部资本进入中东欧国家常利用腐败这一所谓“商场的潜规则”，破坏社会良序。^③农民、工人阶层及受挫的本土小资产者是反腐的基础。从捷克“不满公民行动党（ANO 2011）”等主张反腐的民粹政党的崛起之路都能看出这一特点。此外，中东欧国家的腐败也是经济私有化和外部经济介入的后果。在转型初期，推动私有化的政客凭借特权进行寻租，在经济通胀中积累财富，获得参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土地私有化的特权。他们利用权力禁止竞争、干预司法，影响市场改革和民主发展。转型不佳导致的腐败问题普遍存在，成为各国面临的难题，反腐败推动民粹政党的上台。^④一些民众甚至怀念转型前的生活，要求通过政治反腐肃清与外国资本沆瀣一气的政客，回归良好的传统道德。

第三，民族主义。领土与主权争议是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的助燃剂。作为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回应，当跨国经济冲击传统经济，因利益受损而形成

① Rogers Brubaker,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ivilizationalism: the European Populist Mo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0, No. 8, 2017, pp. 1191-1226.

② Renata Salecl, "Nationalism, Anti-Semit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Area Studies*, Vol. 1, No. 3, 1993, pp. 78-90.

③ Ina Kubbe, "Europe's 'Democratic Cultur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70, No. 2, 2018, pp. 217-240; and Martin Paldam, "The Cross-Country Pattern of Corruption: Economics, Culture and the Seesaw Dynam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8, No. 2, 2002, pp. 215-240.

④ Noemi Pena Miguel, Beatriz Cuadrado-Ballesteros, "Is Privatization Related Corru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uropean Countrie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Vol. 21, No. 1, 2018, pp. 69-95.

的经济民族主义要求重塑经济尊严，加之土地私有化之后人们的土地财产意识强化，“通过民族一致化实现现代化”的尝试呼之欲出，民族主义成为“回归过去某个臆想国度传统价值”的承诺。^①在中东欧地区，领土纠纷也时有发生，民族主义与领土主权密不可分。有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中东欧国家民众视本国文化至高无上，在现代化转型更艰巨的巴尔干地区，这一比例高达七成。^②在转型期，中东欧国家的传统经济结构被破坏，私有财产意识增强，既有的民族纠纷被放大。农村居民受到的影响更大，对民族主义的需求也更迫切。例如，拉脱维亚试图通过统一语言联合三个民族区域，使国家特别是主体民族占多数的农村地区具备经济抵抗力，对外国经济甚至俄裔、德裔等强势的少数民族经济削弱本土和主体民族经济予以回应。

第四，宗教复兴。与西欧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对基督教遗产更为热衷。宗教对于引导民众价值和管理民众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化转型后，面对外部经济介入与自由主义竞争，小农主义等有较高人文关怀的思潮受到欢迎，民众通过宗教复兴获得安全感，而将个体聚集到一个道德共同体中势必坚守传统家庭结构。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对上帝、祖先、家庭的认可度极高，对女性堕胎、同性恋婚姻等与传统家庭伦理相悖的行为支持度很低。相比于西欧的教团制（congregational），中东欧的教阶制（hierarchical）使人们痴迷于宗教权力。^③在教阶制国家，对现状不满的挑战要少于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教团制国家。^④这不仅使天主教、东正教国家的腐败程度更高，^⑤还将外部力量和自由多元视作对本土道德权威和家庭伦理的冒犯，并通过政治形式予以排斥。在中东欧国家，宗教集团与政治集团的成员具有一致性，宗

^① Michael Ley, “Historische und theoretische Überlegungen zum Nationalismus,” in Michael Ley and Ernst Gehmacher, eds., *Das Ende des Nationalismus*, Vienna: WUV, 1996, pp. 9-44.

^② Pasty McGarry, “Stark East/West European Differences on Attitudes, Religion and Identity,” *Irish Times*, October 30, 2018,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social-affairs/religion-and-beliefs/stark-east-west-european-differences-on-attitudes-religion-and-identity-1.3680854>.

^③ Sabrina P. Ramet,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East-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

^④ Axel Dreher, Christos Kotsogiannis, and Steve McCorriston, “Corruption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Mode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5, No. 3, 2007, pp. 443-466.

^⑤ Ina Kubbe, “Europe’s ‘Democratic Cultur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教是社会整合因素。农民在经济上受挫后倾向于从宗教与家庭中寻求慰藉，建立安全范围。

当传统经济受损，在小农意识占主导的一些中东欧国家就会在政治与文化上倾向于保守，对外排斥新自由价值、对内打击腐败并重塑社会道德、通过民族一致化抵御外部压力、并从宗教复兴中获取来自传统伦理的安全感。在中东欧地区，保护农业和农民使民粹政党获得了支持。而且民粹主义是利益受损的保守上层与底层民众共同导致的结果，因此保护传统经济既满足了民众的要求，又迎合了本国的保守派。

（三）案例分析：转型后波兰民粹主义基础的形成

2008年以前，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掩盖了外部经济对本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伤害，近十年来中东欧国家经济的衰退使外部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如人口外流加剧、本国资本弱小无力、外国资本囤积土地，“新圈地运动”使农业生产萎缩、物价飞涨等。于是，民粹政党利用农民等社会底层的不满，多围绕农业和土地问题制定政策，以回应民众需求。

在波兰，因经济遭受外来资本冲击而兴起的农民民粹主义思潮非常明显。根据2017年的数据，在150万户家庭小农场中，有70%耕种面积不足9公顷，竞争力不足。同时，波兰有4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城市化水平低，有12%的人口参与农业生产。另外，波兰有14.7%的农民不到35岁，而欧盟范围内不到35岁的农民只有7.5%；64岁以上的波兰农民只有8.4%，而整个欧盟农民中有三成都在64岁以上。这说明波兰的大量年轻劳动力聚集在农业部门，但这一庞大的农村人口仅贡献了3.5%的GDP。^① 这些收入较低、教育水平不高的农村居民在经济受损时成为疑欧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拥趸。面对窘境，波兰农民组织“团结农民联盟”向政府请愿，称农村土地是波兰的领土，不能卖给外国人。^② 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在执政后出台《农

^① Denene Erasmus, "Farming in Poland, Europe's Growth Engine," *Farmer's Weekly*, January 9, 2017, <https://www.farmersweekly.co.za/crops/field-crops/farming-in-poland-europes-growth-engine/>.

^② Philip Case, "Farmers in Poland Blockade Roads over Land Grabbing," *Farmer's Weekly*, February 6, 2015, <https://www.fwi.co.uk/international-agriculture/farmers-poland-blockade-roads-land-grabbing>.

业用地转让法》，限制外国资本，援助受到冲击的本国家庭农业，以回应民众呼声。^① 该党还放松个体小农销售加工食品的卫生限制、加强对转基因作物的限制，限制外国农业技术公司，保护本国农民，与欧盟的政策针锋相对。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宣称，“我非常骄傲我们党是波兰农村的政党，我们期望波兰的城市和乡村能发展到同一水平，最终缩小差距……感谢农民对我们的支持……在欧盟必须要为波兰的利益而奋斗，首先是波兰农村的利益……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欧洲给予的东西是符合波兰需求的。投票支持我们吧，代表波兰农村的政党！”^② 然而随着波兰执政党对单一市场和欧洲价值观的排斥，西欧国家正商讨在共同农业政策 2021—2027 预算案中削减波兰大约 15% 的预算。这将导致波兰的疑欧主义进一步发展。此外，法律与公正党等民粹政党往往也得到国有企业和农场主的支持。保护国有农业、能源、交通、工矿等企业或提升国企在国内经济的比重的主张，既能迎合底层民众的经济民族主义呼声，也满足了保守派精英的需求。例如，法律与公正党强化了国家对波兰能源集团（PGE）等国有能源企业的扶持，取消了外资在电力和供暖等领域的权利，以违背欧盟意志的方式确保民族经济的发展。卡钦斯基称波兰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入侵，其窃取了波兰人的真理、爱情、生活、婚姻家庭等价值观以及以福音和十诫为基础的道德观。他指出性别运动是外来的，威胁波兰人的身份、民族和国家。^③

波兰的案例反映了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支持民粹政党的逻辑，也展现了民粹政党借题发挥的政策供给。中东欧国家民粹政党的保守政策迎合了农民、城市底层等在受到外来经济的冲击后产生的保护性诉求，也得到大地主、经济民族主义者、国有企业、保守政治精英和文化复古主义者的支持。在精英与大众的共同推动下，民粹主义兴起并持续发展。

① Polish Helsinki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Foreign Buyers Snubbed by Proposed Polish Farmland Act,” *Liberties*, April 29, 2016, <https://www.liberties.eu/en/news/agricultural-land-conveyances-act-limits-foreigners-in-poland/7994>.

② Shakhil Shah, “Poland Offers Farmers Handouts for Pigs and Cows,” *Emerging Europe*, April 8, 2019, <https://emerging-europe.com/news/poland-offers-farmers-handouts-for-pigs-and-cows/>.

③ Vanessa Gera, “Party Leader Calls LGBT Rights an Imported Threat to Poland,” ABC News, April 26, 2019,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polish-leader-lgbt-rights-import-threatens-nation-62617985>.

四、政策分析：中东欧民粹主义浪潮下的欧盟角色与中国对策

在中东欧国家以农民为基础的民粹主义形成过程中，欧盟作为外部影响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面对中东欧国家民粹政党掌握更大权力的现实，中国势必要采取新的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降低民粹主义政治可能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消极影响。要应对这些问题，民粹政党的底层社会基础是一个重要突破口。

（一）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者视野中的欧盟角色

第一，西欧和北欧经济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渠道。西欧、北欧等欧盟富国通过东扩，将中东欧国家农业优势相对明显的地区纳入其经济版图，既能为发达的老成员国提供优质、低廉的农产品、廉价的劳动力、有潜力的市场，又能保障食品供应安全，还能通过投资实现更大回报。^① 实践表明，西欧和北欧确实得以获益，但强势且无序的资本进入中东欧打乱了地区经济秩序。仅以农业补贴为例，借助欧盟的农业补贴，西欧资本强国既可与中东欧经济伙伴建立紧密的利益关系，又可以自己的经济偏好影响中东欧农业布局与农民利益。欧盟每年向成员国提供 650 亿欧元的农业补贴，既是欧盟最大的支出项目，也是全球最大的补贴项目。西欧的跨国公司和中东欧的大型农业企业都希望获得较多的农业补贴，通过贿赂等手段获得巨额补贴，被称为“农业黑手党”（agricultural mafia）或“窃贼经济”（thief economy），导致真正需要补贴的农民未获任何好处。^② 另外，欧盟通过对制造生物柴油的油菜籽提高补贴额度，促使捷克等国的农民和农业企业疯狂种植油菜籽，不仅导致土地贫瘠，而且使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补贴，竞争力受到削弱。

第二，“敌人意象”的集中体现。一是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犹豫中有期待

^① Derek Baker, "Agriculture in the EU's Eastern Enlargement: the Current Status for CEECs," *Intereconomics*, Vol. 38, No. 1, 2003, pp. 19-30.

^② Selam Gebrekidan, Matt Apuzzo, and Benjamin Novak, "The Money Farmers: How Oligarchs and Populists Milk the E.U. for Millions," *Homeland Security News Wire*, November 5, 2019, <http://www.homelandsecuritynewswire.com/dr20191105-the-money-farmers-how-oligarchs-and-populists-milk-the-e-u-for-millions>.

的复杂心态。转型后的中东欧国家曾对加入欧盟实现经济腾飞态度积极，69%的保加利亚人认为加入欧盟能解决其经济问题，其中88%的人对吸引外资保持乐观。^① 随着各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和中小企业受到冲击，政治极化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底层出现，在过高期待与现实不满中，欧盟成为民族经济的敌人。甚至在2004年首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就不完全是坚定的“共同体信徒”，人们担心经济主权受到欧盟控制，从而牺牲本国利益，成为附庸。^② 二是在观念领域，在欧盟的价值规范中，西欧和北欧已转向后物质主义，更关心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甚至对跨国难民的人道主义等非物质领域，是经济高度发达的体现。^③ 以西欧国家为首的欧盟强加给现代化程度不高的中东欧国家一套后现代主义价值，造成观念冲突，这是中东欧国家农民和社会底层民众难以接受的，由此欧盟成为民族尊严的敌人。

第三，经济依赖之下持续的民粹主义。在西欧和中东欧精英的推动下，中东欧国家经济对欧盟已高度依赖，其依赖程度高于欧洲其他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④ 例如，斯洛伐克有4/5的贸易额来自域内经济伙伴。^⑤ 中东欧国家的民粹政党即使对欧盟颇有微词，但在利益面前也只能保持沉默。由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东欧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一体化成为避免一些中东欧国家走向失败的屏障。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FCFR）的相关统计，中东欧国家民众比西欧国家民众更认可欧盟身份，60%的匈牙利人认为民族身份和欧盟身份一样重要，只有10%的人不认同；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对欧盟的身份认同也高于50%，不认同者不足两成。^⑥

① Anna Dimitrova, "Public Opinion in Bulgaria with Regard to the EU Memb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L'Europe en Formation*, Vol. 2, No. 364, 2012, pp. 289-304.

② Paul Taggart and Aleks Szczerbiak, "Contemporary Euroscepticism in the Party System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ndidate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3, No. 1, 2004, pp. 1-27.

③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4-325.

④ Johann P. Arnason, "Designs and Destinies: Making Sense of Post-Communism," *Thesis Eleven*, Vol. 63, 2000, pp. 89-97.

⑤ "Intra- EU Trade in Goods," Eurostat, September 10, 2020,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Intra-EU_trade_in_goods_-_main_features&oldid=452727.

⑥ Ivan Krastev, Mark Leonard, and Susi Dennison, "What Europeans Really Want: Five Myths Debunked,"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019, https://www.ecfr.eu/specials/what_europeans_really_want_five_myths_debunked.

但是中东欧的疑欧主义却较普遍，主流政党往往“软疑欧”，边缘政党“硬疑欧”。这些国家对欧盟的若即若离是为了通过欧盟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让富国为危机买单，即所谓的“危机—欧盟实用主义”。^① 只要不与欧盟彻底决裂，欧盟就始终是中东欧国家民粹政党借题发挥、宣泄不满的对象。

（二）民粹主义浪潮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截至 2020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已举行八次，中东欧国家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支点。但是无论“17+1”合作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目前主推的政府间合作对中东欧国家民间需求的关注尚显不足，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战略目标并不全面，亟须更新目标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部署。基于前文的分析，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社会底层应对经济威胁和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差，但他们是占区域主导的民粹政党的重要选民基础。在未来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中国应以中东欧国家社会底层作为政策重点，这有助于在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下形成对华友好的社会力量，从而对所在国的民粹—民族主义政党/政府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

第一，在政府层面，行政主管部门可提升合作机制的灵活性，充分协调伙伴国，对突发问题和应对之策作出合理评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虽然级别很高、领域丰富，但灵活性需要大幅度提升。^② 首先，突发议题的脆弱性。在自然灾害、传染病、难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农民等社会底层的利益最容易受到威胁。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加强边境管控、封闭交通物流等直接打击了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中东欧国家的制造业也面临订单减少、零部件断供的局面。这些问题短期内造成失业率激增，农民等社会底层生活负担加重。其次，连带议题的敏感性。中东欧国家的内外政治变动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有连带效应。例如，在欧

^① Reinhard Heinisch and Monika Mühlböck, “Helping or Hurting? Perception of the EU and Reactions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astern Central Europ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MPSA Annual Conference, April 2015.

^② 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打击犯罪、跨境移民、防灾援助等方面有灵活的合作机制，如通过部门间的“绿色通道”，中国多次向湄公河—澜沧江下游国家应急补水；中泰之间也有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合作机制。实践表明，提升合作的灵活性能够有效降低风险后果，减轻底层民众负担并增进对中国的好感。

盟的共同贸易政策下，中东欧国家也自动适用欧盟严格的“双反”规则，社会底层倍受影响。西欧国家主导的对中国的贸易指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和投资成本，部分削弱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互补性较强的经济关系，累及与中国联系紧密的中东欧国家底层劳动者、消费者和中小企业。^①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也面临不确定风险的挑战。因此在危机发酵之初，灵活的应急机制将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及时协调立场、分配有限的资源、保持贸易渠道畅通、设立专项基金等降低经济社会风险，特别是降低对社会底层民众利益的损害。为此，中国需要与中东欧国家建立应急合作的“绿色通道”，在稳定有序的常规合作面临不确定的危机之时，通过领导人、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等各层级的迅速沟通对话，重新确定危机之下各方关切问题的优先级，使需求和供给得到及时有效匹配。中国还应建立风险评估机制，预判突发事件对中东欧社会底层民众影响的程度和范围，评估“降风险”政策的可行性，追踪社会底层在危机下酝酿的政治思潮，特别是要评估危机下的选举和社会抗议等关乎所在国政治格局变化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未来发展的问题。通过政府层面灵活应对，一方面补充并完善中国—中东欧国家常规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降低中东欧国家社会底层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

第二，在企业层面，企业应重视底层从业者的利益需求，扩大经济合作成果的惠及面，以此探索新的投资领域和模式。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属于“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企业是合作的执行者。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兴趣虽在提升，但在实施层面与社会底层的对接不足。首先，由于未充分了解中东欧国家的产业和社会需求，现有的合作尤其是农业合作使社会底层受益较少。2019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9%，达到954.2亿美元，但农业贸易额仅为14.58亿美元，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

^① 如欧盟2012年开始的对中国光伏“双反”调查，使中国—中东欧新能源合作被迫停顿，由于中方投资减少导致岗位流失、成本增加，因而遭到匈牙利等多国反对。直到2018年“双反”措施到期后，中国对中东欧新能源投资才重新开始恢复，目前已累积达40亿欧元。参见王姝力，崔文佳：《“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年度报告2020—〈中国—中东欧能源合作报告〉在京发布》，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网站，2020年9月24日，<http://www.eppei.com/WebDetail.aspx?PartNodeId=106&ArticleID=16531>。

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①以劳动密集型和小农经营为主的中东欧国家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大，也面临着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一方面，提升中资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农业贸易中的比重，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缓解在农业、加工、物流等行业的就业问题，提升社会底层的工资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目前面临着“主粮充足、副粮不足”的局面，也有粮食储备多元化的需要，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以肉类、乳品、水果为主，还有豆类等优质副粮。因此中国企业应积极拓展引进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种类，研发优质冷链技术，刺激投资意愿，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共赢。其次，中资企业的强势一定程度上对当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社会底层历来又对大国进入其内部市场存在疑虑，这决定了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等不能完全复制“非洲模式”，即从融资、施工到配套的全包方案。相对于欧盟，中国企业资金雄厚，应充分利用中东欧国家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需求，凭借信贷优势，为项目建设提供保障，并以此承揽大型工程，然后分包给当地中小企业。根据当地发展需求和中国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综合公私伙伴关系合作（PPP）和“建设—经营—转让”（BOT）等投资模式之所长，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一方面，增加社会底层的就业，减少劳动力向西欧、北欧的外流；另一方面，以投资带动工程总包一分包的思路能提升中小企业对中国的欢迎程度，扩大共赢受益面。最后，企业应及时向国内的相关部门、银行、投资方、学术机构等反馈中东欧各国政府、合作商和民间的需求，选择、规划并推动较易实现共赢的项目，并将底层从业者是否受益作为重要的评判指标。只有充分了解社会需求，使社会底层充分受益并提升合作黏性，才能促进占主流的民粹政党和保守政府稳定推进项目，避免合作因政治风险而中断。

第三，在民间社会层面，注重寻求文明共性，展开民间交流。与政治和经贸往来相比，民间交流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并不活跃，双方民间对彼此的了解不多，甚至存在误解。^②民间交流是中国开展同中东欧国家合作

① 2019年农产品贸易仅占中国—中东欧贸易比重的1.5%，低于3.8%的欧盟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比重，更不及其他地区与中国的农业合作，如2019年中国—拉美贸易额3137亿美元，农产品贸易达498亿，占比15%。参见吕珂昕、宫宇坤：《中欧班列成中国—中东欧农业合作亮点》，《农民日报》2020年6月9日，第4版。

② 宋黎磊、王宇翔：《新形势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公共外交探析》，《现代国际关系》

的重要内容之一，民心相通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但是，双方关系也面临挑战，“中国威胁论”随着媒体的传播而被放大，误导了中东欧民众，也使中国民众因中东欧的反华之声而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民间误解干扰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氛围。在加强旅游、学术、出版和文艺等领域的民间合作中，民间团体、个人等各类社会力量是主力。首先，在社会力量日益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主体的背景下，应注意寻求与中东欧国家的文明共性，在符合传统美德的家庭观、民族观、国家观和世界观中形成共鸣。其次，为实现民心相通，还需要各类社会力量协助加强以社会文化为主流的消费性、生活性和公共性服务业合作。服务业投资能为中东欧国家的底层民众增加就业，同时也可以为中国民众提供多元的文化类产品，最终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范围更广。最后，面对质疑中国的声音，中国民众应理性回应，尊重各自的民族尊严。只有获得中东欧国家底层民众的理解，有效打击反华势力，凝聚政治共识，才能维护良好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局面和国家利益。

总体而言，从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等不同层面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都需要重视这些国家底层民众的迫切需求和现实问题(见图2)，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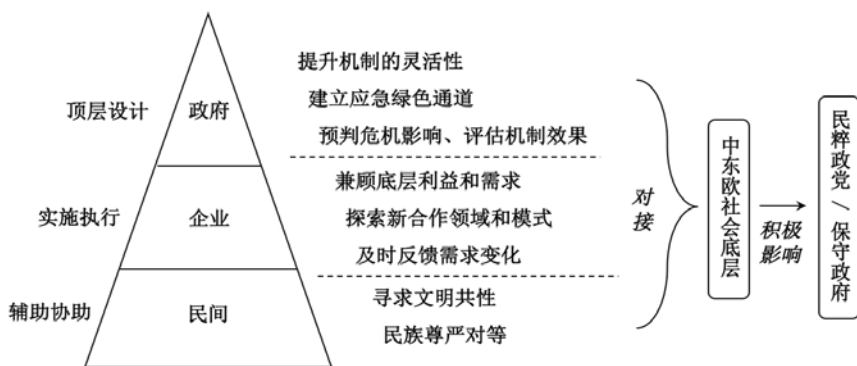


图2 以底层民粹主义为导向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结束语

转型以来，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呈现本土政治结构不稳、经济活力不强且长期依赖农业经济、持续的宗教认同与宗教间紧张、集体化的政治遗产犹在、民族构成复杂多样以及民族认同多元化等特征。^① 中东欧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是转型期诸多问题的集中体现，农民等社会底层是民粹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对中国而言，通过有效回应农村和城市底层选民的需求，既可以增强中国在当地民间的影响力，也有利于中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重新定位，这应该成为中国拓展在欧洲的利益的新渠道。中东欧国家的战略地位在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但是，西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并不友善，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中东欧各国均面临经济重建的任务，中国作为较早实现经济恢复的经济体，对中东欧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共建“一带一路”会得到更多响应。因此，如何在欧盟和中东欧国家之间实现平衡，在减少西欧顾虑的同时积极扩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有效发挥中国在应对各种外交风险和国际交往中的综合能力。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Janusz Mucha,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Minority Issues,”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 No. 160, 2007, pp. 379-400.

ABSTRACTS

China's Diplomac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YANG Jiemian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a century ag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been guided by Marxism, exploring and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al rules of China's diplomatic work in its practice,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from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 perspectives, and rationally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series of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theories that reflect features of different era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established, constituting the CPC's diplo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China's diplomacy led by the CPC has built up an overall set of core conceptions, such as balanc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s well as striving for a more equitable and just international system. Moreover, China's diplomacy led by the CPC has also cultivated strategic thinking that helps recognize fundamental positions, major tasks, an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dhering to its position as a socialist and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seeks partnerships rather than alliances. Regarding to policy principles,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both essential tenets and necessary flexibility, defending core interests and mutual accommodation, as well as overall diplomatic goals and its step-by-step implementation. China's diplomatic theory adheres to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fforts to adapt Marxism to China's real conditions. This theory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lead to greater achievements in China's

diplomatic work,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Chinese diplomacy, theory, philosophy, principl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Visions and Strategies

ZHOU Guiyin, SONG Dexing, LIU Feng, QI Lingling, MAO Weizhun, ZHANG Xiaotong, and HE Yinghao

EDITOR'S NOT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Beijing's perspective, is a major strategic issue that affects China's long-term development. Debates over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ll boil down to one consequential question: "Where is the world heading?" A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it,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profound changes that have never been seen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Mankind is standing at a crossroads, facing consequential choices: cooperation vs. confrontation, openness vs. autarky, and positive-sum collaboration vs. zero-sum competition." Amid unprecedented changes, China must give its own definitive answers to these major questions. At a moment when the still rag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world-shaking changes and exacerbat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ree lead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urnals, namely,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Global Review*, and *Foreign Affairs Review*, organize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volving 20 Chinese scholars who give their views and advice on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grand topic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amely, history, theory, visi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one-in-a-century changes, multilateralism,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Modern World System

YE Jiang

ABSTRACT: The rampag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llout have accelerated the unfolding profound changes in our world.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capitalist model of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finally covered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as this model was adopted as the defining economic feature in human existence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What has been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s what Karl Marx called the two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ne between socialized production and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other between a world market and its constituents, sovereign state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created a huge impact on the world’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and sovereign state-centered political system by further moving the world closer to a multipolar system and to a new growth model that depends more and more on the deploy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 a world that is transitioning from a Western-dominated one to a new system with a more even distribution of global power, China, along with other emerging powers, will have a larger role to play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modern world system, Covid-19, once-in-a-century changes, global governance

Techno-Nationalism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Value Chains—A Case Study of the Global Chip Industry

YU Nanping and JI Shiming

ABSTRACT: Today,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driven by new technologies is changing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As a result, the contest for technological supremacy among great powers is intensifying. Against this backdrop and amid a still rag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techno-nationalism has made a comeback. Mingled with age-old geopolitical thought, rising

techno-nationalism adds a new layer of uncertainty to great power politics today. Washington has turned to extreme tactics against Beijing, like sweeping tech bans and blockades, in an escalat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s a ramification, the decoupling strategy is disrupting the industrial and value chains on the global chip market, impeding global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ng challenges for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KEYWORDS: techno-nationalism, global value chains,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LIU Aming

ABSTRACT: The resuscitated Quad forum has aroused growing strategic attention and lively debate among major regional actors, although it has produced littl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omains since 2017.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um has been driven by a number of factors, the most prominent of which are rising concerns about China's growing power, a renewed focus on democratic values, implementation of America'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need to devote more resources to nontraditional challenges lik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practice, the Quad forum ha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ncreased strategic association and coordination, expanded its diplomatic reach in the region, and worked to strengthen the American-l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Although the grouping's trajectory and strategic relevance remain uncertain in the years ahead, Beijing still nee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s development and step up engagement with its members because regional actors have increasingly viewed China as their chief external challenge. For Beij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will be best served in a generally peaceful and stable environment where regional competition will not rule out necessary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 players.

KEYWORDS: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Indo-Pacific Strategy, trilateral cooperation, regional order, ASEAN Way

A Nexus of Interests, Responsibilities, and Norm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U Guangsheng and NIE Jiao

ABSTRACT: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 is a latecomer t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Mekong region, yet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model of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four years under China's leadership. Compared with the successful initiative at present,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lack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uild a dyna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gional institution, and finds that LMC fully reflects a three-dimensional process of "interest-responsibility-norm," in which China aligns its own interests to those of Mekong countries, plays a leading role under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structs regional norms actively. This also explains the growing appeal of LMC. Based on the analysis, it is crucial to exp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Lancang-Mekong countries,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hina-driven" to "multinational efforts," establish relatively stable cooperation rules, and maintain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for LMC to maintain its vitality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task for LMC in the next phase i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LMC, especiall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and norms that should be observed.

KEYWORDS: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interest-responsibility-norm nexus, regional diplomacy, institution building

Resurgence of 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mplications

for China-CEE Relations

PENG Xiao

ABSTRACT: The populis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grassroots suppor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populist basis in CEE represented by peasants is similar to the social basis of reactionaries in history. In CEE, where agriculture is still a key economic sector, when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is suddenly invaded by the foreign economy, the exist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re severely challenged. CEE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competitiveness thus call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ies, opposing the corruption of neoliberal values represented by Western Europe, purging domestic corruption with authoritarianism, emphasizing the glory of the nation in history, and renaissance of religion and family ethics. This sentiment is taken advantage by populist parties to gain political power. Under the pressure of foreign economy, peasants, urban underclass, economic nationalists, political conservative elites, and cultural chauvinists come together to form a complex populist basis. The political collusion between the elite and the masses has led to the rise of populist parties. The populist parties in CEE have taken center stage since the transition, and their strength and reach are unmatched by any other parts of Europe. In view of this, exploring a mass-based strategic path that integrates three types of practice entities includi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will help China to increase influence in CEE and actively encourage populist or ruling parties of CEE countrie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KEYWORDS: populism, populist party, logic, CEE, China-Europe relations